

前 言

《宣传动态》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 work 指导性刊物。为了适应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刊物编辑部决定：每年选辑若干适合有关党员干部阅读的材料，汇编成册，作为内部读物发行。

阅读范围：公社以上党员负责同志；县和相当县级以上党委工作部门，以及其他机关、团体、学校、工矿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员负责同志；县以上宣传文化单位的党员干部；由县委和相当县委一级党委宣传部门具体掌握。本书可供上述人员个人购买保存，但不得外传和公开引用。

在编辑中，对收入的文章、材料，有个别的在文字上作了一些删改。本书，仅供党内有关单位和同志参考。凡涉及工作中的政策规定等问题，当然应以现行的正式文件为准。

目 录

有关毛泽东同志家庭成份的宣传必须实事求是	1
今后不要再叫“达赖叛国集团”	2
一些揭批文章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3
当前宣传工作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7
——胡耀邦同志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在 中宣部讨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抓住自卫还击战胜利结束之机 广泛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19
开展一个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活动	26
关于悼念文章的写法问题	35
在宣传报道中要正确称呼少数民族	36
胡耀邦同志谈如何把对外宣传搞得更好些	38
组织各方面力量积极占领精神生活阵地	47
敢做思想工作 制止闹事苗子	50
建议重新在领导干部中号召学习焦裕禄	53
坚持四项原则 继续解放思想(冯文彬)	55
“恐右症”的提法不够严密	64
在国际关系中不要提“忘恩负义”	65

一定要开展群众性的宣讲工作	65
报刊要向读者负实事求是之责	70
不要公开宣传“翻版仿制”	73
改造社会风气是全党的任务	74
正确对待所谓人权问题	84
马恩列斯论“人权”	89
切实加强农村群众宣传工作	103
我们是怎样恢复党的报告员制度的	105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一心一意奔四化	111
不要滥用“长官意志”这个概念	116
整顿社会秩序 加强青少年教育	118
加强文艺评论 繁荣文艺创作	123
杜绝虚假的宣传	129
不要再讹传詹天佑发明火车自动挂钩	132
这种“纪念室”应该取消	135
彭真同志在首都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	
谈法制宣传问题	137
把全党的思想真正集中到四化上来	146
把革命的精神财富留给后代	155
湖南积极组织老干部撰写革命回忆录	159
所有干部的必修课程	162
一个女青年为什么开枪杀人	
继续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在全党进行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教育	171

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提高贯彻党的政治路线的 自觉性	182
黑龙江省委决定对全省党员、干部进行轮训	196
高中级干部要亲自处理群众来访问题	204
为什么一些农村青年轻生厌世?	205
继续解放思想 开动机器	
使文学艺术更加活跃和繁荣起来	211
加强思想工作 使干部争着上党校	220
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带头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 讨论	223
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	227
张香山同志谈关于做好接待、旅游工作中的宣传问题	228
不要用“凡是派”的提法	238
关于“知识青年”的说法	239
把青少年的道德风尚教育持久深入地开展下去	240
全党都来维护安定团结	249
教育党员、群众不信谣,不传谣	255
石家庄地区大力培训报告员、宣传员	257
对外介绍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258
自觉地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	259
银川市委认真采取措施制止封建迷信活动	266
甘肃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	269
法制宣传教育要深入下去	277
浙江开展法制宣传月活动效果显著	279

无锡电缆厂密切联系实际进行法制教育	285
外经部教育党团员带头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289

有关毛泽东同志家庭成份的宣传 必须实事求是

中联部在不久前提出，不少外宾在参观过程中，特别是参观韶山“毛主席故居”时，提出毛泽东同志的家庭成份问题，过去由于没有统一的口径，有关的接待同志不好答复，或答复不一。《光明日报》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八日，陈铁健写的题为《毛泽东同志是生活在人民中间的革命领袖》一文说：“毛泽东同志曾经对斯诺说过，他的家原是贫农，后来上升为中农，进而又上升为富农，雇长短工，每年有八十四担谷的收入，并且转售谷米赚钱。”这段介绍是否可作为今后宣传的口径？

据了解，《光明日报》文章的根据就是斯诺的《西行漫记》。我们查阅了该书（三联书店一九六〇年版第九十八页），确有这样的记载。此外，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第五页)、肖三的《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二——三页),有关这个问题的说法,都是一致的。

今后在宣传上讲到毛泽东同志的家庭成份时,应该按照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讲的,实事求是地介绍。

(第1期, 2月16日)

今后不要再叫“达赖叛国集团”

根据新的形势,我们要积极开展争取达赖集团返回祖国的工作。为此,今后在宣传上,不要再叫“达赖叛国集团”、“叛匪”,而应改称达赖及在国外的原西藏上层人士、藏族同胞或在国外的藏胞。

目前达赖集团处境十分孤立,内部矛盾重重。一些人主张放弃“西藏独立”的口号,返回祖国;另外一些人坚持原来的立场,想搞“独立”活动,同蒋帮勾结,甚至投靠苏霸。达赖等人想回国,又有顾虑,动摇犹豫。达赖本人近来不止一次公开谈话,对我试探。我西藏自治区宣布释放全部在押叛匪要犯,对他们的震动很大。印度政府为了缓和同我国的关系,也想摆

脱在达赖集团问题上的困境。中美建交以后国际形势急剧变化，一定会进一步促使达赖集团分化，更多的人想回到祖国来。形势十分有利。把达赖集团争取回国，有重大的意义，可以粉碎国际反动势力、特别是苏联霸权主义分裂我国的阴谋，有利于巩固西南边防，有利于全国的安定团结，也有利于争取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

（第1期，2月16日）

一些揭批文章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中央办公厅信访局的内部刊物上，登载了殷子夫、肖光华对一些揭批文章的意见，摘要转载如下。

两年来，报上揭批“四人帮”的文章绝大多数是很好的，但也有一些问题。如有的文章这样写：“四人帮”搞影射史学，批宰相，某人在文章中也批了宰相，可见某人也是搞影射史学，卖身投靠“四人帮”。这种不作具体分析地简单推论，缺乏说服力。批宰相不一定是搞影射。要断定是否搞影射，必须有充分的事实根据。不然今后写历史，涉及到宰相（还有孔子、儒

家、女皇等)，只好一律回避了。

有的文章这样写：“四人帮”否定某电影(或剧)，但该电影(或剧)是毛主席或周总理肯定过的(或过问、看过、关心过的)，可见“四人帮”的目的是为了借此反对毛主席或周总理。这种逻辑也过于简单。“四人帮”可能有此目的，但要依据事实材料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推论。否则，今后人们对任何电影(或剧)都不好批评了。因为一般人很难知道这个电影是不是中央领导同志在内部肯定过、关心过、看过。否则你给否了，岂不是可能扣上反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帽子吗？

还有，学术问题应当和政治问题分开。“四人帮”借历史、文学、哲学、经济学等搞阴谋，批判时应着重批他们如何搞阴谋，而不能简单地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等同起来。如毛主席给陈毅同志的信中用了“形象思维”一词，很多人就批郑季翘，因为郑反对“形象思维”这个词。很多文章把否定“形象思维”同“四人帮”搞阴谋等同起来，其实应该区分。“四人帮”利用否定“形象思维”搞阴谋，中间还有许多过渡环节，不能简单说是搞阴谋。很多文章批郑季翘的根据是毛主席使用了“形象思维”一词，但很多人也知道，毛主席曾肯定过郑的文章，为什么不提？这样批评能使郑季

翘心服吗？

还有的文章不是实事求是，而是遵循这样一种指导方针：把问题说得越严重，批判就越“深刻”；上纲上线越高，也就越“革命”，结果出现了夸大不实之词。

揭批要深入，必须把揭批同总结经验教训结合起来。“四人帮”的问题，不能仅仅归结为几个人个人的品质，他们的出现，有其社会、历史根源。为什么这么四个微不足道的人物能如此快地爬上这么高的位置，而且对党起这么空前大的破坏作用？仅用四个人的品质、阴谋手段是不能说明的。为什么“九大”党章上竟能写上林彪是接班人（即便他不是坏人，这种做法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近乎封建主义）？为什么江青一句话就可以定人死罪？为什么象贺龙这样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竟遭残酷迫害而不受制止？等等。这中间有许多重大教训，应当发动全党来总结。

林彪、“四人帮”是一种思潮的产物，他们又把这种思潮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思潮把社会主义革命歪曲为人民内部、党内无休止地一次又一次地开展“政治运动”和“路线”斗争，每次必定整一大批人，打击面越来越广，全党、全国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都被压下去了，极大地危害了我们的党和国家。对于这种

极“左”思潮，连同它带来的一套制度、口号、习惯、做法、传统等等，都应该彻底清算。只有这样，才能总结二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

(第 3 期, 3 月 1 日)

当前宣传工作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胡耀邦同志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在中宣部讨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新闻战线是一条很重要的战线。我们的报刊、广播、新闻通讯，每天都同全国几亿人民见面，同全世界几十亿人民见面。它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映当前的整个局势，和人民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新闻工作的这种作用，是其他工作所没有的。新闻战线也是最大的课堂，新闻工作者既是人民的学生，又是人民的教师。孔老二他有多少弟子？据说有三千，恐怕还是吹起来的。我们每天都给几亿人上课。可见，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是非常重大而光荣的，新闻战线的指战员同志要懂得这个工作岗位的重要性。我们要当人民群众的良师益友，只能把工作搞好，不能搞坏。新闻工作搞好了，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搞坏了，或搞得不好，它的坏作用也很明显。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对新闻工作的意义和作用要有正确的认识。如果说已经认识清楚了，也还要不断地加深认识。

第二个问题是，两年多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有哪些好经验。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的新闻工作面目一新，成绩很大，受到人民的称赞。我们在哪些问题上做得好？我看在揭批“四人帮”问题上做得很好的，或者说是相当好的。我们在清除“四人帮”的流毒等方面也做得好。这是怎样得来的，应当很好总结。

当前，随着我们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我们要注意些什么问题？新闻工作的着重点是否要有某些改变？也需要考虑和研究。

有一个问题我认为要引起新闻工作者特别注意的，就是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一定要很好地宣传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愤图强，为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英勇献身、忘我奋斗的气概、精神、风格。不管是干部也好，群众也好；不管是老年人也好，中年人也好，青年人也好，少年人也好，他们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强国英勇奋斗、争先恐后的精神，我们都要逐步加强宣传报道，充分反映。

揭批“四人帮”，我们不能停，还要继续报道。但是，各条战线上男女老少为实现和保卫四个现代化而

英勇奋斗的新闻，要显著增加。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气可鼓，不可泄。”士气很重要。例如，我们自卫还击战中战斗英雄的消息，是大家很喜欢看的。但是，我们同时还要宣传报道广大城乡人民群众为四个现代化英勇献身的精神和努力奋斗的气氛。

前一个时期，我们宣传揭批“四人帮”，宣传落实政策，这都是应当的，今后还要这么做。但侧重点要逐步转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要努力使我们新时期的新闻工作呈现一个新的风貌。

第三个问题，就是要利用这次自卫还击战，好好进行一次保卫祖国，保卫四化，反侵略，反霸的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

为保卫四化，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对于霸权主义者和侵略者，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现在打了一次，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在全党全国人民中，从干部到群众，特别是对青年，进行一次保卫祖国，保卫四化的爱国主义教育。现在我们就准备，要使用一切宣传手段：报告会呀，电影呀，诗歌呀，故事呀，散文呀，来作好这项宣传工作。搞这么一次教育，机会是难得的。我们要站得更高一点，看得更远一点。谁能说今后一、二十年内，我们搞四化过程中，国际上和边界上从此就太平无事，不会再遇到任何风浪呢？

我们要准备经受更多、更大的风险，决不可以埋头搞四化，关门搞四化。所以，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牢固地树立这样的观点：一面搞四化，一面不要忘记保卫四化，应付战争。不仅这样，我们还要利用这个机会，振奋起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为实现和保卫四个现代化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转变被林彪、“四人帮”败坏了的社会风气。我觉得这是我们宣传工作中决策性的东西，方向性的东西。模糊了、忽视了这点，我们要犯错误。

第四个问题是农业问题。要争取今年大丰收。中央有关文件下去以后，多数地方的反映是很好的，农民积极性很高。昨天我接到宁夏一位省委书记的来信，不赞成报纸上报道有些省的一些单行的规定。有的同志建议，各个省的单行条例和单行法，全国报纸上要少宣传，甚至不宣传。具体的做法要因地制宜，不要强求一律，也不宜把一些局部的经验当作普遍性的东西加以宣传、推广。重点还是要抓各个省市如何讨论和落实中央文件的宣传。

乔木同志还有这么个想法，说他不赞成多讲“恐右病”的问题。我觉得有道理。不是说不可以讲，适当地讲一讲，我还是赞成的。但是不宜多讲。“左”和右的问题，“左”当然不好，这一、二十年我们吃了

“左”的亏，这是事实。但是我们宣传的时候，不要给人民一种错觉，好象右就比“左”好，字里行间要注意这个问题。“左”不好，右也不好。今后在党的文件上，要注意是什么错误就讲是什么错误，不要轻易地提什么右呀、“左”呀，少提这个东西。你说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究竟是“左”还是右呀？我们过去习惯于把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看作是“左”的东西。但是违法乱纪怎么是“左”呢？就是违法乱纪嘛。

我们的党是在一九二四年后大规模发展起来的。一九二四年以后在苏联是斯大林执政时期。他们搞党内斗争很激烈，分什么“左”呀，右呀。这也影响到我们党，经常讲路线斗争，经常讲什么“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而世界上有些共产党，譬如南斯拉夫的党，罗马尼亚的党，就很少讲什么“左”倾错误呀，右倾错误呀。前些年我们写党史就是光写路线斗争，“左”的，右的。好象离开了路线斗争，我们就没有了党史。对于滥用路线斗争的问题，将来也要清算一下。一种是工作中的偏差，一种是思想中的倾向，一种是路线错误。三个概念是不同的，不能把什么东西都叫路线斗争。从一九二四年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我们党都有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权力很大。我们受其影响很深，包括滥用路线斗争的名义，滥用“左”倾

和右倾的名义。

农业的宣传，总的一句话，就是要把争取今年农业全面大丰收的政策、措施、干劲好好地报道，好好地落实。这是第四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就是有关民主和法制的一个问题。最近有人出了一些油印刊物（包括西单墙上的文章），有人成立各种组织。究竟采取什么方针好呢？第一，就是要加强我们自己的工作，要健全我们的民主生活，要把我们自己的报刊办好，使它丰富多彩。现在我们的报刊，一般化的太多了。应该明确地要求我们的报纸、刊物，一定要有自己的特点。千篇一律，千人一面，谁看呢？一般化是对自己的组织不负责任。如果戏剧刊物不搞戏剧，诗歌刊物不搞诗歌，画刊不搞画，省报不象省报，青年报不象青年报，那你办它干什么呢？一定要使我们的报刊办得丰富多彩，各有特色，满足我们社会上各种人的精神需要。其次，还要适当地发展我们的刊物。我上次就提出来，我们全国只有一个诗刊，各个省是否也可搞个诗刊？随着形势的好转，适当增加些刊物是必要的。

第二，我们的各级党组织，首先是我们的群众团体要很好地开展我们的活动，面向群众，满足群众的政治、技术、文化生活等各种各样的要求。前几天我

在青年团会上讲，你们自己组织报告会嘛。北京团市委是干什么的呀？团区委、大学团委、工厂团委是干什么的呀？你组织活动嘛！组织报告会嘛！今天请人讲民主问题，明天请人讲自卫还击战问题，组织科学家、作家、音乐家、英雄模范人物等举行讲座，组织演员同观众见面、座谈，等等，等等。我建议请穆之同志或井丹同志同北京市宣传部门开一次会，北京市带个头，把各种活动开展起来。如果我们把理论的、政治的、时事的、艺术的、科技的……各种活动搞得丰富多彩，引人入胜，自发性的组织就吃不开了。我想，可否以北京市委宣传部为主，把党中央、国务院机关组织起来，专门把这个问题讨论一次，如何占领精神生活阵地。理论界、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人民团体，一起合作，一起来干。这应该当作是我们新闻宣传部门的方针性问题提出来。首先在我们北京、上海来讨论实行。在我们的宣传经费中，拿出一笔钱来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方针性问题。

还有一条，是对极个别的害群之马，利用发扬民主、落实政策来干坏事的人，还是要依法作适当的处理。现在公安部门有点害怕我们的舆论机关不同情处理这种人。这种人是不会多的。我们的社会经常会分

泌出一些毒素来，对这些毒素不能含糊。纵容个别害群之马，就会贻害多数人。

总之，就是这么几条：第一，把民主生活搞好；第二，把我们自己的报刊搞好，搞得丰富多彩，各有特色，反对一般化；第三，人民团体、宣传部门加强工作，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还要辅之以第四条，对害群之马不能姑息，不要使一些政法部门误以为我们的舆论机关对害群之马有所偏袒。

第六个问题，我们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究竟怎么开好？三月五日肯定开不成了，一是中央负责同志很忙，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汇报。二是我们自己也没有准备好，如我们的发言、总结和中央同志的讲话，都没有搞好。我的意思我们还是要争取在三月份开，但稍许推迟一点，问题也不大。

总的说来，理论工作务虚会还是开得好的。有许多同志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提出了很好的观点，成绩是主要的。但是，既然有那么多人发言，总难免有一些意见、观点，不那么完满，至少还可以继续探讨嘛！所以不要把理论务虚会上大家的发言当作是中央的意见，当作是定论。

会上批评一些同志的意见，并没有经过核实。我再次强调一下，这类意见不要外传为好。

有些有争议的重大理论问题，有关全党性的重大决策和措施的问题，还是采取先党内后党外的程序为好。先在内部充分讨论清楚，不要急急忙忙公开发表。我们的党报也好，党刊也好，遇到这类问题，还是多商量一下为好。不成熟的东西，匆匆忙忙发表不好，容易引起思想上的混乱，自己也会陷于被动嘛。

理论务虚会上大家敢讲话、亮观点，我觉得是好的。但是，也有这么几点意见，提出来请同志们考虑一下，是否妥当。

第一点是关于毛主席的问题。我们大家一致认为，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胜利的旗帜，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是永垂不朽的，但是毛主席也是有缺点、错误的。我们要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包括研究他究竟有那些错误，这些错误是怎样产生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些基本观点我们是一致的。但是，我们要严肃考虑一下：关于毛主席的缺点错误，在我们没有认真研究清楚之前，讲多了好不好？公开在报纸上讲好不好？特别是在当前一个时期之内。不是说毛主席的缺点错误，我们都要包起来。共产党对谁都是有什么错就是什么错。但是这里有个前提问题，有

个表达的方式问题。我提出这么个问题来，看恰当不恰当？理论务虚会以来，我经常在考虑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的新中国是靠什么来维系着的？靠什么把几亿人民团结在一起？我看一个是共产党的领导，一个是干社会主义，第三就是毛主席。我们就是靠这些。我们新中国的创造同毛主席确实分不开。

毛主席做错了的事情，我们作为他的学生，按照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一定要把它纠正过来，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在报刊上或日常讲话中，把他老人家的缺点错误讲得多了好不好？我们必须站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利益上来考虑这个问题。有些同志并不一定都和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志一样想法，有些同志可能认为毛主席的缺点错误讲得越多、传得越广就越好。有没有抱这样想法的人，这需要我们注意呀！

第二点是，对任何人的批评，对任何一件历史事件的鉴定，我们都应严格核实。讲的时候，写的时候，还应留有余地。昨天有一封群众来信，提出揭批运动中值得注意的问题，我在上面批请穆之同志考虑是否要和各个报刊打个招呼，请宣传局、新闻局的同志加以注意。黄火青同志专门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反映这次清查运动中的过火的行为，讲了许多具体例子，你说是难免也确实难免。但是，一是难免，二是

要尽量避免。尽量避免的办法，我的意思要划一条界限，对历史事件，对错误，对违法的人，第一要核实，第二留有余地，不要把话讲满。不仅不要讲过头话，要有意留有余地。把有些论战的话降级。毛主席在延安时就同康生讲过，你批评人有十分就讲十分，我和你不同，我只讲八分，留两分。我觉得留有余地是很好的方法。第一是不讲过头话，第二要有意识地留有余地。

留有余地对谁都主动，对被批评者主动，对批评者也主动。我们搞经济计划也要留有余地，一切事情都留有余地。我看留有余地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任何事物、任何人都是会变的，不是一成不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辩证法。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这些观点和方法，我们还要多宣传。

第三点是团结问题。只讲团结的重要性，只讲团结的基础，不讲团结的方法，团结是搞不好的。为了搞好团结，不仅要在原则问题上，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统一思想，团结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而且还要讲究团结的方法。同志之间，要互相谅解，互相支持，在非原则问题上要善于妥协，要让点步，甚至放弃一些自己的意见，总要自己舍得吃点亏，才能团结好别人。没有委曲求全的精神，要把人家团结起来是

不可能的。这方面周总理是模范。总理的自我牺牲精神，对人宽，要求自己严，自己宁愿吃点亏，这一切都为我们树立了搞好团结的典范。

这几个问题，不单涉及到如何开好理论务虚会，而且关系到当前整个的宣传工作，特别是报刊宣传和广大干部、群众中的政治思想工作。这里，我只是把问题提了出来，希望能引起同志们的重视，引起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第4期，3月5日）

抓住自卫还击战胜利结束之机 广泛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我对越南侵略者的自卫还击战斗已经胜利结束，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奉命从三月五日开始全部撤回我国境内。这次战斗完全是按照我们的预定计划进行的。法新社评论说：“中国已经达到‘反击’的全部目的。”“中国的参谋长邓小平在他的一次巧妙的赌博中已经获胜；中国对越南‘教训’了整整十六天而没有引起苏联的干预，中国也使得越南对柬埔寨的占领成了问题。”又说：“北京制止了它自己鼻子底下的‘东方古巴’，从而教训了美国，敦促美国不要让它鼻子底下的‘西方古巴’代表苏联为所欲为。”这些不失为公允之见。当年有人写诗歌颂薛仁贵西征说：“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我们不妨也可以说一声：“将军一怒下凉山，三师凯歌归南关。”

中央下决心打这一仗，在政治上、军事上各方面

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如果要进一步作比较的话，能不能说是：部队锻炼的收获更大于战场上的俘获，政治上的胜利更大于军事上的胜利？！政治上的胜利，打出了国威、军威，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影响之深远，未可估量。目前至少可以看到这样几点：

第一，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人们看到，毛主席、周总理刚刚去世两年多，他们的接班人不负全国人民的期望，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敢想敢干，说得到做得到，敢碰大小霸权主义，显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英雄气概。

第二，灭了北极熊的威风。苏联在国际上横行霸道，气焰嚣张，没有人敢碰，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都不敢。这次我们碰了一下，也没有啥。打在越南身上，羞在苏霸脸上。对他们政治上的打击不轻。

第三，有利于巩固边境的安全。一九六二年中印边境一仗，使印度老实了十几年。这次狠狠教训了一下越南侵略者，有可能把他们打得老实一点，能够在边境上安静几年。只有敢打，才能安边，这是辩证法。

第四，可能改善柬埔寨的局势。压迫越南从柬埔寨撤兵，最低限度会逼得它在国际上进一步孤立，鼓励柬埔寨今后的斗争。

第五，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激励了民心、

士气，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高涨，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用战斗保卫边疆、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心和信心，空前增强了。

第六，我们部队受到了非常大的锻炼。部队的政治素质、军事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从抗美援朝以后，二十多年不作战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打了一下。这次好好练了兵，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中的形象和地位更高了。

自卫还击战斗开始以后，全国各条战线广大群众的反映都是很好的。但是，也有少数人暴露出怕战争的情绪。有些人中了唯武器论的毒，患了“恐现代武器症”。有些地方轻率地采取疏散行动，使生产、工作和国家、集体、人民的财产遭受不应有的损失。还有个别人在北京西单墙上贴大字报，公开诋毁我们自卫还击的正义行动，被苏、越的反华宣传所利用。

战争分为正义的、非正义的两种。我们共产党人只是反对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非正义的战争。对于进步的正义的战争，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越南侵略者自恃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撑腰，一再向我国挑衅。我们越退让，他们越疯狂。怎么办？邓小平同志经常说：怕事没有用。确实是这样：世界上的事情，你怕它就能消灭了？没有

这回事。我们对越南侵略者实行自卫还击，完全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战斗打下来，越南侵略者的毒焰被我们排除了（当然，如果他们再放毒焰，我们就再打）。我们自己队伍内部的那种厌战、怯战情绪等等污浊，也为之一扫。同时也把极个别人的卖国主义嘴脸暴露出来了，激起了公愤。这不是大好事吗？

有些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说，好容易粉碎了“四人帮”，实现了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该一心一意搞四化了吧。集中精力搞四化是对的，然而不问天下事，关门搞四化是做不到的。要看到苏联霸权主义的存在。要看到有个“东方古巴”。今后二十几年内，国际上总是不会安宁的，边境上也不会完全平安无事的。敌人捣乱，当然不好；但是对我们也有某种好作用。它能激励我们九亿人民的爱国主义的热情和发愤图强的志气，极大地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柳宗元懂得这个道理，他写了一篇《敌戒》，说：“敌去召祸”。这告诉我们，要居安思危。革命胜利后，怕打仗，居安不思危，怕危，这种心理很不好。

古巴统治阶级是反动派，搞扩张。这点很坏。可是他们拉丁美洲敢去，非洲敢去，东南亚也想来。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却怕这怕那，怕打仗，怕承担国际主义义务，这怎么行呢？

苏霸是个庞然大物，有实力。从根本上说，也是个纸老虎。我们同样在战略上要藐视它，在战术上要重视它。由于长期修正主义的宣传，他们的士兵、人民害怕战争的情绪很厉害。虽然它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战略重点仍然是在欧洲、中东。他真正要向我们动手，不得不仔细考虑：进得来，回不回得去？我们这次向越南侵略者还击时，就准备苏霸在边境闹事，甚至设想让他打进来几十公里，占领我们一些城镇。即使如此，最后也必将以我们的胜利告终。今后敌人打来时，我们一般不搞疏散，不拆迁，也不要破坏工厂。至于大打，他慑于世界舆论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是不敢轻易冒险的。这次的结果如何呢？大打没有，中打没有，小打也没有。在这次自卫还击战进行到了第十四天，勃列日涅夫才发表一个讲话，西方通讯社说是出乎意料的温和。而我们有些同志却原来是出乎意料的害怕！有迹象表明，越南对苏联这次的表现相当恼火。那些跟苏霸跑的国家，对于靠苏霸到底靠得住靠不住，产生了新的疑虑。

至于现代武器，也没有什么可怕。有些东西，象“激光武器”尚在研试之中，“冻弹”之类纯属谣言，编造者是欺负我们有些同志缺乏科学知识，且不去说它；就是原子弹、氢弹吧，敌人也不敢轻易地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使用的。纵使真扔吧，他们多，扔一百个，我们少，也总能扔它个把。那么大的杀伤力的武器，一个也够他受的。战争是相互的。敌人的参谋长大概比我们某些同志更会核算这个问题。

这次自卫还击战斗的伟大胜利，是一个很好的教育人民的题目。我们党的各级宣传部门，要广泛动员各种力量，充分发挥各种宣传工具的作用，对工人、农民、学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干部和各界人士进行生动具体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应该响亮地提出：向英雄的边防部队学习，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全心全意为实现四化、保卫四化，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而英勇奋斗！现在有些人出现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思想委琐，光为个人打小算盘，不讲革命理想，不讲国家前途。这是很不好的。应该抓住这个机会，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教育，努力扭转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不健康的社会风气。我们要突出地宣传在自卫还击战斗中涌现的英雄战士、英雄民兵、英雄支前人员，学习他们为人民、

为国家、为社会主义奋不顾身的高尚品质，鼓起为实现四化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反对个人主义，鄙视个人主义。很久没有提这些问题了，现在正是很好的时机，我们在思想战线上要真抓一抓，抓出效果来。

（第5期，3月12日）

开展一个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 宣传教育活动

当前，思想理论战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迅速动员起来，根据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向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广泛深入地进行一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

建国三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坚持还是背离这四项基本原则，决定着我国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决定着中国向何处去，决定着能不能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林彪、“四人帮”从“左”的方面，歪曲、篡改和破坏这四项基本原则，把我们推向几乎亡党亡国的灾难深渊。两年多来，通过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在这方面的罪行，使全国人

民极大地提高了觉悟，解放了思想。当前总的形势很好。但是，党内外有极少数同志，中了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还没有觉悟过来，甚至错误地认为，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不利于党的领导，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不利于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上也有极少数人，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右的方面怀疑和否定这四项基本原则。还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打着“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的旗号，利用我们在转变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困难和问题，利用我们队伍中思想不解放的同志的某些不慎重的言论和我们某些思想虽解放，但是却忽略四项基本原则的同志的某些不慎重的言论，兴风作浪。他们恶毒诋毁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咒骂“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扬言要“坚决批判中国共产党”。这在一部分青年中间引起某种程度的思想混乱。在这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下，一些人冲击机关，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败坏社会风气。这些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不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因此，当前我们一方面必须坚定地继续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另一方面要用巨大的努力同这

些错误的思潮作斗争。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如果不彻底战胜这些错误的思潮，坚决正确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

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战胜错误思潮，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严重斗争。毛主席说过，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我们要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坚持正面教育为主，对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精心地进行深入细致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决不能简单化，要认真地研究这些思潮产生的根源，分析它错在哪里，什么是正确的，循循善诱，以理服人。有些青年人，当他们开始懂事的时候，听到的是被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看到的是被林彪、“四人帮”糟蹋破坏、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的假社会主义，这就使他们产生了一些模糊认识，或者把林彪、“四人帮”的假社会主义，错误地当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觉得社会主义不过如此，感到失望，产生了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思想；或者用林彪、“四人帮”的那一套，来看待我们党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错误地把我们党拨乱反正的种种努力，看成是“右倾”，

是搞“修正主义”。因此，现在出现的这种情况，不论是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也好，或者把我们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策措施，诋毁为“修正主义”也好，就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这四项基本原则，缺乏全面的、系统的、正确的认识，都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上，对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東西，还没有得到澄清。因此，在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战胜这种错误思潮的政治教育中，一方面，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上，对这四项基本原则进行比较系统的、通俗的解释，使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有一个完整的、正确的认识；同时，又要注意划清正确与错误的界限。既要划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界限，又要划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林彪、“四人帮”的假社会主义的界限；既要划清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又要划清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同林彪、“四人帮”以“全面专政”为名搞封建法西斯专政，或以搞“大民主”为名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界限，等等。使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能够从正确和两种错误倾向的分析比较中，得出科学的结论，从而更加自觉地坚信四项基本原则，更加坚决正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从实际出发，把理论上的系统性和思想上的针对性结合起来，使宣传教育具有充分的说服力，避免一般化。四项基本原则，是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过去讲过不少。现在大道理还是要讲的，但大道理如果不结合具体的思想去讲，就会流于空洞的说教，引不起群众的兴趣，甚至产生相反的效果。一定要认真研究各个阶层、各种人员的思想，研究客观实际情况，特别要研究各种反面的论点，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解释，把思想教育搞深搞活。对于群众中提出的一些尖锐问题，要作出明确的回答，不能回避，不然就难以说服群众，思想教育就会落空。当然，要回答这些问题，不是讲一些空泛的套话可以解决的，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这也说明，要搞好这次宣传教育，克服错误思潮，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各级党的组织，特别是思想理论界，要紧张地动员起来，针对群众提出的问题，组织力量，真正下一番苦功夫，流几身汗，熬一些夜晚，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一个一个地加以回答。这样不仅有利于搞好这次宣传教育，而且会使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克服错误思潮，总的来说，是人民内部的问题，是坚持正面教育

的问题。但是，对于社会上极个别的害群之马和反革命分子，也要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决不能有任何的姑息和迁就。当然，就是对于这极少数害群之马，也要分析，加以区别。对于被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把持操纵的非法组织，不要轻易宣布为反动组织。要把那些把持操纵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同这些组织的一般成员区别开来。坚持打击首恶，争取胁从，教育、团结绝大多数受欺骗、受蒙蔽的人们。对于少数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人，要区别他们是一贯敌视和仇恨四项基本原则，还是因为个人某些要求未能得到满足而一时讲了一些怀疑、不满的话。对于前者，应该由政法部门根据他们触犯刑律的情节，依法处理。但抓人一定要少要准，一定要从严掌握。宣传部门要注意从中选择一些典型案例，作为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年的反面教材。对于后者，仍旧要立足于说服教育，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一般不要点名批判，不要组织群众辩论。即使经过教育，这些人一时思想不通，也要等待。实践将会使他们最终觉悟过来。至于有些同志在党的会议上为了研究探讨问题，发表了这样那样的意见，包括某些不妥的甚至是错误的意见，这是我们党内民主生活中的正常现象，是党章允许的，不要任意给他们扣上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帽子。

要坚持实行“三不主义”，一概不加追究。总之，在这次宣传教育活动中，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立足于正面教育，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只有对极个别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才采取必要的措施。千万不要扩大化。看不到“蚂蚁”不对，以为到处都是“蚂蚁”，更不对。此外，在对青少年结合进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教育的时候，既要教育青少年同资产阶级的思想腐蚀作斗争，反对不良倾向；也要支持群众中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和男女之间正当的交往以及正当的生活爱好，不要干涉过多。

当前社会上的错误思潮的出现，从根本上来说，是林彪、“四人帮”长期破坏造成的，但也是利用了我们大转变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以及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各级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在进行宣传教育活动中，要正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继续抓紧解决。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各级领导干部要到群众中去，关心群众的疾苦，对应该解决的问题，要认真加以解决。对一时没有条件解决的问题，也应向群众讲清楚，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到家，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决不允许因为反了社会上的错误思潮，就不认真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不去

认真解决群众迫切要求解决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掩盖自己的官僚主义。最近，中央下达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我们要在这次宣传教育中，在党内结合学习和贯彻，把我们党内和机关内的风气搞好。党内风气搞好了，就会影响整个社会风气。

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宣传教育活动，必须实行书记负责，全党动手。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一个很好的工作方法，就是由党组织的主要领导同志带头，直接到群众中去做时事政策报告，讲形势，交任务，提出注意的问题，批评不良倾向，效果很好。只是这些年来，很少这样做了。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先后几次在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恢复了党的这个传统，给各级党委作出了榜样。在这次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活动中，我们建议各级党委，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应亲自出马，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有的放矢地作报告，把整个宣传教育活动带动起来。各级宣传部门，要当好党委的助手和参谋，及时掌握思想动向，报告党委。并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推动全党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和组织形式，造成强大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舆论。中央和地方的报刊出版和文化教育部门以及思想理论界，要精心研究，写出一批理论联系实际，具有很强说服力的思想论文、理论著作、通俗读物和文艺作

品。工会、青年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以及工厂、商店、人民公社、机关、学校、研究所和街道里弄等基层组织，直接面向群众，在宣传教育活动中，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任务。我们要充分发挥党、团员的模范作用，发挥各个基层组织的战斗作用，同心协力，互相支持，互相配合，把这个宣传教育活动认真抓好。

应该看到，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克服错误思潮，既然是一场思想斗争，必然会引起各种议论。“是不是又要反右派了？”“又要收了？”对于这些议论，要给以明确的回答。今天我们党正在用很大的气力，解决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的大量遗留问题，现在怎么会又去搞什么反右派斗争呢？至于是“放”还是“收”的问题，在人民内部，我们党始终采取放的方针。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讲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永远不会收。但是，坚持放的方针，决不是给反革命分子以言论自由，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对于人民中的一些错误思想和思潮，进行思想教育，加以引导，是为了使人民群众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更好地前进，这也说不上是什么“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会要求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要继续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同时要坚决克服权力过于集中的官僚主义、赏罚不明现象和小生产

习惯势力的影响，以利于人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克服错误思潮，正是为了排除“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精神，继续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第7期，4月9日）

关于悼念文章的写法问题

我们有些很好的老同志，被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路线迫害致死，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报上发表一两篇悼念文章，追思故人，激励生者，是有必要的。这类文章的重点要放在什么地方呢？应该是正面叙述不幸逝世的老同志一生如何能忠心耿耿、百折不挠地为人民事业而奋斗。这样，才鼓舞和教育读者。但是，有的文章常常过多地描写林彪、“四人帮”路线的执行人怎么迫害死者。这一点需要考虑。国内外读者看了这种东西，得悉“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内部搞残酷斗争的许多具体情况，将造成不良

的后果。一些本来怀疑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会更加不满。很多人可能引起对犯错误的人过激的愤懑情绪，也将使很多犯错误的人恐慌不安。报刊编辑部看到这样的文稿的时候，要注意向有关的家属和其他同志做思想工作，说服他们作必要的修改。

（第8期，4月12日）

在宣传报道中 要正确称呼少数民族

社会科学院转来民族研究所孙宏开同志的一个意见，指出：一些报刊在有关我国民族名称报道方面，存在几个问题：一、出现了解放前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诬蔑的称呼。例如，对独龙族的称呼，解放前称他们为“猿人”、“猿子”，这是带有歧视性的称呼。解放后周总理曾亲自听取独龙族代表人士对民族名称问题所反映的意见，后经国务院正式批准，定名为独龙族。但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西藏日报》在一篇报道中，竟把“独龙巴”和“猿巴”并列称呼。二、出现了未被国家正式批准公布的新的族称。一九七八年

五月出版的《人民戏剧》第五期上，出现了有关氐族的宣传报道。现在我国正式公布的五十四个少数民族中，并没有氐族这一族称。氐族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已经消失的少数民族，但《人民戏剧》中讲的是现实生活中的氐族。对此，四川省民委及平武县委的有关领导同志提出了意见。三、有的报纸，对同一民族族称译音不一致，如分布在中尼边境的一支少数民族，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报道时称“舍尔巴人”，而《西藏日报》的多次报道中则称“夏尔巴人”。

国家民委认为，孙宏开同志提出的问题，是应予重视的。凡是国家没有确认批准的民族名称，特别是带有歧视和侮辱性的名称，均不应在报道中出现。

（第8期，4月12日）

胡耀邦同志谈如何 把对外宣传搞得更好些

按：今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宣部召开了一次新闻、广播、刊物对国外宣传报道工作的汇报会。会上有关同志简略汇报了过去“四人帮”极左路线破坏的情况，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对外宣传报道工作取得的初步成绩，以及如何改进对外宣传报道工作的意见。胡耀邦同志在会上讲了话。四月三日，耀邦同志又就对外经济宣传问题写了一个批示。现将讲话和批示的要点整理如下。

一、我对对外宣传的情况很不了解，这次是初步接触这个问题。建议部务会议今后每年都要讨论一、两次。

总的说，多年来对外宣传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同志们是努了力的，很辛苦的，是很想把事情搞好的，这应当充分肯定。但是，我们的工作还不适应外国朋友的希望，他们对我们还不满意，也不适应中央

要求搞得更好的希望。所以需要不断努力改进。

二、为了改进工作，有的同志提出要解放思想，肃清流毒，这我赞成。什么流毒？说有极左的流毒，我赞成。我说也有主观主义的流毒，即想当然，从内容到表达形式都是主观主义的东西。有些宣传主观主义到了荒唐、愚蠢的程度，例如把“抓纲治国”等国内政治用语生搬硬译，使人不能理解。要下决心改。凡属主观主义的东西要经常破除。对外国人讲话，不能不看对象。毛主席讲了反对党八股，八大罪状之一就是不看对象。不看对象还不是主观主义？

两年多来，党中央真正地搞了“三不”主义，除了违法乱纪的之外，对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没有抓辫子、打棍子。为什么对“左”的错误、主观主义的错误不能大胆地进一步地去改呢？有人说是“心有余悸”，我不赞成。搞意识形态工作容易犯错误，要慎重。但是，我们做工作，要拨乱反正，快马加鞭，这就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差错。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我就讲过我们没犯过错误的同志可能犯错误，在座的每个同志工作上出差错都很难免，所以不要乱扣帽子。这是中央坚定不移的方针。当然，违法乱纪，叛国投敌，那是另一回事。

三、我们对外宣传应该搞得更好。首先要向国外

介绍国内新闻，介绍国内情况。宣传国内的东西，目的究竟是什么？过去讲是为了“促进世界革命”，我看这是大话，现在不宜这么提。对外宣传面向谁呢？有些同志说主要对象是“中间分子”。如果是指这样的意思，即我们无论是向国内还是国外作宣传，都要照顾到占读者、听众的大多数的中间分子，不要唱高调，这是对的。但是，我看我们对外宣传的对象还不如说就是面向外国人。不管你是左派、中间派还是右派，是友好人士还是敌对分子，是统治者还是普通人民。当然，我这是就总的方针说的，总的来说，我们的对外宣传就是要面向外国人，力争向尽可能多的外国人作宣传。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具体进行宣传时，可以不顾及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党派、不同职业以至不同年龄（老、中、青）的人们的不同兴趣和要求。我们现在对内、对外的宣传工作，都有一般化的毛病，就是由于没有针对不同对象，搞出各自的特色来。

我们对外宣传要有这么一个标准：真实地（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丰富多彩地（经济、政治、文化、人民生活、科学、技术、文艺的以及中央和地方的）、生动活泼地介绍我国情况。主要是宣传报道新中国。为了宣传报道新中国，旧中国的东西也得谈一些。时间

上尽可能及时，尽可能地快。但是，如果把速度放到第一位，也可能要犯错误。我们设备差，要审稿，时间上只能做到尽可能及时。当然工作方法总是要改革的，恐怕得一、两年才能改好，所以我们把尽可能及时放在第四位。真实地、丰富多彩地、生动活泼地、尽可能及时地介绍新中国，这句话就这么个顺序，你们看妥当不妥当？

我们要实实在在地规定我们对外宣传报道的任务，不要硬去加上什么“提高左派思想”呀，“争取中间群众”呀，“分化上层人士”呀，规定这些政治目标是不大可能达到的。怎么能设想，单靠我们的对外宣传就能影响人家一个国家内部左、中、右各派政治势力的发展变化呢？我们搞对外宣传主要的还是为了增进各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为了创造有利于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际条件，也包括尽可能有利于促进国际反霸斗争。

在宣传报道中，对于我们的缺点可以适当地讲，有些丑事不必讲。我们还落后，工作还有缺点、困难，这可以讲。但我们不是为宣传落后而宣传落后，为宣传缺点而宣传缺点。我们在宣传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同时，可以而且应该讲我们的落后、困难以及工作中的某些失误。宣传今天的奋斗情况

时，要适当地讲讲历史：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一百零九年的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应当适当讲讲落后的历史原因，这里面包括林彪、“四人帮”的破坏。

有关国内情况的对外宣传报道，必须精益求精，做到比较有系统。刚才同志们说，我们的宣传太零碎、空洞。我们要把一条战线、一个方面、一段历史、一个人物、一个地区、一个政策；要把中国的农业、工业、铁路、林业、教育等等，从点到面、从典型到概貌都加以介绍。人家是外国人，我们的宣传有典型又有概貌，就可避免零碎；有血有肉，就能避免空洞。

四、我国经济建设情况，是许多外国人都很关心的，应该成为我们对外宣传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我们的经济建设方针、政策和各个具体措施的一些提法，完全是从讲给我们自己的干部和人民听着的。比如，什么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次序安排，什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一切事业，什么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什么发挥两个积极性，用两条腿走路，什么鞍钢宪法，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现在的什么在调整中前进，在前进中调整，等等，等等，完全是讲给我们自己人听的。我们自己人听得懂，当然农村中一部分人和城市一部分居民有些也不懂，但许多人听得懂，听了能产

生力量。

至于外国人呢？这一套提法，可能有极少数政府的当权者和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听得懂，但这种人完全可以从我们国内的报章上、对内广播上，或从谈判中知道，没有必要再从我国的外文广播中去找。而用这一套东西向广大的外国人宣传，简直是“对牛弹琴”。长期以来，外国友人说我们的对外宣传是失败的，是不是同我们这种外文广播内容有关？我估计，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

那末，我们应该如何作对外的经济宣传呢？在我看来，主要是介绍我国经济建设的概貌、态势和各种具体成就。这种内容包括许多方面，如：

（一）我国经济，以及科学、教育、文化每个时期（一段时间、一年或几年）的进展概况。

（二）一个地区，特别是许多外国人关心的地区，如上海以及西藏、新疆、东北、云南等省、市、区经济建设进展概况。

（三）各条战线的进展概况（如石油、海运、民航、公路、有色金属、地质资源；如各种轻工业，如农业上的农、林、牧、副、渔各业，每业又可分别介绍）。

（四）一个重大工程、基地的发展概况。

（五）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的新人新事。

(六)外贸、外资、外国专家、侨胞投资等情况。

(七)中国的旅游地区和旅游介绍。

(八)各种尖端、名牌产品介绍。

等等，等等。

要这样宣传，当然很不容易。这需要对外宣传战线上的同志们，首先是领导同志大胆解放思想，振奋革命精神，敢于打破陈规，敢于别出心裁。这样，就得下决心靠自己另外撰写稿子，另行编辑，并且独立负责。

五、国际新闻和评论问题。开国以后我们对外国新闻和国际评论采取慎重的方针是正确的。这是毛主席、周总理定下来的。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威望非常高，是第二个十月革命。五十年代初，中国的影响比苏联大得多。但当时我们技术装备落后，没有经验，对许多事也不熟悉，所以采取慎重的方针，怕在外事活动中出乱子，对天下大事一般少报道或不报道，对国际局势一般不发表评论。现在可否逐渐稍作一些改变？我看是可以的。例如，对国际上重大事件、突发性大事，客观报道一些是可以的。重大国际事件，新华社一声也不吭，好象根本不知道，也不好。以后，还要尽可能多搞些国际评论，当然搞很多也有困难。有个叫梁厚甫的，在美国，写评论，有些观点不一定对，但看来这个人肯用思想的。我们这么个社会主

义国家，有这么多人，不能有一百、一千个梁厚甫，而且水平比他还高？应该有这个信心嘛！革命是干出来的，我们要敢想，敢干，要勇于实践，善于实践。不要把大家封闭起来，不敢想，不敢做。国际新闻和国际评论也不要搞瞎指挥，不要统得太死，要适当放宽些。即使出点乱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尽可能争取不出大乱子，小乱子是经常会出的。重要的是，要发挥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我们中宣部主观上想避免瞎指挥，如果你们发现了我们有这个问题，请随时提意见。

六、对外宣传有不同的单位、战线，有广播、新闻、报纸、刊物、口头宣传、文化交流、旅游、图片等。各个不同性质的单位，都要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根据各自的特点开展工作，你追我赶，精益求精。我们对来华参观、旅游的外宾的口头宣传要好好地研究。去年年底，对外宣传局同旅游部门一起搞过一个文件，印发到各地征求意见，不知道执行起来有什么新的问题？

我们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好的、坏的都要自己独立思考、调查研究。国内吹风的人可多了，早上吹这个风，晚上吹那个风，我们有些宣传干部经常上当，跟着风走。大政方针，党中央不断有文件，要好好领

会，不可忘记。对每天接触到的和出现的新问题，我们一定要养成这样的一种习惯，八个字：“调查研究，独立思考”。我们上了多年当还不总结点经验？经验就这八个字。每个单位都要根据自己的特点，你追我赶，精益求精，按照自己的特点办事。

七、干部问题。增补人好办，反正有的是干部。我与电影局同志讲，我根本不相信那种没有电影导演和演员的说法。要打破迷信。什么青年演员、导演，如果登广告招考，然后考试测验，把条件开出来，招一、二百名很有才能很有前途的人，我看很快可以做到。我们的事业若搞不上去，就对不起人民。除了这个招考的办法外，发现特别好的可由中组部、中宣部指定抽调。现有的干部要提高政治水平、业务水平、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要艰苦奋斗，发愤图强。每个同志，不管是新的老的都要如此，不应该把事业荒废了。

八、要好好地发挥外国专家的作用，团结他们，关心他们的生活。内部请来的外国专家，不管是不是党员，都是我们的同志。有的帮我们工作几十年，要好好关心他们，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学习，发挥他们的作用。中国人有两条，一条是说话算数，一条是对得起朋友。不能忘记这一点。

（第9期，4月17日）

组织各方面力量 积极占领精神生活阵地

二月二十八日，胡耀邦同志提出：希望北京带个头，把理论的、政治的、时事的、艺术的、科技的各种活动开展起来，占领精神生活阵地，扭转被林彪、“四人帮”破坏的社会风气。北京市委宣传部十分重视，先后多次约请有关方面负责人进行研究。最近就此写了一个情况报告。摘要刊载如下。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北京市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等各条战线，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突出的是，有一些人，特别是一些青少年，思想比较混乱。少数人在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根本原则问题上，发生怀疑和动摇；有的成了害群之马。产生这些问题，主要是林彪、“四人帮”长期破坏干扰造成的。同时也

必须看到，前一时期党的政治工作薄弱，思想教育跟不上，精神文化生活比较贫乏，满足不了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需要，也使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

根据三中全会精神和最近中央一系列文件以及中央负责同志讲话精神，结合贯彻有关占领精神生活阵地的指示，大家认为，首先要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抓好小平同志报告中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按照中宣部的部署，由市委宣传部出面组成一个小组，把宣传理论单位组织起来，分工合作，订出规划，结合北京市的情况，写出一批较有份量的文章和小册子，进行广泛宣传。市级宣传部门已经开始就社会发展规律和工人阶级历史使命；民主与法制；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英勇奋斗；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爱国主义等几个问题，组织一系列报告会和讲座。工、青、妇等群众组织以及文化、出版、科技、教育等单位，传达耀邦同志有关讲话精神后，已经着手组织各种活动。如市总工会，从三月二十一日以来，已经在工人文化宫、工会干部学校等处，组织了十次中小型政治理论、文艺创作等方面的报告会和讲座；举办了工人书法展览和青年工人花卉画展览；办起了工人业余美术学习班；还在继续考虑筹办音乐创作、文学创作、诗歌朗诵学习班。这些活动，对基层单位起了推动作用。团市委

在三月底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决定围绕生产、学习和工作，根据青年特点，开展好四项活动：

一、有步骤地开展公益活动，如发动青年按规划把荒山野岭绿化起来，把工厂、学校、街道美化起来。

二、开展谈心活动。

三、开展各种各样的报告、讲演活动（最近已与有关单位一起组织了三次报告会，为基层团组织举办报告会培训骨干）。

四、开展有利于青年身心健康的文化体育活动，组织各种比赛、演出。市文联除目前正在公园等处举办国画、版画、木刻等美术展览外，第二季度还拟举办十来个展览，以丰富广大群众的精神生活。市科协组织的科技讲座已经讲了三十多讲，还办了数学比赛等，今后还要继续办好。

但是目前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这项工作涉及的面较广，除了各级党的宣传部门要抓好这项工作外，各个部门，上上下下，都要行动起来。其次，普遍反映活动的场地太少。如北京市区青少年的活动场所前些年不少被占用，大都没有恢复。首钢这些年职工人数不断增加，但活动场所挪作他用，不断减少，原有一个能容纳五千人的体育场，盖宿舍占用了；三个露天和室内剧场，只剩下一个；五个图书馆也只剩

了三个。以上这些问题，我们已责成有关负责同志进行调查研宄，提出办法加以解决。

（第10期，4月20日）

敢做思想工作 制止闹事苗子

文汇报反映：上海师范学院党委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敢于引导学生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问题，把思想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促进了学校的安定团结。

前一时期，学生们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行使民主权利，提出了种种问题。师院党委注意掌握青年学生的思想动向，深入学生了解实际情况，不怕被学生说成“对立面”、“压制民主”，敢于面对面地做思想工作，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他们把了解到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分门别类地作出妥善的处理。

第一种，要求合理、方法对头的。去年十一月初，学院复院不久，在教学、后勤等方面暴露出不少矛盾，学生纷纷写大字报提出“呼吁”。那时正逢学院召开团代会、学代会，一部分学生要求把原定议程改为揭露

学院工作矛盾。院党委研究了这一要求，认为是合理的，不解决的话确实要影响教学秩序，于是决定增加一天议程来讨论民主办校问题。院党委和各部处负责人都会到会听取意见。会上，学生提了近百条意见。会后，党委书记王乐三带领总务处长、团委书记等干部，深入矛盾最尖锐的伙房，切实帮助解决问题；还建立了伙食民主管理委员会。这样，既解决了矛盾，又调动了学生民主办校的积极性。

第二种，要求是合理的，但方法不对头。对此，院党委坚持到群众中去做工作，在指出方法不对的同时，对合理要求予以妥善解决。学院有一部分来自农村的学生，原是民办学校教师，与其他调干生待遇不同，只带百分之八十的工资，而且多数已婚，生活确实有困难，一天菜金只有二角钱。社会上出现一些闹事事件后，他们也准备闹一闹来解决困难，为此成立了全院的串联会，并扬言要和别的大学学生串联，一起游行，搞到市革委会去。院党委及时了解这个情况后，主要负责同志到学生中去做工作，指出：“要求是否合理也是相对的，有的要求本身是合理的，但如果不注意方法，影响了全局，那就可能变为不合理，问题也难以解决。”对青年学生讲清楚是非利弊，指出问题弄到社会上后会带来什么后果。同时又通过正常的

渠道，实事求是地向上级部门反映这些学生的实际困难。做了这些工作后，一部分发起串联的学生受到了教育，还与党委负责同志一起做别的同学的工作，终于制止了事态的扩大。对这部分同学的困难，院党委正拟安排勤工俭学劳动予以解决。

第三种是，要求不合理，方法不对头的，院党委旗帜鲜明地坚决制止，讲话不留口子，但工作做得细。今年一月，中文等专科(二年制)部分学生提出了转本科的要求，串联了物理、化学、数学等系的学生近千人，酝酿召开全院专科生大会，通过“决议”，向市委“请愿”。针对这一情况，院党委会同有关的党总支领导干部一起到专科生中做工作，明确指出这种要求不合理，不顾国家计划，也是不可能达到的。党委还找了其中党团员骨干，指出事态扩大的危害性，发动他们做群众思想工作。由于党委旗帜鲜明，工作做得细，问题得到了解决，专科生没有停一堂课，学习情绪也稳定下来了。

(第11期，4月23日)

建议重新在领导干部中 号召学习焦裕禄

山西临汾纺织厂亢振洲写信给红旗杂志说：十五年前，开展学习焦裕禄的活动，那时的社会风气，干部作风，我们仍记忆犹新。但是，十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干部中严重滋长了官僚主义、搞特殊化、弄虚作假、只图私利的坏作风。不少领导干部不体察民心，不听取民意，连“群众在想什么”这个最起码要求都不知道，连群众最起码的生活要求都不闻不问。想想焦裕禄，这些人应该感到惭愧和失职。现在，有的领导干部阻碍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他们眼中只有“我、我、我；权、权、权”。对于这些同志，要使他们明白：“我们是干什么的？！”使之翻然改正。因此，建议报纸上重新刊登关于焦裕禄同志的通讯，在领导干部中开展学习焦裕禄的活动。

上述意见值得注意。我们的报纸、广播，应该结合关于抓党风的宣传，继续提倡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

干部认真学习焦裕禄。象焦裕禄同志这样的好干部、好党员，各条战线肯定都有。我们宣传部门要注意去发现、总结，抓住典型，大张旗鼓地宣传。在宣传好人好事的同时，也要适当地有选择地揭露某些坏人坏事。

（第11期，4月23日）

七

坚持四项原则 继续解放思想

冯 文 彬

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分析了我国当前的政治形势，回答了思想理论战线一系列根本问题。尤其重要的，是重申了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强调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这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来，直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

我的体会是，坚持这四项原则，是贯彻三中全会方针政策，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重要的保证，其意义非常重大。

我只就小平同志的报告中提到的两种思潮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小平同志指出，目前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者反对这四项原则的思潮。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注意。这种思潮是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表现，就它的社会历史根源来说，是同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分不开的。从最近看到的一些内部材料反映的情况看，更加说明了这一点。

林彪、“四人帮”是四项原则的凶恶敌人。

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

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

他们反对党的领导，“踢开党委闹革命”，煽动派性，鼓吹无政府主义。

他们制造现代迷信，歪曲、篡改、割裂和伪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玷污和毁坏这面伟大旗帜。

最近一个时期，社会上极少数煽动反对四项原则的害群之马，有的就是林彪、“四人帮”的残渣余孽。例如上海的所谓“民主讨论会”的一个头头乔忠令，十年前是跟着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闹“打倒一切”的一名急先锋。他今天还扬言要效法王洪文搞工总司的阴谋策略，搞一个“宁沪杭三角洲机构”，“让退伍军人、知青出面”闹事。

社会上还有人数极少的仇视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他们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可以利用我们粉碎“四人帮”以后还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一些经济生活上的暂时困难，煽动一部分人兴风作浪，干扰和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以上这两种人都是极少数，是那股反对四项原则的思潮的主要煽动者，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进行调查研究，坚决予以揭露打击。

另外，还有三种人：一种人是存在这样那样个人的具体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有不满情绪，因而怀疑或者反对四项原则。

还有一种是思想不稳定的青年。他们讨厌林彪、“四人帮”的假高举或现代迷信，又不懂得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碰到任何一种对他们是陌生的陈旧思想（从基督教到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误以为是宝贝，盲目地跟着社会上的某些思潮跑。

还有一批一贯表现不错，关心国家命运的青年。他们喜欢思考、研究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但是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训练，不大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面情况，不大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缺乏实践经验，在探讨问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有时发生离开四项原则的重大错误。考虑

到这一代青年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岁月里长大的，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政治思想上发生这样那样的差错，有历史的原因，我们应当谅解和帮助他们。只要给以正确的引导，他们的错误是不难纠正的。

这后面三种人同前面两种害群之马应当严格地区别开来，针对他们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认真的细致的耐心的思想工作，进行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还要引导他们了解我们国家当前的实际困难情况，认清这种困难的性质同旧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是根本不同的。只要我们坚持四项原则，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搞好各方面的调整、整顿工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暂时困难，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这是当前理论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思想工作的一项主要内容。要靠说服、引导，不能靠压服、吓服。不要对有那样那样不妥当言论的青年随便加上反对四项原则的罪名，更不要随便动手抓人。否则，我们就会犯错误。

现在我再讲讲小平同志讲话中提到的另外一种思潮，那就是，“错误地认为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不利于党的领导，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不利于社会主义道路”。

这种怀疑或者反对三中全会方针的思潮，也不是偶然发生的，有它的历史原因。因为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理论是非、路线是非、政策是非，肃清其流毒不是一个短时间可以解决的。对于有这种思想的大多数同志，还是要大家共同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基础上，全面理解和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上述大多数同志完全不同的、极少数怀有恶意的人，他们或明或暗地反对三中全会。最近，有那么一些人散发油印材料，攻击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党的整个路线，特别是攻击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攻击党中央领导同志，这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思潮。他们妄图使我们倒退到粉碎“四人帮”以前的那种状况中去，还要我们继续“批邓”，改变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毁灭我们的党和国家。如果他们得逞，我们这些人岂不是又都成了“正在走的走资派”，都要被统统打倒了吗？所以，这股思潮同刚才讲的“民主讨论会”代表的那股思潮，是林彪、“四人帮”思想体系的一对双胞胎。在某种意义上说，这股思潮更加危险。因为“民主讨论会”那种东西，反动性很明显，只要彻

底揭露出来，人民比较容易识别。最近公安部门对极少数的害群之马的打击，群众拥护，没有遇到多大阻力，可见平息下去并不很难。而这股思潮伪装得很革命，在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影响的一部分青年中，甚至在我们一些思想有些僵化的干部中，会发生欺骗作用。

我们还是要按照小平同志多次讲过的，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要坚决宣传和贯彻这个方针，才能正确地坚持小平同志重申的四项原则。现在看来，贯彻三中全会的方针坚决的地方，对群众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主动去做工作，就比较安定团结，社会秩序也比较稳定，干部和群众中的错误思想倾向也比较少。有些地方贯彻三中全会方针不那么得力，干部和群众中的错误思想倾向就比较突出。要做好这方面工作，有些思想倾向是要引起我们注意的。

比如，有些同志对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不理解，感到“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明，蛮办法不行，没法干”。极少数同志怀疑三中全会的方针是否“右了”。个别人甚至说什么“三中全会以后这一段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从三中全会到现在这几十天是“逆风千里”，是“一场浩劫”，“而且这场浩劫比文化大革命有

过之而无不及”。有的同志对前一段在党中央领导下，继承和发扬毛主席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对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所取得的重大成绩表示怀疑。有的同志说：“小平同志这次讲坚持毛泽东思想，对了，以前讲完整准确地对待毛泽东思想，不好。”有的说：“小平同志这次讲话旗帜举得高，就是有一点不满足，说毛主席甚至有严重错误，我认为过了火。”有的同志甚至认为党校讲课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路线，就是“毛主席旗帜举得不高。”

这里仍然存在什么叫高举这个老问题。三中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不是砍了旗？究竟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改正毛泽东同志的某些失误是高举，还是坚持本本主义和“句句是真理”才算高举？我想这个问题在党内还要继续解决。否则很难继续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我们应当看到，如果不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历史上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不解决，冤、假、错案不平反，我们决不可能有今天的安定团结局面，更谈不上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国民经济的调整

了。如果对过去的什么都不许动，今后一切都照搬照抄，我们怎么能总结历史经验，贯彻三中全会精神、调整国民经济和改进今后的工作呢？那种静止的、僵化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是根本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如果还要坚持，那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只能象三中全会公报中指出的那样，根本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坚持四项原则，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所以，四项原则一定要坚持，林彪、“四人帮”的假“高举”和“句句是真理”一定要批。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都是为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了反对林彪、“四人帮”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歪曲和篡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

党校有些学员反映，目前不少地方，关于分清两条思想路线的教育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因此，继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和贯彻四项原则，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敢于在新的长征中思考新问题，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是完全必要的。否则，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在充分肯定理论宣传战线的成绩的同时，对于理论宣传工作也指出了一些问题。我感到这是对我们理论宣传工作者的亲切帮助和严格要求。我们要贯彻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的精神，更加信心百倍地把理论宣传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新的长征中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

现在国内国外都吹来这么一股风，那么一股风，什么“前一个时期揭批‘四人帮’就是否定毛主席”，“三中全会的方针变了”，“中央要收了”，等等。我们千万不能心有余悸，徘徊观望，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对于前面所说的两种思潮，不能低估，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要惊慌失措，不要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又犹豫起来。在前进的道路上，风浪总是会有有的。如果我们大家都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干，我们能够在四个现代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吗？

总之，这两年半，我们的党中央正确地总结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我们应当坚定不移、信心百倍地在党中央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继续发扬民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只有这样，才能坚持四项原则，

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三年调整的胜利，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

（第12期，4月27日）

“恐右症”的提法不够严密

提出反对“恐右症”，用意是要帮助一些同志解除余悸，起来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作斗争，改变那种认为“左”比右好，宁“左”毋右的精神状态，敢于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但是它也可能造成一种误解，似乎右并没有什么不好。背离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倾向，无论是“左”还是右，都对革命事业有害，都应该反对。我们的干部经常警惕自己不要犯“左”的或右的错误，是无可厚非的。至于有少数同志在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时犹豫不决，生怕将来又被批判为右了，这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思想流毒没有肃清，路线是非不明。重要的是引导他们提高觉悟，识别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而不宜只是批评他们不该“恐右”。

（第13期，5月7日）

在国际关系中不要提“忘恩负义”

最近，在宣传对越南自卫还击战的伟大胜利时，出现有指责越南“忘恩负义”的说法。在越南人民反抗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中，我国曾经给予了巨大的无私的援助。这是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从来不把它视为施舍的恩惠。所以，在揭露越南领导集团时，不宜用“忘恩负义”一类的语言。

(第13期，5月7日)

一定要开展群众性的宣讲工作

编者按：这是人民日报记者章世鸿同志写的一份意见(摘要)，原文见该报《情况汇编》一一七八期。它提出了目前党的宣传工作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我们的宣传工作没有真正做到群众中去，基层的宣传工作十分薄弱，原有的群众性的宣讲工

作基本上停顿下来了，造成上下脱节。大道消息难得到基层，小道消息却到处流传，以致上面思想愈活跃，下面反而愈混乱。文章写得简明扼要，问题提得一针见血，值得我们做宣传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一阅。建议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认真加以研究，采取得力措施，把群众宣传工作切切实实开展起来。

我在下面采访，深深感到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对中央的一些重大政策，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了解太少，往往凭道听途说来判断问题，这是造成思想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三中全会的一些文件只传达到党内十九级以上干部，多数基层干部不了解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的讲话，又没有人比较详细地向他们介绍公报的精神，因而，对许多问题搞不清楚。例如，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是涉及思想路线的一件大事，但是许多基层干部至今不了解它的政治意义。对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意义也认识不清。大道消息很少，小道消息却到处流传，这就给坏人和思想不健康的人以可乘之机，把许多事情弄得真真假假，是非莫辨，这怎能不造成思想混乱呢？

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宣传，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例如为什么不再提“阶级斗争为纲”了。如果我们

对于干部和群众进行广泛的宣讲，完全可以让他们弄清楚这个问题。但没有人做这样的工作。基层干部和群众凭直觉去判断问题，简单地理解为“现在不抓阶级斗争了”。这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是因为理论上弄不清楚造成的。误解到处发生，相互影响，人云亦云，就变成一种舆论，而坏人和少数思想不健康的人就来利用这种误解。最后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许多人都反对理论家的一些正确论断。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不是反对，而是理论上没有弄清楚。

对一些重要政策，下面出现一些思想不通，也是这样造成的。为什么要给地富反坏摘帽？为什么要给资本家发定息？也没有人向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讲清楚这个问题。

不能认为，《人民日报》上发表几篇文章就能把问题解决了，并不那么简单。第一，基层干部和群众很多人看不到《人民日报》；第二，由于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的限制；《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也未必人人都能消化；第三，《人民日报》的有些文章并不是针对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实际写的，也不能回答他们中间存在的具体思想问题。

我感到“四人帮”的一套办法比较厉害。他们在上海，几乎每个工厂都搞宣讲员、理论队伍。“四人帮”

提出什么理论问题，就动员下面都来做文章，采用各种方式把他们那套反革命理论灌输下去。工厂里的理论队伍并不照抄报纸，而是把报纸上的东西同本厂实际结合起来搞出很多名堂，其影响确实不能低估。就基层来说，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还需要花极大的力量来抓，而我们还没有开始做。现在，基层的一切宣讲工作几乎全部停顿了。这样，造成上下脱节，理论和基层实际脱节，其结果是上面的思想愈活跃，报纸的讨论愈活跃，下面的思想问题就愈多，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大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光依靠少数理论工作者是不够的。理论工作者的文章，在中层干部和知识界有影响，而在基层群众中影响不大，而且有些理论工作者也不太了解基层情况。也不能完全依靠政治工作干部。看来，要真正提高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思想理论水平，需要培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重新建立一支工农兵的业余理论队伍。如果把专业理论队伍比作正规部队，那么，业余的工农兵理论队伍则是广大民兵，他们的长处是生活在群众之中，比较了解群众的思想脉搏，中央的重要政策，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可以通过他们通俗地、有针对性地向基层干部和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勾通上下，使上面的东西准确地为

广大群众所理解。在群众中，这样的人才是很多的，问题在于各级党委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让他们更多了解中央精神，学习更多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这样可以及时澄清社会上许多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东西，把许多思想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从中央到地方的宣传部门应该提供各种宣讲材料，报纸则给工农兵理论队伍提供思想武器。就当前来说，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问题，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问题，就应该在群众中进行广泛有力的宣传。

最后，谈谈保密问题。我感到，保密制度，一要合理，二要严密。合理，就是说，凡不必保密的就尽量不保密，该保密多少就保密多少。有些事情，外国早已知道了，我们是否还要保密？在一般情况下，最好让中央的精神多同群众见面。例如，我国面临的一些经济困难，应该适当地让群众知道，这有利于调整工作的进行和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有人说，让群众多了解中央的情况会造成思想混乱，其实不然，往往是不了解情况才会造成思想混乱。正常的渠道不通，也迫使人们找各种不正常的渠道打听消息，甚至求助于外国报刊、电台，这种情况只能增加思想混乱。同时，凡应该保密的，就要严格保住，不要“漏气”。

（第14期，5月10日）

报刊要向读者负实事求是之责

上海知识青年、现在齐齐哈尔电视台工作的章琦同志，在四月份先后给《文汇报》和胡耀邦同志写信，对《文汇报》在三月七日，以《我要继续战斗在大兴安岭》为题，发表他的一封来信，以及四月六日刊登的《一个大学生是怎样堕落为小偷的》一文，提出尖锐批评。

四月二十八日，胡耀邦同志对来信批示如下：

这位青年同志思想有点偏激，对《文汇报》的看法是不妥的。但《文汇报》在处理他所提到的两篇稿子上，我以为确有缺点。

(1) 编辑同志刊登读者的来信，在文字上作点修饰是可以的，但更改事实是很不好的。修改观点，也要同来信人商量。报刊同志一定要同一切投稿者、来信者实行一种民主商量的正确关系；一定要尊重事实，向一切读者负实事求是之责。

(2) 一个大学生堕落为小偷一文，缺乏说服力。用这类事在报上作典型不很妥当。粉碎“四

人帮”以来，绝大多数报刊的文风有很大改进，但文章要充分说理，富于感染力这件事仍值得我们大家注意。

下面是章琦同志的信件摘要：

今年三月七日，《文汇报》在一版发表了署我名的一封信，一看标题，我的心就凉了半截，看完全文，我的心就全凉了。

我不得不遗憾的指出，贵报编辑这样想当然改稿的做法，是实在要不得的。不能为了宣传就不顾事实，随意改写，这对党的新闻事业会造成严重的损害。请你们把我的原稿和报上发的稿核对一下，里面几乎没有我的原话了。我真难以相信，这篇稿是我写的。容我直率地说，这是一篇编辑摘取我稿中的只言片语，凭“合理”想象编造出来的稿件，此稿违背了我的原意，并与客观事实不符。

在我的原稿中，根本没有“我要继续战斗在大兴安岭”的字样，连这个意思都没有，可是这句话不仅成了标题，而且成了文章的中心思想。我原稿说：“按照有关规定，我爸爸已向厂里提出了申请，厂里已经把申请报上去了，不久就能批复。”可是编辑却改为：“父亲的厂里也同意招收我进厂，只等我作决定了。”

我原稿根本没说：“但是一想到就要告别生活和战斗了十年的大兴安岭，心中又有点舍不得”，“大兴安岭比上海更需要我”，“于是，我决心继续战斗在大兴安岭”等等。我原稿的意思是明明白白的，主要是劝说知识青年别闹事，要珍惜安定团结的局面，要往远看，要向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为了表明我的决心，我决定不回上海接班，但不回上海并不等于就在大兴安岭啊！如果说“我要继续战斗在黑龙江”，则还可以。

今年四月六日，《文汇报》在一版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大学生是怎样堕落为小偷的？》的采访札记，他们抓住大学生中的一个小偷大做文章。据我分析，这篇札记的真实性很成问题，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那个叫刘××的大学生不可能到大学后才堕落为小偷，应该说他是个惯偷，或者他在粉碎“四人帮”前就是个小偷。《文汇报》为了达到他们宣传和影射的目的，在文章中说：“在中学期间……未发现有偷窃行为。”这完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勾当。稍有生活常识的人知道，偷窃总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不可能一天之内就堕落成惯偷。

（第14期，5月10日）

不要公开宣传“翻版仿制”

有关部门提出：最近人民日报刊载上海牙膏厂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后进行“翻版仿制”的消息，不妥。此事不宜公开宣传。在国际上，“翻版仿制”被认为不符合商业道德，违背专利法。目前我国积极开展来样加工贸易中，不少西方商人常常对他提供的设计可能被“翻版仿制”表示忧虑不安。有的关心我们有无专利法，也是出于这种考虑。现在我们报道“翻版仿制”的消息，将有损我国声誉，并给外国供货者索取高价以口实。

上述意见值得注意。希望各报刊今后不要发表有关“翻版仿制”的消息和言论。

（第14期，5月10日）

改造社会风气是全党的任务

两年半来，我们取得了揭批林彪、“四人帮”政治斗争的伟大胜利，被他们败坏了的社会风气也随之大有好转。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和生产秩序比较正常，青年中勤奋学习、艰苦劳动、遵守法纪、关心四化、热爱祖国的良好空气日益浓厚。但是，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恢复和发扬五十年代那种社会主义的优良风尚，还需要作艰巨的努力。目前整个社会风气特别是青少年的风气问题仍然引起普遍的关切和焦虑。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刑事犯罪率没有显著降低，特别是今春以来，青少年犯罪率还有增长的趋势。少数青年闹事，波及全国许多省、市。流氓乘机起哄，侮辱妇女，偷盗抢劫，破坏公共财物，十分猖獗。有些现象是骇人听闻的，罕见的。就一般风气来说，缺乏社会公德，不遵守纪律，不服从分配，公开宣扬个人主义，已经成了常见的现象。近来，在一部分青年中还出现一股盲目崇拜和模仿外国资产阶级腐朽和颓

废的生活方式的歪风，有的女青年甚至不顾国格、人格与外国人勾搭鬼混。尽管人数很少，却不能不引起严重警惕。在农村中，封建迷信活动、赌博、买卖婚姻等现象也有急剧增多的趋势。

建国以后，我国的社会风气，我国的青少年的精神面貌，曾经受到国际上的普遍赞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寻求社会出路和社会进步的有识之士，从中国青少年的身上看到了新世界，受到了很大的鼓舞。而现在一些外国友好人士却开始为我国青少年担忧起来。

怎么看社会风气的这种变化，怎样改变这种状况？

社会风气不是孤立的问题，而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综合反映。目前社会上的歪风邪气是林彪、“四人帮”连续十年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大破坏造成的恶果。在这十年浩劫中，他们颠倒敌我，混淆是非，把我们的党搞乱了，国家搞乱了，各种群众组织搞乱了，所有社会法纪、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全都搞乱了。真正的革命战士和善良的人们横遭摧残迫害，反革命势力以革命的名义干尽坏事，旧社会的渣滓乘机泛起，青少年一代受到严重的腐蚀毒害。同时，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在几千年优秀文化遗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被全盘否定而几乎毁灭，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陷于普遍匮乏和贫困。

几百万、上千万的青年难以升学和就业，苦闷彷徨，对前途缺乏信心。这种大破坏是如此严重，尽管两年多来我们已经把祖国从危亡的边沿抢救过来，但还只能说是“乾坤始转”，还需要我们用相当长的时间和十分艰巨的努力来进行各方面的调整和整顿。只有这样，整个社会风气才能从根本上改造过来。

社会风气的改造，是整个社会改革的一个部分。我们要彻底改变目前的社会风气，从根本上说，首先需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当前，就是要按照党中央的决定，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使之纳入持久的、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轨道。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经济较困难，城乡资本主义就泛滥，社会上歪风邪气就蔓延。生产力发展了，国民经济搞上去了，就能更好地解决社会风气问题。现在各个城市都有相当大数量的留城待分配青年和社会闲散青年。出路无着，生活困难，精力无处使，精神空虚，这是影响一些青年走上犯罪道路，造成社会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要千方百计，广开门路，积极地满腔热情地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除了政府的劳动部门和知青办以外，还要

发动整个社会，包括企业、街道、学校等各方面共同努力，统筹兼顾，全面安排，采取多种形式，安置就业。一时不能就业的，应当组织他们参加城市建设、市政工程、绿化工作、房屋修缮、短途运输，以及街道工厂、手工业和各种服务性行业的临时工作。暂时还不能安排事做的，也要把我们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暂时困难坦率地告诉广大群众和青年，告诉他们造成困难的原因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使他们看到前途光明，增强信心。同时，开办各种各样的技术学习班和读书班等，积极组织他们参加学习。

在同样的物质条件下，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状况如何，对社会风气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把宣传单位、政府部门、群众团体各个方面的力量都组织起来，密切配合，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移风易俗的艰苦工作。当前，这项工作要紧密切结合全面地深入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去做。要把整顿社会风气同各地正在进行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活动结合起来；把提倡社会主义的新风尚同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结合起来；把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同整顿法纪，重点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结合起来；把反对资产阶级的腐蚀的斗争，同用社会

主义思想去占领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精神生活的阵地结合起来。

改造社会风气，要着重于青少年一代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培养教育。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这一代青少年的道德风尚如何，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青少年处于可塑性很大的成长时期，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欲、模仿性和好奇心有充沛的精力，要善于引导，要强调正面教育，帮助青少年生动实际地识别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要把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同广泛地发动青少年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斗争，参加各种为人民服务的公益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使他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正确理解国家建设和青年前途、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民主与法制、自由与纪律、权利与义务等等的辩证关系，逐步树立起爱国家、爱集体、爱学习、爱劳动和自觉遵守法纪、维护社会公德的新风。要以表扬为主，善于调动青年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对于青年中个别屡教不改的害群之马和触犯刑律的分子，特别是那些教唆犯，要坚决绳以法纪，给予打击，不可姑息迁就。但也要注意使大多数青年从中受到教育，不宜一抓了事，流于单纯的惩办主义。我们国家现阶段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加之同国际上的

交往大大增加，国内外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腐朽的生活方式不断地腐蚀我们的青年。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风气问题，本质上是一场长期的腐蚀和反腐蚀的斗争。我们要教育青年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的腐蚀，但光有这种愿望是不行的，还要有正确的政策和方法。不能设想，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和简单搞禁令的办法，就可以把青少年关进“红色的保险箱”，杜绝资本主义细菌的入侵。相反，这样做还很可能徒然地引起部分青年的对立情绪。我们要敢于让青年经风雨，见世面，不要怕让青年接触一点反面的东西。当然，这不是说在这方面可以放任自流，重要的问题是抓紧思想政治工作。

要使青少年不被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所吸引，必须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要把广大青少年吸引拢来，组织他们参加各种各样促进身心健康的文化、科技、体育和娱乐活动。要让青少年宫、科学馆、展览馆、俱乐部、图书馆、阅览室、影剧院、体育场等充分发挥作用。各级青年团组织要出头组织和举办各种报告会、讲座、学术讨论会、科技表演、音乐会、诗歌朗诵会、歌咏比赛、体育比赛……。不要轻视一场优美的音乐会或者舞蹈表演的作用，它可以激励、鼓舞人们更好地去战斗，去生活，去迎接美好

的未来。另外，青少年是向往创造英雄业绩的，是向往各条战线的先进模范人物的，我们也可以组织著名的科学家、作家、音乐家、演员、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同广大群众和青少年会见。把各种各样活动搞得丰富多彩，引人入胜。要支持群众中健康优美的精神文化生活和男女之间正当交往以及正当生活爱好，包括同外国友人的正当交往。这些年林彪、“四人帮”在思想文化方面实行禁锢、封锁和愚民政策，搞蒙昧主义。现在一旦开放，人们不免饥不择食，什么东西都想接触一下。在这方面，也要加强指导。但是，决不可因噎废食，不可由于出了点毛病，又用那些落后的、封建的清规戒律，把青少年的头脑闭塞起来，把他们的手脚捆得死死的。

各界各部门，特别是政府部门要努力为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创造和提供可能做到的必要条件。象北京这样的首都却没有一个青年宫，一些体育场也不向群众开放。有的城市竟把少年宫改成了少年犯管教所，这类现象应该迅速改变。政府要尽可能为举办各种文化事业提供必要的资助和经费。把钱和精力花在这方面是很划得来的，它总比花在抓捕、关押和管教等方面要收到更好的效果。文艺界要努力创作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电影、戏剧、诗歌、小说，以满足青少年在

这方面如饥似渴的需要。

对于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应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主要不是依靠法庭，而是依靠学校、社会、街道、农村，基本依靠社会组织来进行教育。既然已经有了这样多的青少年犯罪，如何做好促使他们转化的工作和落实给出路的政策，就是十分迫切的问题。对于有一般违法犯罪行为的青年，应坚持留在学校、工厂、本单位教育改造，不要轻易开除。少年犯解除管教后，要安排好他们的就学就业；解除劳教的，原工作单位要负责接收安置，不得歧视。只要他们改造好了，不再重犯，就不能因为“进过公安机关的门”，影响升学和就业，这要作为一个制度定下来。学校、社会和家庭对这些人的冷漠、歧视，使有些决心改恶从善的青少年犯感到灰心绝望，有的甚至走上自杀的道路。要动员社会各个方面，包括居民委员会、民警等都来热情地做争取浪子回头的工作，还要尽快恢复和开办工读学校，集中教育那些处于犯罪边缘、难以留在学校的学生，要增强工读学校的教学力量。

改造社会风气是一项需要全党动员，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去做的重大任务。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社会风气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风的好坏。党风整顿好了，必然对整个社会风气和青少年风气起着

极大的影响作用。建国初期，为什么我们能够迅速地荡涤旧社会遗留的污泥浊水，树立起崭新的社会风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党风好。三年困难时期，为什么我们能够同心同德克服困难，物质生活的降低并没有削弱我们的斗志，社会风气保持着一种健康朴素、乐观向上的状况？一句话，还是党风好。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以身作则的模范带头作用激励、教育了广大人民和青年。共产党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由于林彪、“四人帮”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大破坏，对社会和青年风气产生了严重影响，使党的威信受到了严重损害。现在党风不正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中尤以依仗职权搞特殊化之风，影响最为恶劣。有些党员干部，包括党、政、军的有些高级干部在内，不但自己追求享受、待遇，而且挖空心思给自己的子女家属安排入党、进城、升学、出国以及找房子、找家俱等等，甚至不择手段，大走后门，违法乱纪，继续败坏党的威信。他们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忘记了自己是受党的教育多年的高级领导干部。“人生在世，及时行乐”，“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些资产阶级的以及林彪、“四人帮”的人生哲学的魔影，在他们的思想中游荡。他们的脑子里甚至还存在着相当浓厚

的封建伦理思想和封建世袭思想，向往着在有生之年能够享受封建社会那种几世同堂的天伦之乐。他们把子女当作私有财产，留在家庭小天地里朝夕厮守在一起，不愿意把子女送到农村、边疆社会大学堂里去经风雨、见世面。应该看到，少数干部特别是有些高级干部中的这种腐败习气，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败坏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对社会风尚危害甚烈。青少年问：应该相信谁？向谁学习，向谁看齐？一件走后门的违法乱纪行为，往往可以使经年累月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前功尽弃。因此，不抓党风的整顿，特别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不来一个根本的转变，社会风气和青少年风气是很难变好的，我们党也是很难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新的长征的。一定要严肃党纪，整顿党风。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都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时时警惕、战胜资产阶级以及封建阶级思想的进攻。要对自己和自己的子女严格要求，在各个方面起表率作用，使自己真正无愧于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从现在起，各级党的宣传部门都要认真作好调查研究，分析党内不正之风的种种表现，为进一步整饬党风，在全党加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教育作好准备。

（第15期，5月21日）

正确对待所谓人权问题

前一个时期，社会上几匹害群之马欺骗少数青年，组织所谓“中国人权同盟”，提出什么“反饥饿，争人权”之类的口号，一方面美化资本帝国主义，一方面丑化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报刊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批判，这是完全必要的。批判文章总的说很好，只是某些文章有点简单化，容易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只要一提人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本刊这期登载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同志写的一篇《马恩列斯论人权》，供大家学习、参考。从革命导师对人权问题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学到根本的立场、观点、方法，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实事求是地、有说服力地批判当前的错误思潮。

象对别的问题一样，马克思主义者对人权问题也是主张进行具体地历史地分析，反对脱离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社会经济内容和阶级内容去抽象地谈论问题。人权本来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阶级提出来的口号，它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即要求扫

除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我们在批判中要着重揭露这个口号的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和虚伪性，揭露资产阶级用“人权”来掩盖自己的特权。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它在反封建斗争中所起的历史进步作用，肯定它留下的积极成果，并加以批判地继承和发展。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无比深入地和广泛地发展了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比中世纪有伟大历史进步性的那一面，即居民参加对负责人员的选举”，同时“也摈弃了资产阶级民主消极的一面，即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的议会制”等等，从而表现了自己的优越性。（参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86页）

对资产阶级的人权口号持批判态度和反对立场，并不排斥马克思主义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劳动人民的人权要求。正象资产阶级最初曾一度利用传统的神学形式同封建贵族作斗争那样，工人运动在初期也往往需要利用资产阶级的人权口号，利用平等、自由的法律要求来作为反对资产阶级、争得自身某些权利的武器。马克思从工人运动的实际水平出发，就曾同意过在第一国际的临时章程中提出人权要求。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日益显示出反民主的趋向，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为了最广泛地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

级政党为了建立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都使用过人权口号。在我们党的支持下，蔡元培、宋庆龄、鲁迅等组织了反对蒋介石卖国投降和法西斯独裁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抗日时期，毛泽东同志在《论政策》中提出：“关于人民权利。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这些都是著名的例子。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在反封建、反法西斯的民主运动中，从来也不是孤立地提出人权要求，更没有把它摆到首要的地位，而只是作为一种辅助的斗争形式和策略口号，把这方面的斗争纳入并且从属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夺取政权的总斗争。

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个人民主权利的问题，总是同政权这个根本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的。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民主，不仅意味着劳动人民的个人基本权利能够得到真正的保障，而且劳动人民破天荒地组成为统治阶级，成为国家、社会的主人。这种人民民主，是人权论者夸耀的资产阶级民主根本不能相比的。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继续使用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人权口号，只会模糊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界线，引起思想上和政治

上的混乱。至于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争人权”，那更是历史的倒退和反动。

然而，历史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一般地说，社会主义社会本质上不存在危害人民的所谓人权问题。但在特殊情况下，当着有些官僚主义者不尊重甚至严重地侵犯人民的民主权利的时候，特别是当着出现了象林彪、“四人帮”这样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们推行封建法西斯主义，严重地侵犯人民的人身自由，践踏人民起码的生存权利的时候，人们自然可能怀疑到社会主义社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会不会出现人权问题。因此，对于前一时期出现所谓争人权的问题，我们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把出于对林彪、“四人帮”践踏人民权利的封建法西斯罪行的愤恨而提出这种要求的人们，同极少数别有用心地借人权问题制造混乱，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坏人严格地区别开来。对于后者，应该给以揭露和批判。而对于前者，则要看到他们尽管在表达方式上不确切、不妥当，在理论认识上有模糊不清的地方，但他们的实际要求许多是正当的、合理的。我们一方面要从思想理论上引导那些在人权问题上有模糊认识的同志，帮助他们从资产阶级民主观的影响下摆脱出来，逐步地用无产阶

级民主观来观察问题。另一方面，还要正视在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权利方面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决不可由于批判当前的错误思潮，而放松了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

（第16期，5月30日）

马恩列斯论“人权”

一、“人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

“人权”口号是资产阶级在同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提出的。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产阶级为了能自由发展资本，自由剥削劳动力，挣脱封建等级特权和神权的束缚，提出了自由、平等的人权要求。十七、十八世纪的一些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反映了这种要求，提出了“天赋人权”的思想，如英国的洛克和法国的卢梭等。他们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中都是自由平等的，人人生来都有平等、自由和争取幸福的权利。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第一次以政治纲领的形式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他们为造物主赋有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马克思称这个《宣言》为“第一个人权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0页）。在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发布了《人权和公民权

宣言》，其中规定：“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作和出版的自由”；“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等等。《人权宣言》宣告了法国封建特权阶级统治的告终、新兴资产阶级统治的开始，正象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这是“以人权的形式承认和批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即工业的、笼罩着普遍竞争的、以自由追求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无政府的、塞满了自我异化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个性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6页）

恩格斯详细地论证了人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他指出：“大规模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尤其是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来说是有平等权利的，他们根据对他们来说全都平等的（至少在各该当地是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02页）例如资本家可以自由雇用工人，工人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这样的平等。在封建统治下，“当经济关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权利时，政治制度却每一步都以行会的束缚和特殊的特权同它相对立……一旦社会的

经济进步，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到日程上来，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获得更大的规模。虽然这一要求是为了工业和商业的利益提出的，可是也必须为广大农民要求同样的平等权利，农民受着各种程度的奴役，直到完全成为奴隶，他们必须把自己极大部分的劳动时间无偿地献给仁慈的封建领主，此外，还得向领主和国家缴付无数的代役租。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要求废除封建特惠、贵族免税权以及个别等级的政治特权。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象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宣布为人权。”（恩格斯《反杜林论》第 103 页）

人权是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的反映。马克思说：“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99 页）“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说，它要求在一切实生产领域内剥削劳动的条件都是平等的，把这当作自己的天赋人权……”

(同上，第 436 页)

以自由、平等为主要内容的人权思想，曾经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思想武器，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全世界的资本担负过创造自由的任务，它推翻了封建的奴隶制，创造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步。”(《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833 页)

二、资产阶级用“人权”来 掩盖自己的特权

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以“全民的代表”面目出现，它标榜“人权”，把自由、平等说成人人共有的权利，但他们所谓的“人权”有鲜明的阶级性，“人权”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特权。革命导师深刻地揭露了“人权”的阶级实质。马克思说：“至于谈到权利，我们和其他许多人都曾强调指出了共产主义对政治权利、私人权利以及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即人权所采取的反对立场。……指出人权本身就是特权，而私有制就是垄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228—229 页)“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324 页)“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财

产，而是使人有占有财产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放弃追求财富的龌龊行为，而只是使人有经营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45页）“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私有财产这项人权就是任意地、和别人无关地、不受社会束缚地使用和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这项权利就是自私自利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8页）恩格斯认为“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反杜林论》第15页）。列宁说：“即使在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中，‘自由’和‘平等’只能是而且从来就是商品所有者的平等和自由，资本的平等和自由。”（《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2页）

资产阶级口头上高喊“自由”、“平等”，在行动中却不给劳动人民以“自由”、“平等”。马克思指出：“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风暴一开始，就胆敢再把工人刚刚争得的结社权剥夺掉。它在1791年6月14日颁布法令，宣布工人的一切结社都是‘对自由和人权宣言的侵犯’，要课以500利弗尔的罚金并剥夺公民权一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0页）“这个政治生活的革命实践和它的理论还处于最尖锐的矛盾状态。例如，一方面，安全被宣布为人权，一方面又公开承认破坏通信秘密是理所当然的。一方面‘无限制的出

版自由’（1793年宪法第一二二条）作为人权和个人自由的后果而得到保证，一方面出版自由又被完全取缔……换句话说，自由这一人权一旦和政治生活发生冲突，就不再是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0页）“宪法的每一节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35页）当资产阶级的统治受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威胁时，资产阶级就“把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同上，第8卷第160页）列宁说：“即使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实际上也是资产阶级的恐怖和专政居统治地位，每当剥削者开始感觉到资本的权力动摇时，这种恐怖和专政就公开表现出来。”（《列宁选集》第3卷第721页）

革命导师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是谎言、欺骗。恩格斯说：“政治自由是假自由，是一种最坏的奴隶制；这种自由只是徒具空名，因而实际上是奴隶制。政治平等也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6页）“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

做平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48页）列宁说：“实行现代平等的民主共和国是谎言，是欺骗，因为在那里没有平等，也不可能有平等；生产资料、货币和资本的所有制妨碍着人们享受这种平等。”（《列宁选集》第3卷第837页）资产阶级的“自由只是纸上的自由，而不是事实上的自由”（同上，第3卷第834页）。“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列宁选集》第3卷第630页）

三、无产阶级的自由、平等 要求就是消灭阶级

革命导师在揭露资产阶级“人权”的虚伪性的同时，认为无产阶级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可以利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口号来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马克思在早期曾指出了工人阶级争取公民权斗争的重要性，说：“公民权即积极的公民权对于工人是如此的重要，凡是在工人享有公民权的地方，如在美国，他们都从中‘取得利益’，而凡是在工人没有公民

权的地方，他们都力求取得公民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8页）后来他起草《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也曾提出过人权要求：“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同上，第16卷第16页）恩格斯在谈到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时指出，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成了用资本家本身的主张发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反杜林论》第104页）。“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31页）列宁也说：“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的‘自由’实际上是富人的自由。无产者和劳动农民可以而且应当利用这种自由来准备力量，以推翻资本和消灭资产阶级民主……”（《列宁选集》第3卷第814页）

但是，革命导师始终强调，无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的要求，同资产阶级根本不同，无产阶级要求的自由、平等就是消灭阶级。恩格斯指出：“从资产阶级由封建时代的市民等级破茧而出的时候起，从中世纪的等级转变为现代的阶级的时候起，资产阶级就由它的影子，即无产阶级，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同

样地，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有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起初采取宗教的形式，以早期基督教为凭借，以后就以资产阶级平等论本身为依据了。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的话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尤其是从法国资产阶级自大革命开始把公民的平等提到首位以来，法国无产阶级就针锋相对地提出社会的、经济的平等的要求，这种平等成了法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战斗口号。……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

（《反杜林论》第103—104页）列宁说：“无产阶级必须消灭阶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自由（摆脱资本家的自由，摆脱商品交换的自由）和无产阶级的平等（不是阶级的平等……而是推翻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劳动者的平等）的真实内容。”“只要阶级存在，自由和阶级平等就是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粉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镇压资产阶级，制止其他一切阶级想恢复资本主义的一切尝试，给予劳动者

以真正的自由和平等（这只有在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不仅给他们‘权利’，而且使他们能实际享有从资产阶级那儿夺来的一切。”（《列宁全集》第29卷第468页）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刚刚胜利，苏维埃国家颁布了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宣告苏维埃政权的基本任务是：“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完全消除社会的阶级划分，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使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获得胜利”（《列宁选集》第3卷第404页）。

四、无产阶级专政给劳动人民以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只有它才给人民以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列宁选集》第3卷第248页）“无产阶级或苏维埃的民主，不是形式上宣布权利和自由，而是实际上首先和主要地赋予居

民中那些曾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权利和自由”，“争取居民中越来越广泛的劳动群众享受民主权利和自由，增加实现这一点的物质上的可能性”。（《列宁全集》第36卷第528页）斯大林指出：“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下，被剥削者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无产者和农民才可能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03页）斯大林还指出，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里才实现真正的平等，他说：“马克思主义所了解的平等，并不是个人需要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平均，而是阶级的消灭。这就是说：（甲）在推翻和剥夺资本家以后，一切劳动者都平等地摆脱剥削而得到解放；（乙）在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以后，对于大家都平等地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丙）大家都有按个人能力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按劳取酬的平等权利（社会主义社会）；（丁）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各取所需的平等权利（共产主义社会）。”（《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4页）

无产阶级专政给了人民以真正的民主权利，但由于受实际生活中某些情况的限制，这些权利的实现要有个过程，要经过长期的努力。列宁在论述人民参加国家管理问题时阐明了这个思想。列宁说：“我们在实

行真正的而不是纸上的民主方面、在吸收工农参加管理方面所做的事情，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共和国在几百年内没有做到而且不能做到的。”（《列宁选集》第3卷第790页）同时又说：“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做出了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落后性却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制度复活。苏维埃机构在口头上是全体劳动者都参加的，而实际上远不是他们全体都参加的，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根本不是法律妨碍了这一点，如在资产阶级时代那样；恰恰相反，我们的法律还促进了这一点。但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必须有广大的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这不能用法律迅速办到，这需要进行长期的巨大的努力。”（同上，第784—785页）

五、没有超阶级的人权和民主、自由、平等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脱离一定的阶级内容，抽象地谈论人权以及什么一般自由、平等和“纯粹民主”问题。革命导师反复不断地揭露了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关于民主、自由、平等的空谈的危害性。

恩格斯指出：“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看法，这种看法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经是正确的，但是，象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经有了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8页）列宁指出：“搬弄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笼统词句，实际上等于盲目背诵那些反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用这些笼统词句来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任务，就无异完完全全转到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原则立场上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问题只能这样提出：是摆脱哪一个阶级的压迫而取得的自由？是哪一个阶级与哪一个阶级的平等？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民主，还是以力争废除私有制为基础的民主？如此等等。”

（《列宁选集》第4卷第93页）“在被压迫的劳动阶级彻底打倒资本、彻底消灭商品生产的斗争已提到首位的历史关头，谁要是大谈一般‘自由’，谁要是为了这种自由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就是帮助剥削者，谁就是拥护剥削者”。（《列宁选集》第3卷第832页）“谁想根据什么自由、平等、一般民主、劳动民主的平等这类空话来解决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

务……谁就只是暴露出他在思想方面奴隶般地跟着资产阶级跑的小资产者、庸人和市侩的本性。”（同上，第4卷第11页）

（第16期，5月30日）

切实加强农村群众宣传工作

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党在农村的宣传工作必须大力加强。当前，迫切需要在全国广大农村深入宣传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宣传三中全会和今年四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宣传贯彻党的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由于林彪、“四人帮”对党的政治工作光荣传统的干扰破坏，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我们又指导得不够，农村群众宣传工作在不少地区相当薄弱。许多社、队没有经常性的宣传活动，没有生动实际的切合农村需要的宣传材料（少数地方甚至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没有一支联系群众的有活动能力的宣传队伍，许多县、社党委没有形成对宣传工作的有力领导。当然，工作做得较好的地方和单位为数也不少。这里，我们向各地党委宣传部门介绍吉林省敦化县的一个材料。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注意，都能深入下去，调查研究，总结本地

区做得比较好的单位的经验，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县社基层的宣传工作。

要加强农村群众宣传工作，关键是各级党委重视，切实加强党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不再搞任何离开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的政治运动了。这决不意味着党在农村的宣传工作，党对农民的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有丝毫削弱，而是应该进一步加强。希望各级党委注意发挥宣传部门作为党委一个重要工作部门的职能作用，对宣传部门干部的使用，不要“拆掉机器，光使零件”。宣传部门干部下去蹲点不要“蹲死点”，要和自身业务密切结合起来。建议各级党委经常讨论宣传工作，加强对宣传部门和宣传队伍的思想领导和组织建设。现在公社、大队的党、政、企不分，“党不管党”的现象甚为严重。在体制没有改变之前，大队党支部总应有管宣传工作的，公社一级要配备宣传委员。地、县委宣传部长最好能参加常委会，条件暂不具备的，可以吸收他们列席必要的常委会，以便于他们经常了解全局，更好地开展宣传工作。

要加强农村的宣传工作，必须建立一支经常性的宣传队伍。如何建立，要不要恢复党的宣传员、报告员等宣传组织和工作制度，希望各地党委能从实际出发，认真加以研究。经验证明，在广大农村，有一支

活跃的宣传队伍，又比较注意运用各种宣传手段和宣传工具（包括报纸、有线广播、夜校、文化馆、站等等），党的基层政治思想工作就有抓手，易落实，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能较迅速地同广大群众见面，党组织对群众中的思想问题也较易掌握并及时加以解决。

（第17期，5月31日）

我们是怎样恢复党的 报告员制度的

中共吉林省敦化县委宣传部

我们县的报告员制度恢复半年来，县、社两级报告员一百四十二人共作报告一百五十多场次，结合会议的中小型报告二百多场次，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宣传了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党的宣传工作扎扎实实的开展。广大干部群众高兴地说，恢复了报告员制度，党的宣传工作的光荣传统又回来了。

我们恢复党的报告员制度，是从宣传新时期总任务前后的经验教训中受到启发的。去年五月到十月，我们按照省委和延边朝鲜自治州委的部署，搞了两次新时期总任务的宣传高潮。全县出动了三千多人，深入城乡各基层单位作宣传，规模和范围都比宣传抗美援朝、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大，效果很好。我们感到：要搞好经常性宣传工作，没有一支宣传队伍不行。恢复了党的报告员制度，就可以及时地把党的方针政策交给广大干部群众，解决和回答他们关心的问题。这是坚持经常性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另外，领导干部如能经常结合自己的工作，带头给干部群众作政治报告，经常性宣传工作就有了抓手，在一般宣传干部和群众中反映很强烈，宣传效果也不一样。党的报告员制度是我党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过去，对于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组织群众、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拨乱反正，恢复党的报告员制度是势在必行的。

二

我们在恢复报告员制度时，主要抓了两件事：

第一，拟定报告员条件。一是能自觉努力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理论水平。二是思想进步，政治上可靠，并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三是具有一定的宣讲能力，能够密切联系实际宣讲。四是热爱党的宣传工作。

第二，物色报告员人选。我们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方法，既注意报告员的分布，又注意一定的民族比例。确定了县、社（局）两级报告员人选，并报告县委，由县委对八十一名报告员正式作了任命。县一级报告员由县委主要领导担任，社一级报告员由县直属单位、局和公社干部担任。县委统一领导，宣传部负责抓具体工作。

三

从组织上恢复报告员制度后，为使报告员活动起来，发挥作用，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规定报告员的任务和要求。报告员的基本任

务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向干部、群众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时事政策教育。报告员力争每月报告一次，每季不少于两次。我们还根据各个时期宣传任务的需要，给报告员提出更具体的任务和要求。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时候，我们安排了县级报告员二十多次辅导课和广播讲课任务。在宣传中央关于农业问题两个重要文件时，我们安排了县、社两级报告员承担培训宣讲骨干的任务，前后共培训了三百多名宣讲骨干。这些骨干下到社、队，又帮助社、队培训了一批宣传力量。使宣传队伍不断扩大，使中央的两个重要文件的宣传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

二是县委、县革委会主要领导中报告员带头作报告。在开展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时，我们把县、社报告员和公社党委宣传委员、各局政工干部集中起来，请县级报告员、县委书记张进发同志作专题报告，推动了对这个问题的学习讨论。在宣传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两个重要文件时，县级报告员、县革委会副主任刘世印同志，利用三级干部会议全县报告员都在场的机会，结合自己多年来搞农业的体会，系统地宣讲了中央两个文件，为其他报告员做出了样子。林胜公社党委书记、社级报告员王在理同志回公社后，也结合公社实际宣讲，效果很好。实践证明，

层层带头，报告员制度就发挥作用了。

三是及时向报告员提供材料。这是促使报告员开展活动的一个关键性措施。我们除了经常发给有关的宣传材料外，每月还为报告员提供两种刊物：一种是《新吉林》，一种是《世界知识》。此外，我们还注意把群众一些思想动态和要求，及时提供给报告员，帮助他们有针对性地准备报告内容。今年二月底，我们请县武装部长赵文玉同志作当前形势和加强战备的报告。事先，我们先把一些群众担心苏霸乘机从北面打来，担心我们部队的武器装备落后，反击越南会不会吃亏等思想反映，告诉了赵文玉同志。他针对群众的思想反映，在报告中，阐明了我对越进行自卫还击的正义性，分析了苏霸的动向，还从政治、经济、思想和武器装备方面，一一列举了我军必然会战胜越南侵略者的有利条件等。干部群众听后高兴地说：这样的报告真解渴。这场报告对稳定形势，增强干部群众搞好战备工作的自觉性，起了重要作用。

四是经常检查督促报告员的工作。我们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建立《报告员手册》。报告员每次报告后要由组织报告单位的负责人或主持报告的同志填写报告内容、题目、时间和听众人数。二是采取分散调查了解的方法，到公社或局了解报告员的活动情况。以

后，我们还打算采取集中汇报交流经验的形式，来督促检查报告员开展活动。

报告员制度恢复半年以来的实践使我们感到，这个制度是我们党做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好形式。它可以及时地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国内外形势，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解决和回答群众迫切关心的问题；培养和锻炼了一支宣传骨干队伍，经常性的宣传工作得到了保证；各级领导参加报告员队伍，他们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提高了宣传工作的水平。同时，各级领导担任了报告员，增强了责任感，重视了宣传工作，也更加支持宣传工作了。

我们县的报告员制度虽然恢复了，并初步见效，但是，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报告员对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够；有些报告员思想不够解放，不敢敞开思想讲。不少报告用自己的语言分析综合少，照念材料多，质量还不高，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解决好。

（第 17 期，5 月 31 日）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 一心一意奔四化

——中宣部例会讨论当前宣传工作

最近，中央宣传部几次例会，讨论了当前的宣传工作，主题是如何进一步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四个现代化上来。

一、要继续抓形势教育。近来党内外对当前形势议论不少。有一股风，说形势不好。值得注意。三中全会以来形势发展很快很好。有一些在前进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问题，已经和正在纠正。闹事的风潮基本平息下去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进一步得到巩固。政治形势很好，经济形势也很好。三中全会解决了加快农业发展的问題，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去年全国粮食突破六千亿斤，创历史水平。今年绝大部分地区五业兴旺，夏收将是全国性的增产。据估算，河北、河南、湖北、四川、江苏的小麦就可增产五十亿斤以上。工业生产在调整中前进。上海、四川今年头五个月的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九点三

到九点五。市场繁荣。猪肉、蛋品、蔬菜供应充分。京、津、沪三地食品冷藏库装得满满的。国外有识之士看到我国调整国民经济的深远意义，更加增强了同我进行经济合作的信心。我国国际威望之高、信用条件之好，是建国三十年来所没有的。各地应该结合具体情况，广泛深入地宣传全国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大好形势，澄清错误思想，把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进一步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引导大家一心一意奔四化。

二、把经济宣传摆到突出的地位。全国各条战线各方面的工作，围绕一个中心，就是要把经济搞上去。经济宣传应该在报纸、广播上占越来越重要的比重。当前的重点是宣传增产节约。首先要加强思想评论，振奋精神，打破无所作为的思想状态。现有企业是向四化进军的基地。它们进行挖潜、革新、改造，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国计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实行分类指导，促使这些企业做出更大的贡献。绝大多数的企业潜力都是很大的，要发动群众，翻箱倒柜，狠揭矛盾，一一加以解决。节约的反面就是浪费，报纸新闻要适当揭露一些浪费的典型，激发广大职工的义愤和责任感。轻工业要尽快搞上去，这是工业内部调整中最主要之点。要开扩视野，看到轻工业的门类极广，天地大得很。要全面安排，大力发

展。煤、电、运的形势，是整个工业战线和全国十分关心的问题。要充分反映这些行业增产节约的新成绩。其他工业部门在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过程中的成就和经验，也要加强报道。但是凡属调下去的方面，不要公开宣传。内部刊物要有计划地反映经济战线在开展增产节约和实行调整方针中的情况和问题，以利于中央和省市党委及时指导。

三、宣传广开门路，组织起来，解决城市就业问题。全国大中小城镇有几百万待业青年，妥善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对于整顿社会秩序，增加社会财富，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关系极大。现在有些地区的街道党委组织待业青年，从事各种生活服务工作和手工业劳动，效果很好。报纸要拿出足够的篇幅，具体地连续地宣传这些成功经验，推动各个城镇在不太长的时间，逐步解决待业青年的工作问题。同时要注意宣传介绍办得好的知青点、知青农场，例如湘潭市红旗综合农场，苏州市郊区知青点办工业的经验，等等，宣传扎根农村，为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作出了优良成绩的知识青年的模范事迹，以及积极参加边疆建设的知识青年的事迹，防止在上山下乡和支边青年中刮回城风。对于违反规定，擅自在农村招工的，要选择典型公开批评，把这条路子堵

死。

四、要继续抓整顿党风的宣传。我党作风问题，已经引起党内外广大群众日益强烈的关注，外国一些进步人士也很注意。中央早就在着手抓。报刊、电台要有计划地开展这方面的宣传。党风的好坏，关系到能否永远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关系到能否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夺取四化的胜利。各级党组织中都有许多模范地遵守党纪国法，吃苦在前，得利在后，一直同群众保持鱼水关系的好同志。应该选择各种不同的类型，着重进行宣传。歪风邪气也要适当揭露。前一段报纸上批评了某些搞特权、走后门、压制民主的事例。今后，还要继续同这几股邪气作斗争。同时，也要批评某些领导干部精神不振，胸无大志，因循守旧，得过且过和闹派性，搞山头，互相掣肘等等不正之风。宣传抓党风，无论是表扬或者批评，都要体现出我们这个党是大有希望的，要使群众坚定地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四化一定能够实现。

五、理论宣传。这一段不少同志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努力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写出了一些很好的文章。中央决心搞经济改革。为了改革，必须破除思想僵化。要看到在这方面，思想阻力还是很大

的。一切有利于改革的积极言论，都应该得到支持。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首先在内部广泛开展讨论，各种意见、看法都可以发表，但是不要匆忙见报。对于中央已经决定的方针、政策，在报刊公开进行宣传解释，这个工作还要继续加强。理论工作者要深入实际，同实际工作中立志改革的同志结合起来。理论文章要努力解答广大干部、群众迫切关心的实际问题和认识问题。

六、各个方面的宣传，都要注意鼓干劲。“气可鼓，不可泄”。不论反映那条战线，宣传什么问题，例如增产节约、调整经济、缩短基建战线、抓党风、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等等，都要着重宣传好人好事好典型，从正面鼓劲。要使大家既看到我们前进中的困难，又看到我们的有利条件。我们已经达到年产一亿吨石油、六亿吨煤、三千万吨钢，有二百四十万台机床，三、四十万个企业。我们前进的基地是很不错的。我们的宣传要坚定信心，鼓舞斗志，引导人们同心同德，争先恐后地搞四化。

（第19期，6月18日）

不要滥用“长官意志”这个概念

最近，有的地方报纸还在发表题为《反对“长官意志”》一类的文章。笼统地反对长官意志不妥。

“长官意志”一词，见之于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原文如下：

“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列宁选集》第1卷第10页）

列宁在这里是把长官意志、社会意志、政府意志看作同义语一起用的，指的是人们的意志、意识和愿望，是主观世界。社会作为一个客观事物，是遵循它

本身固有的规律发展变化的，不可能凭人们的意志、意识和愿望（或者表现为长官意志，或者表现为社会意志、政府意志）随便改变。胡乔木同志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中，批评有些领导工农业经济工作的干部，“以为社会意志、政府意志、长官意志就是经济规律，以为经济规律可以按照政治需要而改变”（《人民日报》1978年10月6日），也就是说要承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不要用主观意志代替客观规律。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长官意志、社会意志、政府意志必然是同客观规律相违背的，因而是错误的，必须加以抛弃。主观意志不等于客观规律，然而它是可以反映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主观意志，可以运用客观规律，推动事物的发展。歪曲反映客观规律，特别是不承认客观规律胡思乱想的那种主观意志，则会对事物发展造成不利的乃至有害的影响。因此，对主观意志即长官意志、社会意志、政府意志要具体分析。

现在有些同志，误认为长官意志就等于是主观主义，等于是违反客观规律，瞎指挥。有些闹无政府主义的人，把“长官意志”当作一顶帽子，反对正确的领导。有些作领导工作的同志怕被批评为“搞长官意志”，也不敢大胆领导了；甚至宁愿作所谓“没有意志的长

官”，遇着矛盾绕开走，办事能推则推，能拖则拖，怕负责任，怕担担子。可见“反对长官意志”之类的口号，已经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并给实际工作带来损失。因此，今后在宣传中，要注意正面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教育，引导大家努力按客观规律办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走群众路线，坚持集体领导，而不要一般地去指责“长官意志”。领导工作中有主观主义，就批评主观主义；有“一言堂”，就批评“一言堂”；有瞎指挥，就批评瞎指挥。尤其是在向工农群众进行口头宣传时，更不宜简单地提出反对长官意志这类含义不清的口号。

（第19期，6月18日）

整顿社会秩序 加强青少年教育

最近，在胡耀邦同志的提议和主持下，中央宣传部邀集了中央宣传系统各单位、政法小组、公安部、教育部、劳动总局、国务院知青办公室、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和北京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开了几次会议，讨论社会治安和青少年教育问题。主

要谈到以下一些问题：

一、今年春天，一些城市出现少数人闹事的风潮，现已基本平息下去。街头大字报上否定和攻击四项基本原则和三中全会的言论大大收敛了，现在贴的绝大多数是个人申诉，要求落实政策的内容。刑事犯罪率从四月以后开始陆续下降，但是绝对数量仍然超过“文化大革命”前，社会风气不好的基本状况尚未改观。刑事犯罪分子中青少年占的比重很大。这远远不是公安部门一家所能够解决的问题。这里涉及到城市和所属各级党组织的领导问题，涉及到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群众团体工作、学校教育工作、街道居民工作、劳动就业等一系列的工作方针和方法问题。我们必须深思熟虑地回顾和考察十多年来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二、发扬民主同加强法制是相辅相成的。一定要继续发扬民主，进行引导，消除闹事苗头。各级领导机关要大抓党风，走群众路线，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同群众打成一片，反对特殊化、走后门、压制民主等歪风邪气。街头大字报影响社会秩序。对极少数人利用大字报造谣生事、扰乱社会治安，不能放任不管。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后，下半年要在全国内进行遵守法制的教育。

三、现在有一些青年人可能有一些错误看法，但是绝大多数并非出于恶意。我们不应该回避他们，而是要接近他们，主动启发诱导。有的省市，如广东的主要领导同志多次找这样的青年谈心，效果很好，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应该指出，目前不少同志公务太忙，深入下去少了，同群众谈心少了。他们接近的老是那么几个人，听到的都是好话、老话，不能开眼界，长见识。他们特别害怕见到那些发怪议论的人，不了解人家心里想什么，也就不能对症下药做工作，引导他们正确地行使宪法保障的民主权利。

四、对中小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加强。从小学抓起。要努力编出一套深入浅出的政治教材。内容应包括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国革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直至实现四化是我国人民的中心任务等等。要从中小学生的接受能力出发，编成不同程度的课文，进行讲授。小学和初中可否开设共产主义品德课，或叫新中国公民课？搞中、小学生守则也很重要，要简明易记，最好谱成歌曲。教育部不久前专门召开了中小学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这方面有所部署。目前是要给小学的班主任、中学的政治教员以切实的支持和帮助。各地党委以及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同志要经常给他们做报告，开座谈会，从教育内容

到工作方法各方面给以指导。

五、大造舆论，发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这是一个需要由全社会来抓的大问题。要全党动手，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在较短期内扭转这种状况。有的城市发动街道，以居民委员会为单位制订维护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公约，定期检查评比，是一个好办法，应该宣传推广。共青团、教育部门要在青少年中掀起学英雄，见行动，提高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热潮。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的战斗英雄，将赴各地向广大群众作报告，我们要象当年宣传黄继光、董存瑞、杨根思、邱少云和雷锋、焦裕禄、草原小姐妹那样，树立一批新的激动人心的好典型。以他们为榜样，提高广大青少年的精神情操。对于在培养青少年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中作出优秀成绩的人员（包括辅导员、班主任、居民委员会主任、公安人员等），要大张旗鼓地登报表扬，并给以适当的奖励，推动社会各方面都来关心这个问题。

六、采取切实措施，丰富青少年的业余文化生活。“文化大革命”前，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活动场所有一千六百多个，现在很多被占用和挪借了。应该在各地党委的统筹安排下，根据勤俭节约、因陋就简的精神，恢复和扩充青少年的业余文化活动场所。公园要充分利

用起来，可以举办流动展览、小型演唱、活动图书馆，以及时事、政治、科技、文艺各种报告会。现在不少专业文艺团体的演员演出机会不多，可以考虑组织小分队分赴各种公共场所演唱，并辅导群众开展文化活动。很多工厂企业的业余文娱活动也停顿了，工会要拿出力量抓一抓。农村和小城镇的文化生活更是十分贫乏。活跃群众业余文化生活，应该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由宣传部会同文化、教育、体育、科普、电台、出版等部门和工、青、妇等群众团体，作为一个重要的专题抓紧抓好。

七、广开门路，积极安排城市待业青年就业。在这方面有几个大中城市做得较好，取得了一些经验。各地都要抓，中小城镇也要抓。要大力发展服务行业，发展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不要把安排到集体所有制的小企业甚至服务性的合作小组看作是“临时性”的安排。经验证明，只要我们解放思想，抱着对社会、对青年负责的态度，千方百计想办法，这部分青年的就业问题是完全能够解决的。为了使不能升学的中学生顺利走上工作岗位，教育部门可以考虑开设职业教育课程，在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上都要作些改革。

八、随着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边疆建设的任务将越来越大。那里是一个可以容纳成百万、

成千万人的广阔天地。我们要准备在不远的将来，日渐增多地输送大量青年到边疆去。有志边疆建设的青年很多。杨永青的事迹传开后，各地报名志愿去新疆的青年就有七千多人。这也说明我们的青年一代是大有希望的。去边疆建设，还在创造条件，目前还不能去很多，少数人去，也要细致地做好具体的组织工作。要劝说在农村的青年安心农业劳动。

（第20期，6月19日）

加强文艺评论 繁荣文艺创作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一心奔四化的大好形势进一步向前发展，同时也给各条战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集中主要力量，抓好物质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同时，党和人民期望着发展精神生产即繁荣文化（包括科学、教育、文艺）方面，也能大有作为。文艺方面怎么办？郭沫若同志在离开我们之前，曾经留下一个希望：要迎来一个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这春天不是几个月，而是一个时代。从七十年代末期到整个八十年代，十年稍多一点的时间作为这个时代的

开端，要把戏剧、电影、小说等方面的创作搞上去，同时要开展评论工作来有力地促进和繁荣文艺的创作。

文艺评论是党的文艺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长时期来，这方面的工作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他们利用评论制造反革命舆论，摧残革命文艺，迫害作家艺人。他们大力推行一套帮八股，骂则骂杀，捧则捧杀，顺者昌，逆者亡。这种文痞、文霸式的作风，既扼杀革命的文艺创作，也取消了真正的文艺评论。它使许多搞创作的同志对评论望而生畏，也使许多搞评论的同志左右为难，不敢动笔。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的拨乱反正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创作和评论也恢复了生机。但总的看来，文艺评论，中央和各地报刊都作得太少，两年多来很不活跃，甚至一些地方还是一潭死水。这个问题，亟待我们在总结多年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以解决。

我们主张报刊上多搞点文艺创作评论，目的是共同商讨如何提高文艺界同志的创作水平，以繁荣创作。在评论中，应当着重地研究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的正确途径，积极地为文艺界的解放思想、繁荣创作提供意见。评论要讲道理，坚决废止“四人帮”那种把文艺批评硬搞成一种政治斗争，动辄上纲上线，一根

子把作品和作家打死的恶劣做法。要端正文艺评论的指导思想，改变过去流行的把这项工作仅仅归结为所谓哨兵作用的片面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似乎文艺评论就是对作品挑毛病、“查敌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的文艺评论家要象鲁迅早就指出的那样，当文艺的园丁：“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在实现这个共同目标的思想基础上，调整好文艺创作和评论的关系，使两者并肩前进。

文艺评论要研究创作方面的经验教训，三十年来，十几年来，都有哪些经验教训。正面的最根本的经验，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放手地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文艺评论要具体贯彻的根本方针。反面的教训也不少，主要是在过去文艺创作的指导上常常限制太死、调子太高、棍子太多，不利于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当然，我们的文艺创作是有标准的。标准还是两条：一条政治标准，不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一条艺术标准，不是用标语、口号式的东西，而是以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教育人、鼓舞人。作品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把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用较好的艺术形式来表现较好的思想内容。总之，要使人民既受到一定的教育，又得到艺术的享

受。除此之外，就不要规定太多了。林彪、“四人帮”合伙炮制的《纪要》，批什么“黑八论”，这也不准，那也犯禁，是一个重要的反面教材。它使文艺创作在思想上陷入了僵化和虚假的绝境，在艺术上日趋贫乏、单调和模式化，把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引进了一条死胡同。今天我们的评论要坚决打碎这种精神枷锁，把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放到广阔的天地去。

文艺评论者要有广阔视野。要看到我国有六十多个民族、九亿多人民、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几千年的文明史。要看到我们创造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应当具有与此相称的民族气派和极其丰富多采的民族风格。只有这样想和这样做才是大有作为，才可能真正满足人民的需要。我们可写的题材是很多的，条件是非常优越的。这里有解放以来三十年空前规模的社会主义创新、探索和建设，有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又从五四运动到全国解放的一百零九年前赴后继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战争，久远一些还可以上溯到几千年，在这历史长河中，各个民族都有无数可资教育人民的动人故事和人物，闪耀着我们民族文化的崇高精神与智慧，都是文艺创作的丰富题材。评论工作要热情地支持和帮助文学家、艺术家向生活与历史的广度和深度进军，既要把反映社会主

义社会三十年的革命和建设放在首位，写激流与暗礁、阳光与阴霾、今天与未来，同时又要把这三十年同以往的一百多年、甚至几千年贯通起来。我们中华民族活跃在世界先进民族和国家的舞台上，至少是一千多年。这段历史，现在这一代青年是希望了解的。我们可否设想：从今年起，到八十年代末，用十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这三个历史时代，写三千部作品（话剧、戏曲、电影……），古代一千部，近代一千部，现代一千部。总之，我们要努力使创作题材、艺术形式和风格多样化，能够反映出我们祖国古往今来、推陈出新的万千气象，让人们从许多方面得到启发和激励，提高精神境界，增强自己的民族自信心，更加生气勃勃地去建设新生活。评论工作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紧密地配合文艺创作，去研究、积累和总结创造社会主义文艺的规律性知识。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是文艺评论的基本方法。一部作品、一种创作的成败得失是客观的存在，不是由哪一个说了就算的。鲁迅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评论对于创作，既要热情鼓励，又要严格要求，敢于肯定成功的，也敢于指出不足的和失败的。既不乱骂乱捧，也不做模棱两可的敷衍文章。总之，要实在、中肯。评论要允许发表不

同的意见，允许批评和反批评。要通过这样的交换意见来集思广益，把广大的专业工作者和群众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当前，我国正进入一个以实现四化为中心的新时期，为适应这个伟大的转折，人们纷纷在创作中进行新的探索。不少同志敢于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努力扩大创作题材，努力深入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群众斗争生活，主流是健康的。当然，目前也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注意。例如创作方面，在写社会主义社会的阴暗面的时候，如何做到恰如其分。我们写阴暗面的目的是为了揭露阶级敌人的破坏，批评革命队伍中的落后现象，以鼓舞和激发人民的斗志，而不是为暴露而暴露，甚至用猎奇式的、追求新的刺激的那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去虚构和渲染一些东西，宣传对革命的事业和前途的阴暗心理。人们在探索过程中，很有可能在某些问题上走弯路、犯错误。因此，要提倡事前和及时帮助，防止事后算总帐，但要允许走弯路和犯错误。我们的评论工作要着重于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去努力引导，保护作者的积极性，引导他们正确地进行创新，不要一犯错误就揪住不放。对待青年作者，尤其要注重引导。我们对是非应当分明，对同志要与人为善，要向前看。如果我们自觉不自觉地一面把自己的缺点、毛病掩饰起来，一面又去抓别

人的小辫子，挑剔别人的毛病，特别是若干年前犯的、而今已经改正了的错误，这样彼此纠缠不已，就会搞乱我们的队伍，贻误我们的事业。

文艺评论工作如果搞好了，影响所及不只是一部作品、一个创作，而更重要的是在整个文艺界倡导一种好风气：让大家都来关心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共同事业，都采取这样的立场和态度——亲密团结，互相帮助，各显神通，百花齐放。我们的评论要大大表扬那些胸怀全局，奋发有为，专心致志地钻文艺、钻业务，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好同志。要以开导、表扬为主，批评为辅，使最大多数的同志感奋起来，团结起来，为创造世界上第一流的社会主义文艺而努力奋斗，把那种所谓文人相轻的旧习气，把一切个人主义的渺小打算，通通扔到太平洋里去。

（第21期，6月20日）

杜绝虚假的宣传

在我们宣传战线，文风已有显著的改进，假话、空话、大话少多了。但是，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

毒，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文风方面的问题还不少，虚假的宣传仍然不断发生。

新闻报道上，不准确的、夸大的、部分错误的乃至完全失实的消息，还是有。知道真相的群众很不满意。

摄制新闻图片，虚构摆布，甚至张冠李戴，肆意拼凑，这类事情也没有绝迹。

展览，有的不注意真实性。不是领袖人物或英雄模范使用过的东西，也作为展品拿出来陈列，使人莫辨真伪。

接待参观，尤其是接待外宾参观，介绍情况不实事求是，甚至明显地弄虚作假，造成很坏的影响，也不是一两次了。

写真人真事的文艺作品，在基本情节和重大问题上，背离历史事实，甚至截然两样，宣传效果适得其反，也是有的。

虚假的宣传危害很大。一条错误的消息，一张编造的新闻图片，一个不真实的展品，一次无中生有的介绍，会使得读者、听众、参观的和来访人对整个的宣传产生怀疑。虚假的东西通行无阻，受不到制止和纠正，不可避免地要败坏社会风气。那些意志薄弱的人会以此为据，振振有词地说：党的宣传机构都说假

话，我们为什么要那么老实呢？有人说：骗自己人不对，骗骗外国人是可以的。这更是荒唐的理由。在接待外宾时，注意内外有别，对一些问题保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无中生有，胡吹瞎说，只能在国际上招人耻笑，并且把我们自己的作风搞坏。

毛泽东同志说得好：“共产党不是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我们的宣传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讲的是真理，是以事实为基础，以真实为生命。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们操纵那么多的舆论工具，到处写到处说到处唱，结果却斗不赢我们一个新华社、一张解放日报，原因就是他们靠造谣吃饭，丧尽人心；我们讲真话，人们越听越爱听。取得政权之后，我们的宣传更必须保持和发扬真实的本色。出于维护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些问题可以不宣传。但是，凡是公开宣传的，都必须有根有据，符合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即使由于工作疏忽或非本身的原因出了差错，一经查明就要加以更正，事关重大的还要公开进行自我批评。至于故意弄虚作假，那更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宣传的真实性，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应该严肃地对待。从采访、写作到编辑、审稿各个环节，都要以对党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严格把关。没有把握

的、引人生疑的东西，不要轻易放过去。要加强调查研究。力戒道听途说，听了就信，信了就宣传的作风。有些宣传工作者常常上当，就是吃了这个亏。在布置展览、接待参观时，如果有人提出进行虚夸的宣传，不应该迁就照办，而必须抵制，据理力争，及时向上级反映。假宣传比不宣传更有害处，在这一点上不能让步。发现虚假的宣传，应该选择典型，在宣传工作者中发动讨论，具体分析原因，共同接受教训。有的问题还要在公开场合，澄清真象，挽回影响，不能漠然置之。关键是各级宣传部门的领导人要时刻注意抓这个问题。

(第22期, 6月30日)

不要再讹传 詹天佑发明火车自动挂钩

最近，国家出版局的内部刊物有文章指出，火车自动挂钩并非詹天佑发明，我们不能再以讹传讹了。

文章说：解放以后，我国出版了不少小册子，都介绍了詹天佑发明火车自动车钩的传说，有的还作了

绘形绘色的描述。有的书中说这种自动车钩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被称作“詹天佑钩”。一九六二年，文化部出版局编印的《出版通讯》第一期，同年七月十九日的《北京日报》，都曾先后发表文章，提出早在詹天佑修筑京张铁路以前，别的国家已发明了自动车钩，并且已在铁路上推广使用。但至今还有些报纸、书籍在宣传詹天佑发明自动车钩。

据国外有关资料记载，一八六〇年，美国人衣士洛·米勒发明的垂直式平面车钩，开始在火车客车上使用。一八八七年，美国人衣利·汉密尔顿·詹内发明一种新的垂直式平面自动车钩，简称“詹内车钩”，为美国铁路所采用。以后自动车钩虽然经历了多次改进，但米勒和詹内二人所发明的原理，迄今仍是有用的。一九〇二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第三十二卷“车钩”条附载有詹内型自动车钩的图样，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自动车钩的式样基本上是一致的。又据一九二八年出版的《美国人物传记辞典》第九册所载，詹内发明的自动车钩，曾于一八六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得到专利证。以后他又继续改进，到一八七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又得到第二次专利证。

詹天佑于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一年间，在美国耶鲁大学学习铁路工程，毕业回国后于一八八八年担任

天津中国铁路公司工程师。京张铁路是在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九年间修建的。据了解，当时京张铁路所用的机车车辆，都是由关内外铁路拨给的，而关内外铁路在一八八八年通车到塘沽和天津时，向“北英机车公司”购进的十一台美洲式 2—2—0 机车，就已装有了自动车钩。

在詹天佑生前和他逝世以后，曾编印过一些纪念性的集子，如一九一五年詹天佑编、中国工程师学会出版的《京张铁路工程纪略》，一九一〇年为詹天佑五十诞辰编辑的《南海詹京卿五十寿言》，一九一九年中国工程师学会京绥铁路同仁会拟呈的《前汉粤川铁路督办二等宝光嘉乐章交通部技监詹天佑事实册》，和当时政府颁发的《故交通部技监粤汉川铁路督办詹君之碑》，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国工程师学会北京分会编印的《詹天佑先生纪念册》等，都没有詹天佑发明自动车钩事迹的记载。

今年三月十八日，北方交通大学教授金士宣在《人民铁道》报上发表了《自动车钩不是詹天佑发明的》一文，分析了过去误传詹天佑发明自动车钩的原因是：詹天佑的英文姓写作 Jeme，而“詹内车钩”被译作“詹氏车钩”，因而以讹传讹。金还补充说，在一九三〇年他曾亲自问过同詹天佑同时在京张铁路工作、并任关

沟段工程师的颜德庆，是否知道詹天佑发明自动车钩这件事，回答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又亲自问过和詹天佑一起在商办广东粤汉铁路工作过的、解放后曾任铁道部首席参事的萨福均：“在詹家保存的木制自动车钩模型是怎么来的？”回答说：“是美国机车车辆厂送给他的。”金士宣在文章中说：“经过多方面的调查研究，看来这个在群众中长期流传的关于詹天佑发明自动车钩的故事，是张冠李戴，以讹传讹，没有根据的。”

（第22期，6月30日）

这种“纪念室”应该取消

光明日报记者反映：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同志到芜湖视察，在铁山宾馆二幢住了一夜。时隔几年，当时毛泽东同志用过的器物早已认不清了。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兴起一股风，凡是毛主席视察过的地方，住过的房子，走过的路都设立纪念馆或树立纪念碑。芜湖的铁山宾馆毛泽东同志曾经住过的两间房子，就是在这期间被封存为“纪念室”的。

据地委、市委的干部反映，为了建立这个“纪念

室”，只好弄虚作假，找来和毛泽东同志毫不相干的床铺、报纸、书籍、睡衣等等杂物放在室里。从此这两间房就不再接待客人了。芜湖是开放城市，这两间房如果用来接待客人，每年可收入五千多元，可是十多年来它却一直空闲着，没发挥一点作用。

毛泽东同志一贯主张厉行节约。现在，北京已经修建了毛主席纪念堂，在毛主席长期工作和生活过的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等地都有纪念馆，象铁山宾馆这样仅住过一夜的房间，是否有必要也设立纪念室呢？

(第22期，6月30日)

彭真同志在首都新闻单位负责人 座谈会上谈法制宣传问题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下午，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立法，首先要熟悉情况，要熟悉具体的情况。再一个，要了解党的方针、政策，而且知道方针、政策前后变化的过程。这样，才能解决问题，不出错，至少不出大错。

法就是解决矛盾的，就是在矛盾焦点上开一刀。要说虚，它就虚；要说实，它也实。立了法，就要依法办事，执法必严。一刀下去，有的是要掉脑袋的，这还不实？

法制委员会三月十三日开会成立，到现在三个多月。这么短的时间，搞这么多法，实在是很紧张的。怎么办？当初，有人提出来先务虚。我也赞成，我也实在想务虚。不过，光是务虚，到现在恐怕一个法也

务不出来。现在，全国“人心思定”，“人心思法”，我们只能拚命干，快点干。所以，只能边学边干，虚实结合。看来这个办法比较好。

立法是很复杂的。法学界也有百家争鸣的问题，因为它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利害牵扯很多。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条，我们要站在党的立场上，不能站在派的立场上。党的立场就是九亿人民的立场。第二条，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立法就是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从法律方面解决九亿人民要求解决的问题。刑法是长期性的，但又不能不针对当前的问题，带有一个时期的烙印。例如，有人不赞成把“打、砸、抢”写进去，说这类问题以后就不会再有了。没有当然更好，但很难说以后就没有。我们总要从现阶段党和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来立法。

再一条，工作中尽量不去挑起争论，尽量求同存异。几个法的草案都还有不够周到的地方，经过大会讨论后，还要修改。在报道方面，包括报道我的说明，凡是有争论的地方，在大会通过以前，先不要报道。昨天晚上的报道，我听了，抓得很准确，抓住了实质问题，我是满意的。

百家争鸣在我们法学界的表现是很广泛的。我们不去说内容，光是从语言形式上看，意见就很不相同。

有人嫌“法言法语”太多，说群众不懂；也有人嫌政治语言太多，比如“打、砸、抢”，不象个法。有人嫌重复冗长；也有人嫌太简单了，说把应该写进去的也砍掉了。我看，只要能说明问题，解决问题，现在还是短一点比较好。这些还都只是语言形式问题，还没有讲内容。所以，问题是很复杂的。那怎么办呢？我看，还是大家都按党性办事，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防止派性钻空子。我们党内从来没有过象现在这么严重的派性、这么多的帮派习气。可以说是空前的，我希望也是绝后的。一定要消除派性。当然，我不是说学术上不要争论。专门问题的讨论，那是另外一回事。问题是我们都要为九亿人民谋利益。党的利益与九亿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除了人民的利益，再没有什么别的特殊利益。我们立法就是为了九亿人民，而且只是为了九亿人民。大会以后，宣传通过的几个法，也要面对九亿人民。在这方面，我讲两个问题。

一个，经济制度。我们的法律是保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要保护全民所有的财产，这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要保护集体所有的财产，这是大量的，涉及八亿农民。另外，还要保护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包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前些年，林彪、“四

人帮”干扰破坏，随便处理社员的果木、树木，处理社员的家畜、家禽，对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侵犯得很厉害。所以，这次规定，要保护一切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这些，都是为了保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如果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讲的，当然不够格。他是从纯粹经济形态上分析问题的，讲的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个，我们还没达到。但是，我们废除了阶级剥削制度，这一点总是肯定的。这不叫社会主义叫什么？

再一个，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国体。刑法要保护我们的国体，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讲过，在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又讲过。总之，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我们要用。

我向中央汇报时，对几个法作了说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写了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现在，有人说毛泽东思想“不灵了”，说我们搞“非毛化”。因此，作这样的明确规定，是有必要的。再有，我们坚持写上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有八亿农民呀！记得刚解放时，农民说，打仗、支前，都是我们农民，要说是

党领导可以，说是工人阶级领导就不服气。那时我们要他们弄通无产阶级领导这个道理，还很费点劲哩！头些年，林彪、“四人帮”搞得好象只有他们几个人才代表无产阶级，连政治局都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了。他们用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政治局，用军委办事组代替了中央军委常委。他们只讲无产阶级专政，“全面专政”，不讲人民民主，不讲工农联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人民民主专政、工农联盟的口号丢掉，有什么好处嘛！有人说，全世界的法律都没有这样写的。那有什么？我们是搞自己的法律嘛。至于别人，他爱写不写。我们不提农民不好，不提人民民主专政不好，不对，也不利。我看，宣传上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不讲人民民主专政、工农联盟。

总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搞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保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保护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就是资本家过去拿的定息，也是合法的，也要保护，不要眼热人家的。这几条宣传上要坚持，要讲。

宣传，除了综合性的文章、社论以外，可以多写点专题文章。一篇文章可以只写一个问题，一事一报。此外，还可以作大量的通俗解释。可以有这么三类：对法律本身的解释，由人大常委会负责；对法律

执行中的问题，由法院、检察院负责；还要作通俗性的解释。

几个法公布后，要有一段施行准备时间。除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都从明年一月一日正式施行。拿选举来说，现在就搞，有些地方因为有派性，非乱不行，好心可能得不到好结果。不要搞乱。

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宣传，要注意民主与专政的问题。对人民实行民主，保护人民的权利；对敌人实行专政。

选举法和几个组织法，总的说，是个民主集中制问题。没有民主集中制，九亿人就没法团结。林彪、“四人帮”既破坏了民主，也破坏了集中。民主集中制是个很重要的东西，列宁很强调，毛主席也常讲。选举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基础。没有民主选举，民主集中制就没有基础。民主集中制还有四条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国各个组织服从中央。谁违反了这一个，就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对新的法律实施以前的案件怎么处理？是不是一个不处理？也不是。要通过揭批查，搞清楚，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处理。我们在思想上政治上一定要保持原则性。但原则性与灵活性要结合起来，这也是马列

主义的一条原则。一切要有利于安定团结，一心搞四化。

一定要搞法制。没有法制，就没有民主，也就没有安定团结。我们的民主是九亿人民的民主。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策的领导。毛主席也讲无产阶级领导主要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对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不是什么事情都由党来包办，案子也要党委来批。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是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没有无产阶级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两个方面是统一的。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是九亿人民的民主，制裁的对象不过千分之零点几，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九亿人民实行专政。六三年以前，我们一直讲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六三年在杭州制订第一个十条时，很多同志提出来是否提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向毛主席汇报时，第一天他没有表示可否。第二天我问主席，主席说可以提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过去搞土改，地富户数占百分之八，人口占百分之十。搞土改，这些人怎么团结？所以那时候提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现在提团结百分之九十五有道理，至少地富子女总要团结过来。以后主席又讲，对地富子女要重在表现。至于今天，我看团结的面更不止百分之九十五了，总是百分之九十八、九十

九。我冒叫一声，需要制裁的对象恐怕不过千分之零点几。所以，我们立法要从九亿人民出发。这样做，总是要好一点，毛病少一点。

这些问题，我主张多从正面讲，少从消极方面讲。这次人代会上，我的说明就着重从积极方面讲，从消极方面讲的少。原稿中多处提到“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大都删去了，只留了几句。从党性出发，不搞派性。我们全党同志都坚持这样做，干部、群众的思想也就慢慢一致起来了。大家一起来打“滴滴涕”、“六六粉”，消除派性。

几个法的草案在这次大会中还可以改，总之要改得叫人一看就知道是从九亿人民出发，为九亿人民着想的，是九亿人民的法。总的是民主专政，内部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一个选举四条纪律。多从正面讲。

这里，我想讲一点立法的体会。讲法，讲统治经验，过去只有统治阶级有，无产阶级没有。专政，无产阶级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学来的。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讲了这个道理。五四年第一部宪法，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当时参考了各国的宪法。我们制订刑法也是这样。一面找熟悉苏联法律的人，一面找熟悉资产阶级法律的人。同时，搞了一批案例，就是典型，然后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来搞。所以，当时苏

联和西方专家都说我们的法四不象。就是四不象嘛！各方面的专家意见也很不一致。同志们要求找个专家给大家讲讲，很难找。下次可以找找公、检、法的同志，也找一些法律专家，听听他们的意见。

宣传工作，在宣传部的统一领导下，可以统一研究一下。暂时意见不一致的，求同存异。有的意见不统一的，不用社论形式发表就是了。要允许百家争鸣。但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要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都得服从。你有意见可以保留，但组织上要服从。党内也一样，要讲纪律，党中央批准了，党员就要服从，这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原则区别之一。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多数人的意见作出的决定，是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总是真理多一些。有时候，真理也可能在少数人手里，真理在一开始并不一定为多数人所认识。但在政治上，多数人的意见就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就要服从。人民代表大会要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第 23 期，7 月 14 日）

把全党的思想 真正集中到四化上来

各地正在广泛学习和宣传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文件。这次会议接受了党的三中全会的方针，一致赞同把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今年起，集中力量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打好四化的第一战役。

实行工作重点转移，一心一意搞四化，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代表着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今年以来，各级领导部门和广大干部，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收到很好的效果。但是，从上半年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些问题很值得重视。上半年农业形势比较好，工业生产和财政收支的情况则不够理想，工业总产值只增长百分之四点一，距离计划增长百分之八的要求比较远。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百分之六点三，超支近三十三

亿元。出现这些情况，固然有客观上的原因，同时也说明我们对贯彻执行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方针下的功夫不够，转得还不够快，不够好。

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干部思想状况是好的，是热心搞四化的。但是，三中全会以来，也有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心还不那么齐，步调还不那么一致。我们要通过人大会议文件的学习，做过细的思想工作，真正从思想上来一个总动员，使广大干部都能振作精神，同心同德，把工作重点真的转过来，聚精会神搞四化，集中精力抓四化，抓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抓增产节约，全力以赴，千方百计地把今年的生产搞上去。

当前干部队伍中的一个重要情况，是有些同志对三中全会精神很不理解。他们口头上也赞成搞四化，但他们怀疑把工作重点转到四化上来，是不是“转向”，是不是“丢纲丢线”。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想法呢？一个突出的问题，就在怎样估计我国目前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以及怎样认识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林彪、“四人帮”根本歪曲我国阶级变化状况，编造我国的阶级敌人越来越多，共产党内也出了资产阶级。他们鼓吹阶级斗争永远是主要矛盾，永远是纲。林彪、“四人帮”的这种流毒很深，它仍然影响着一些人。也有

一些人，他们看到林彪、“四人帮”的这一套是不合乎实际的，是错误的。但是究竟对我国的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应该怎样看，弄不准。这是直接影响如何对待党的三中全会和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最根本的问题。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建国三十年了，阶级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已经消灭，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也已经不再存在。今天虽然还有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目前社会的主要矛盾。现在，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目前很低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到现代化水平，为此而改革我国目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妨碍实现四化的部分，扫除一切不利于实现四化的旧习惯势力，这是我国现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也是全国人民现阶段的中心工作。我们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把实现四化、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决不是什么“丢纲丢线”，恰恰抓住了纲（当前的主要矛盾），抓住了线（一条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也不是什么“转向”，而正是坚持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因为只有实现四化，

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为彻底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一些同志所以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理解和动摇，就在于他们没有看到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没有把他们的思想跟上已经变化了的客观实际。

因此，我们要认真组织各级干部学习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我国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问题的部分，要对持错误观点的同志作细致的教育和耐心的帮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认识问题。有的是中了林彪、“四人帮”的毒还不知毒。要下功夫帮助他们做消毒的工作，相信他们的思想是能够转过来的。即使有个别人一下转不过来，也不要急。重点转移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个别同志思想一下转不过来，是不足为怪的。我们党的历史上就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党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转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搞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时候，有些同志不也是思想转不过来，说那是“投降”、是“转向”吗？《陈毅出山》这出戏，就生动地展示了当时的情况。但是，事实会最后教育这些同志觉悟过来。我们要善于引导，耐心等待，不要象林彪、“四人帮”横行时那样随便给人家“上纲上线”、“扣帽子”。当

然，对这样的同志也应该有一个要求，对待中央的决定，思想上可以保留，行动上必须一致。

与此相联系的，目前也还有另一种思想。持有这种思想的同志和前者恰恰相反。他们赞成三中全会的精神，也拥护工作重点的转移，但是，他们看到贯彻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党的各项政策，遇到很大的阻力，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思潮还影响着一些人，就认为不首先把这些问题彻底解决，就不能搞四化。持这种意见的同志，用心是好的，但是，他们的这种想法，不论在对情况的估计上，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都是不妥当、不可取的。如果照这种意见办，结果会事与愿违。主观上想重点转移搞四化，实际上却没有转，或不能转。

我们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是因为在全国范围内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我国整个经济战线的恢复和发展取得很大成效，其他科学、文教、军事、外交等各条战线也都取得巨大胜利，整个国家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些说明，重点转移，条件已经成熟，并已成为客观实际发展的需要。但是，我们也并不是没有看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所造成的种种严重恶果，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得到解决，有的尾巴还相当大，林彪、“四人帮”的流

毒和影响还相当深广，有些历史遗留问题还没有处理好。看不到这方面的问题，不继续认真去加以解决，是不对的，是会犯严重错误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会犯更严重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经验是一个光辉的典范。遵义会议上确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后，首先是纠正了关系党和军队生死存亡的“左”倾军事路线，至于对王明路线的全面批判，一直到四二年延安整风时才展开。这期间，我们的党和军队集中力量于抗日战争，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说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虽然还存在，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严重存在，但是，由于党坚持的是一条正确的路线，它并不能阻挡我们前进。相反，如果当时党不是全力集中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领导抗日战争，而是集中力量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批判，认为不首先肃清其流毒，就不能进行抗日，后果会如何呢？同样，如果今天我们不正确估计当前的形势，集中力量于四化建设，而是继续把主要力量放在搞全国规模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上，其结果会是怎样呢？很可能是贻误了四化，也肃清不了林彪、“四人帮”的流毒。

安定团结地发展现代化建设，这是我国各民族全

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全国的大局，是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最大的政治。这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检验我们的思想和工作对头不对头、好不好的标准。我们一定要切实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一定要集中主要力量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努力研究实现四化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正确解决实现四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我们要继续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认真处理遗留问题。而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要坚决从四化这个大局出发，要不妨碍并有利于集中力量进行四化建设，要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地加以解决。要站得高，看得远，提得起，放得下，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决不能一拥而上，四面开花。不然，就会主次不分，轻重倒置，冲击了四化，冲淡了四化。抓住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容易解决了。撇开当前的根本利益，不从大局出发，而想解决种种矛盾，结果只会越解决越乱。事实上，只有四化建设取得不断的胜利，才能创造条件，很好地解决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所造成的各种严重问题，才能通过实践的检验彻底清算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肃清其流毒。

我们要通过对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文件的学习，帮助所有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真正从思想上牢固地树立起一切为了四化的全局观念。对四化的问题要抓得很紧。凡是有利于四化的，就坚决去做。凡是在局部看来是可行的，而从四化这个大局看来是不可行的，都应局部服从全局。决不能用某些战术的要求而干扰了战略部署，决不能为清除某些障碍而停顿了我们大军的进军。

学习人大会议文件，把全党的思想真正集中到四化上来，还要解决一个干部的精神状态问题。有同志说，我们这里，当前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而在于我们干部的精神状态同四化这样一场伟大革命之间严重失调。这个话语重心长。现在，在我们干部队伍中，的确存在着不少消极情绪。有的同志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利用职权为个人、为亲属谋私利，甚至违法乱纪，任意挥霍国家资财，满足个人的私欲。群众说，人家是一心奔四化，他们却是埋头家庭的现代化。有的不负责任，作官当老爷，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上班，不干事，只画圈，不拍板。有的闹派性，以我划线，互相扯皮，各搞一套，各行其是，一切从小团体、小宗派的利益出发，什么四个现代化，什么党性，一概丢在脑后。有的独

断专行，随心所欲，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把国家的利益、四化的利益当成儿戏。有的精神不振，消极畏难，遇事两手一摊，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无所作为，“吃社会主义”、“等四化”。这些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病毒，侵入党的肌体，严重妨碍我们聚精会神搞四化、一心奔四化。我们要通过这次学习，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认真解决这些问题。精神状态问题，归根到底，是个世界观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从今天来说，诚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就是要诚心为四化服务。因此，精神状态的核心问题，就是对四化的态度问题。是大干四化，还是等待四化、坐吃四化、坑害四化，这是衡量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党的干部，是真革命，还是不革命、假革命的重要试金石。千秋功罪，历史自有评说。在历史评判员面前，应该争取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评说？我们每个党员和干部，都应该作出自己的抉择。

（第26期，8月6日）

把革命的精神财富留给后代

湖南等地党委积极组织老干部撰写革命回忆录，这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值得重视和提倡。

在长期艰苦曲折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党培养了大批老干部。几十年来，他们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忠心耿耿，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英勇奋斗，为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作出了宝贵贡献。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他们继续坚持革命，为人民立了新功。在林彪、“四人帮”猖獗时，许多老干部横遭残酷迫害，处境十分艰难，但他们顽强不屈，为真理而斗争，在狂风恶浪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粉碎“四人帮”以后，无数老干部长期被压抑的革命积极性迸发出来，他们决心在有生之年，大搞四化，彻底改变我们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老干部们的这种革命精神，是十分感人的！

老同志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他们是伟大事变的参加者、历史发展的见证人。这些老干部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全面而完整的理解，对革命斗争

经验有深刻的认识，对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培育的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有切身的体会。把我们的革命事业持续下去，就需要老干部把这些精神财富传给中年、青年和少年。因此，一个光荣的任务落到了老干部的肩上，这就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革命回忆录。有很多老干部已经这样做了，不少的老干部正在这样做。我们希望还有更多的老同志把精力放到这个意义重大的工作上来。

这里，特别值得讲一讲的是，有些老同志，人老体弱，实在不能坚持正常工作，担任实职已感力不从心。他们愿意在其晚年，机动地做些力所能及的有意义的事情，如撰写革命回忆录，整理革命斗争历史资料等。他们一心想的是给后代多留下革命的宝贵精神财富，而不要求组织上给自己安排一个职位，挂个什么“官衔”。这些老同志在晚年这样抉择安排，正是无产阶级老战士们觉悟高的表现。他们这种一心为革命着想的精神，尤其值得全党同志特别是年轻同志学习。

革命回忆录是教育后代的无价之宝。它内容真实，思想深刻，亲切感人，文字朴实，因此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感染力。过去许多青少年，就是在

革命传统教育的激励下，树立远大理想，走上革命道路，逐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现在部分青少年思想道德品质不良，社会风气不正。这已成了一个令人关切和焦虑的问题。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应该看到，这十几年来，缺乏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就是一个重要原因。加强青少年的思想教育，改造社会风气，这是全党的任务，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每个党员干部都应该担负起这个职责。老干部积极撰写回忆录，也正是在这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从根本上扭转社会风气，关键是要把党风搞好。最近，叶剑英同志指出，老同志要有三条目标，第一把经济搞好，第二把领导班子搞好，第三把党风搞好，这样，去见马克思的时候才能少打屁股。老同志写的回忆录，生动具体地宣传党的优良传统，可以推进整顿党风的工作，激励广大党员恢复和发扬战争时期那种革命精神，一心一意搞四化。

组织老干部撰写回忆录，尤其是写有关我党早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录，有十分紧迫的意义。现存的参加过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老同志已不多了。如果不抓紧组织撰写回忆录和编写史料，将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周恩来同志生前曾经对老干部说

过：“我们老了，为党工作的时间不多了，要抢时间工作才行啊！”老干部在有生之年写回忆录，也正是抢时间为党和人民从事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较之从事日常的工作，影响更为深远。

撰写回忆录，应该贯彻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原则。应该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对老干部写回忆录的种种诬蔑之词，坚决打破他们设置的条条框框，尊重历史，注重事实，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认真写作，把革命回忆录写出新的水平来。

各级党委和有关宣传出版部门，要积极做好动员和组织老干部撰写革命回忆录的工作。并且，要尽可能地为一些老干部解决写作力量、核对史料等困难，给他们的工作创造必要的方便条件。有些老同志文化程度不高，或者自己动不了手，要给他配上助手，或者材料员，或者由宣传、出版部门派人帮助工作。总之，一定要抓紧、抓早，力争抓出更多更好的成果来。

（第27期，8月16日）

湖南积极组织老干部 撰写革命回忆录

据中组部老干部局材料反映：湖南省委采取多种形式，充分调动老干部的积极性，发动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革命回忆录。今年三月，在省委的领导下，省委组织部和宣传部，联合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进一步组织好老干部编写革命史、回忆录的工作。参加会议的有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局、文化局、广播局、文联、新湘评论、湖南日报、历史博物馆、湘江文艺、党校党史教研室、师范学院历史系等单位。会上学习了中央的有关文件，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破坏编写革命回忆录的罪行，交流了发动老干部写回忆录的经验，研究了今后加强这一工作的意见。大家决心通力合作，积极协助老干部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搞资料，挖宝藏，把无限丰富的革命事迹载入史册，教育全党，激励后人。

在组织撰写革命史、回忆录的过程中，湖南普遍采取三种做法：一是组织身体尚好，有写作能力，但

不是担任实职的老干部自己动手写。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顾问张沈川同志，对我党早期的无线电工作，比较熟悉，又有写作能力，便自己动手，现已写出一部三万字的《地下党电台》的历史资料。原省民政厅厅长谢竹峰同志，曾参加过湘南游击队的斗争，写了《湘南游击队的日志》一书。二是对有写作的迫切愿望，但因文化水平关系或身体有病，力不从心的老干部，组织上为他们配备助手，本人口述，帮助整理。原省委统战部部长谢华同志，在“西安事变”期间，担任我党西北特别支部书记，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他对“西安事变”的前后经过了解比较详细，想写《西安事变的前后》一书，但因患病不能亲自动笔，组织上便与谢华同志爱人的所在单位进行联系，让她每天抽出半天时间，帮助谢华同志编写，前不久已在《湖南日报》全文登载。三是组织专业写作队伍，深入采访，开座谈会，收集资料，进行编写。

对已经写出来的书籍和资料，他们根据资料的性质，分成各种不同的典型，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经过核实，和领导批准的重要材料，在《湖南日报》和《新湘评论》上登载，或由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有些不宜公开发表的重要史料，则登在《湖南历史资料》上，供领导和有关部门参考；一些片断的素材，由省

人民出版社印成《革命历史参考资料》。

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来，湖南省开展撰写革命史、回忆录的工作，已取得了初步成果。除在《湖南日报》和《新湘评论》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外，省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毛主席一家六烈士》、《杨开慧》、《秋收战鼓》、《红军长征在湖南》、《朱德同志在湘南》、《贺龙同志的故事》、《向警予》、《水口山工人革命斗争的故事》等十一本书。已经付印即将出版的有《毛泽东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蔡和森》、《任弼时》、《夏明翰》、《柳直荀》、《贺景齐》、《刘东轩》和《蒋生荣》等书。正在写作中的有《平江起义》、《嘉义惨案》、《湘南暴动》、《三五九旅在湖南》、《文化书社》、《新民学会》、《彭德怀同志在平江》、《徐特立》、《潘心元》和《毛泽建》等书。

（第27期，8月16日）

所有干部的必修课程

这一期刊载了两个材料：一是《“害群之马”也可改造为新人》，讲贵州省委对个别在政治上误入歧途的人做耐心细致的教育挽救工作，取得成功的事（编者按：收入本书时，本文略）；一是《一个女青年为什么开枪杀人？》，反映新疆一个农场某些领导处置失当，逼得共产党员蒋爱珍走投无路，最后持枪连杀三人。同志们看了一定会引起深深的震动和认真的思索。

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如何做思想政治工作。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同志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学说，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在二十多年的实践里，我们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林彪、“四人帮”故意颠倒敌我关系，无限上纲上线，把很多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歪曲成敌我矛盾，造成累累冤案，流毒极

其深远。至今，我们还有不少干部没有学会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懂得对不同性质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针和方法去处理。在我国内部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的今天，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政治，在过去主要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现在，随着国内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和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政治的内容已经转变为主要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致搞四化。共产党员在人民群众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增强团结，为实现党的路线共同奋斗。不能扩大矛盾，把矛盾推向激化，更不应该人为地制造矛盾。即使确属阶级斗争的问题，也要注意发挥政策的威力和法律的作用。蒋爱珍同一位男同志的正当交往，被一些人瞎说成是乱搞男女关系，平白制造了一个尖锐的矛盾。而后又采取监视、搜查、斗争等等横暴手段，把矛盾不断推向激化，直至酿成三条人命的惨案。蒋爱珍开枪杀人，当然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应该受到法律惩处。但是，有些人主观武断，不讲政策，胡作非为，他们对酿成这个事件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相反，象某某这样的人，思想反动，触犯刑律已经构成犯罪行为，简单惩办一下是很容易的。贵州省委不是这样。他们决定先作人民

内部矛盾处理，摆事实，讲道理，开展说理斗争，同时又给有关的人落实政策。结果这些人回了头，表示要甩掉“害群之马”的帽子，为“四化”作贡献。一反一正，雄辩地证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能够把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把走到敌人边缘的人拉回到人民队伍中来；错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却会使非对抗性的矛盾激化为对抗，使一个好青年变成刑事罪犯。掌握这种那种领导权力的人，稍一不慎，后果有多么严重啊！

我们每个干部、每个共产党员，分工尽管不同，但都有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那就是做周围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用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在人民内部，例如领导和群众之间、领导集体之间、群众和群众之间，妥善解决这样、那样的矛盾，消除隔阂和误解，加强思想上、行动上的统一，是我们必须掌握的一门主课。同别的事情一样，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基本的原则还是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先要把问题的性质、份量看准。没有问题不要说成有问题。是这样的问题不要说成是那样的问题。四两不要说成千斤，千斤也不能说成是四两。在这方面，来不得半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第一要情况明。第二

要亲自出马，动口动手做工作。切忌想当然地处理问题，“闭塞眼睛捉麻雀”，更不能容许高压政策。有的干部一言不合，就瞪眼睛，拍桌子，想把人家的嘴封住。与其说这是进行思想教育，还不如说是在扩大矛盾，制造事端。只要我们手里有真理，并采用正确的方法，终归是能赢得人心，取得绝大多数人赞同的。干吗要大动肝火呢？

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有些同志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拿的尺子并不对头。批评人家生活作风有问题，其实是自己用封建眼光，看不惯正常的男女交往。指责别人解放思想过了头，很可能是自己的思想还束缚在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之中。教育者应该先看看拿来教育群众的货色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不是那么马克思主义的，那就要通过学习加以改正。千万不要自以为是，不能认为职务比人家高一点，掌握的真理就一定多一点，因此横竖我讲你就得听。如果抱那样的态度处理问题，矛盾不但不能得到解决，而且会横生枝节，产生新的问题。说到底，这是一个群众观点的问题，是否甘当群众的小学生的问题。

重视做好群众思想政治工作，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之一。这些年，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这个好传统受到很大破坏。

在新长征中恢复和发扬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当务之急，更是各级宣传部门和宣传干部的首要职责。让我们眼睛向下，真正到群众中去，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发扬和光大党的光荣传统吧！

（第28期，8月18日）

一个女青年为什么开枪杀人

新疆石河子地区中级法院院长王心如写信给《人民日报》，反映一个女青年被逼行凶杀人的事件。情况如下：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新疆石河子一四四团医院外科护理员、党支部委员、现年二十三岁的女青年蒋爱珍，连续枪杀三人，成为罪犯。

这天上午，蒋趁给参加实弹射击的民兵取枪的机会，拿到步骑枪一支，即到内科办公室对准医助李佩华说：“叫你造谣！你叫我死，我让你先死！”开枪将李击倒。她欲打另一医生时，因门被关死，无法下手，便直奔外科走廊，见医务统计员钟秋正与人说话，便

说：“我叫你造谣！”话落枪响，钟被打倒。助产士戴树芝闻声出来问：“怎么了？”蒋说：“怎么了！我叫你死”。又将戴打倒。接着，又向迎面走来的郭××医生射击，因郭以蛇形奔跑，未打中。蒋又到宿舍寻副院长粟肖成、司药谢世平，不遇。此时，卫生所副所长张国政等人喊话，劝她放下武器。蒋说：“你们谁再走近五米，我就开枪。”后来蒋进入女厕所观察粟、谢时，终被捕获。

蒋爱珍为什么杀人呢？

蒋任护理员后，其兄曾托他的老战友张国政多帮助她。张对蒋便以亲妹相待，加之工作关系来往较密，竟引起李佩华、谢世平等人怀疑。一四四团医院由两个卫生所合并建成后，张国政为医院党支部副书记。该院宗派主义严重，李、谢等人与张有矛盾，想抓张把柄，把张整下去。

一九七八年蒋被批准回浙江探亲，决定三月十八日起程。三月十七日晚，蒋值完夜班回到住处，见张国政与周××在等候。张以兄长的口气对蒋嘱咐了在路上注意的事项，随即告辞而去。蒋整理衣物洗漱后就寝。这天，李佩华等人经密商并经领导允许，准备捉奸。张、蒋的活动已被监视。当晚，李佩华、谢世平等人在深夜借口叫蒋起床，闯入住室搜索，并未发

现异常而后走去。蒋感到李、谢行动鬼祟，怀疑偷她的钱，当夜向支部作了汇报。

三月十八日，蒋得知头晚是要捉奸，气得卧床不起，进行绝食，并放弃探亲假，要求组织予以澄清。李、谢向团领导谎称：“张国政从蒋的住室跑出来，没有捉住。”团党委根据谎报，决定由副参谋长杨铭三组成五人工作组进驻医院，调查所谓三·一七事件。工作组进驻后，蒋主动向杨铭三诉说冤情，并将三月十七日晚的经过写了书面材料。杨对蒋打官腔，要她“相信群众、相信组织”。这时，医院和其他单位谣言四起，说什么“三月十七日晚捉住奸了，张国政是从蒋爱珍的肚皮上拉下来的。”蒋听到谣传，刺激很大，食宿不正常，精神错乱，大声哭叫，到处乱跑。经本医院治疗后，四月二十六日由其兄接回石河子休养。

六月十九日，蒋病愈回到医院，看见到处贴有她与张的大字报，内容是质问三月十七日晚“你们干了些什么？你为什么装疯卖傻？”还有一批低级庸俗的漫画。蒋找各级领导哭诉冤情。当找到杨铭三时，杨让蒋交代和张国政的关系，蒋据理驳斥。杨气急败坏地说：“明天你在会上把三月十七日晚的事说清楚。”蒋问：“是否可让抓的人说说，我听听。”杨答：“你说他们不能听，他们说你不能听，你要老实向群众说清楚。”

蒋被迫于八月二日在群众代表会上又将三月十七日晚的活动说了一遍，但捉奸的人却参加听蒋说清楚。有人质问蒋，蒋也质问为什么他们参加。杨大发雷霆，勒令蒋退出会场，并对蒋说：“不能与张国政接触，现在是审查你们的问题。”蒋在气愤之下找某医生哭诉。杨得知蒋与某医生谈话，就以为某医生为蒋出谋划策，即在会议上批评某医生。蒋站出来解释，杨厉声说：“某医生要检查，你也要检查，就凭你和张国政的接触，跳到黄河也洗不清。”蒋以为她与张国政的关系，杨已做了结论，即找主要领导谈话，但团主要领导却敷衍了事地说：“你实事求是地向组织上讲就行了。”

蒋自从六月份回到医院后，感到行动受到监视，和谁谈心，谁就受到一些人的挖苦，或受到杨铭三的批评。八月二十九日，蒋接到恋爱对象的挂号信，方知以前来的平信没有收到；父母来的四封信也只收到一封。她认为信件被人拆阅扣押。医院副院长在一次大会上讲：“送病号团里不给车，一个破鞋却用小车送到石河子。”在九月份一次会议上，李佩华指着蒋说，“你装疯卖傻，你怎么不去跳渠，不去上吊。”蒋人格受到极大侮辱，气愤已极。蒋父病重三次来电催其速回，但杨一再推诿不准。九月二十六日让蒋再次在会上说清楚。李佩华、谢世平拿出要求对蒋进行妇检的

第二个报告，当众宣读，主持会议的杨铭三非但不予制止，却接过报告说转报团党委。

蒋爱珍受到一系列的迫害侮辱，名誉遭到破坏，莫须有的事却愈演愈烈。她觉得各级领导不能为自己洗白冤情，有的领导人反而认假为真，实在忍无可忍，因此产生了拚死的恶念。九月二十七日，蒋书写了十六页申诉信，又给工作组、亲属、张国政写了遗书六份；二十九日晨，又给其兄及好友写了遗书两封。九时许乘参加打靶之机，连续用枪打死李佩华等三人，酿成一件恶性杀人惨案。

（第28期，8月18日）

继续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在全党进行唯物主义的 思想路线的教育

最近几个月来，有些地区在组织干部学习党的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文件中，结合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继续进行深入的学习和讨论。中宣部在最近几次例会上，也着重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这个做法很好。这对于端正思想路线，继续解放思想，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自觉性，澄清一些模糊认识，促进四个现代化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各级宣传部门，应该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做好工作，把这个学习和讨论不断引向深入，使全党同志受到一次深刻的唯物主义的路线教育。

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政治路线，从这个意义来

说，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前提。而有了正确的政治路线，要贯彻执行好，也必须有正确的思想路线，不然，就会受到错误思想的抵制和干扰，或者贯彻不下去，或者在执行中走了样；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执行政治路线就摇摇晃晃，从这个意义来说，正确的思想路线又是正确贯彻政治路线的思想保证。正确的思想路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就是坚持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核心。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就有了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武器，用群众的话说，就是掌握了从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的“金钥匙”、“总开关”。我们就能在各种纷繁复杂的现象面前，正确地估量形势，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依据客观固有的规律，确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动地改造世界。这样，我们在一切工作中，就可以减少或避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这些年来，林彪、“四人帮”对我们党的事业进行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其中为祸最烈的，就是把我们的思想路线搞乱了。他们到处拿着片言只语骗人，阉割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们到处用吓

人的大话给下面“压任务”，根本不顾实际情况和主客观条件的可能；他们一切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和好恶出发，到处弄得是非不分，好坏不分；他们无限地夸大个人的主观作用，眼睛里根本没有党组织，没有人民群众；如此等等。一句话，他们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精神桎梏，把人们的思想禁锢得紧紧的。使有些人中毒不知毒，习惯于用他们的那一套思想方法，用“左”的有色眼镜来观察世界，这样就不能不把问题看偏了，看歪了，甚至看颠倒了。党的三中全会所以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因为这场讨论从马列主义的根本原理上进行了拨乱反正，划清了真高举、假高举的界限，冲破了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也破除了我们同志思想上的僵化半僵化状态，坚持和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而也就有利于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政治路线。实践证明，凡是这场讨论搞得好的地方，人们的思想就比较解放，精神面貌为之一新，贯彻党的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的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和其他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就大为提高。但是，这场讨论还很不平衡，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搞得较好一些，有些则搞得差一些，有些地方和部门实际上还没有展开。三中全会以及这次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以来，

有些干部对党的许多重大决策和方针政策所以很不理解，担心是不是“右”了、“偏”了，存在着许多模糊思想，就和思想路线很不端正大有关系。

继续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行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首先要抓好一千七百万干部，其中重点又在县以上的领导干部。中央机关和各省、市机关更应该首先搞好。没有进行讨论的要认真补课，已经进行了的要继续引向深入。这不仅因为干部是群众的带头人、带路人，领导干部的认识问题解决了，下面就会顺利开展起来。更重要的，是因为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现在，党的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都已确定，我们全党、全国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政治路线，是搞四个现代化。如果不解决好干部的思想路线问题，有些干部对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模模糊糊，动动摇摇，甚至思想抵触，党的政治路线就不可能得到顺利贯彻，各项政策就无法落实，对的不能坚持，错的不能改正，群众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四个现代化就会是一句空话。只有认真补上这一课，在广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中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教育，才能更好地把广大干部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上来，提高广大干部贯

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以及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同心同德、聚精会神、振作精神搞四化。我们一定要把端正干部思想路线的问题，作为党的政治路线能不能很好贯彻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作为教育、培养、考核和选拔干部，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一件大事，有计划、有步骤地认真抓好。

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深入下去，进行一次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要解决好某些干部的不必要的顾虑和抵触情绪。例如，有些地方少数人一听到要开展这场讨论，就说是什么“为砍旗制造舆论”。这类错误观点的存在，说明有些干部中林彪、“四人帮”假高举的毒很深，实际上连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怎样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都没有搞清楚。因此，很有必要结合这场讨论，组织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对有些干部进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什么叫启蒙？就是从A、B、C学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A、B、C，它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抓住片言只语不放，那就是抓住了枝叶，丢掉了根本。这样，即使主观上是想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实际上恰恰是损害

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而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行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目的正是为了拨乱反正，把林彪、“四人帮”强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切歪曲、阉割和不实之词统统推倒，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益增其光辉。这不但不是什么“砍旗”，恰恰相反，正是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至于毛主席讲过的某些个别结论，由于客观情况的变化，对目前的客观实际已不符合，我们根据新的情况作出新的结论，是不是“砍旗”呢？当然不是。对于这个问题，要组织干部学习一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看看列宁是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的个别结论，毛主席又是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列宁的个别结论的。革命导师的伟大榜样教育我们，只有坚持从实际出发，敢于用符合新的历史条件的新结论代替某些和实际情况已经不相符合的旧结论，才能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够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永葆其美妙的青春。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崇高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正是因为这样，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再教育我们，要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我们一定要密切

联系实现四化的伟大实践，多看一点书，多学一点基本理论，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上多下功夫。

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继续搞好，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密切结合当前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不能停留在对去年讨论情况的回顾和复述上面。今年已不同于去年。去年这场讨论开始时，党的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现在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都已提出要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次的讨论，必须紧紧围绕工作重点转移，围绕四化这个中心任务来进行。要组织干部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弄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和生产力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弄清目前我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有些同志长期来习惯以阶级斗争为纲，现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了，他们就手足无措，不知怎样工作好，以至对党的政策产生怀疑、抵触。要通过这次学习讨论，帮助这些同志提高思想，认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为中心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使自己的思想跟上已经变化了的形势，努力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千方百计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要

用实践标准这个武器，认真总结三十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总结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的经验教训。要特别注意运用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去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把这次学习讨论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结合起来。从过去和现在的实践中，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从目前积累起来的大量问题和矛盾中，从国际国内情况的对比分析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不仅要找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而且要找出发展本地区、本部门以至本行业的特殊规律，改革经济，改革管理，改革制度，改革技术，改革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端正思想路线涉及的面很广，我们要想得宽一点。其他各行各业的同志，搞科学技术工作的，搞教育和文艺工作的，搞政权和法律工作的，搞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工作的同志，都应结合本部门的实际，以实践标准这个武器，总结本部门工作的经验教训，找出改进工作的方向和途径。总之，要使我们的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都能遵循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制宜，力求按照客观规律来充分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作用。这样一定会大大提高我们全党的思想水平、领导水平和工作水平，我们的工作一定能够做得更好，四个现代化以及党的其他各

项事业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这里我们还要着重澄清一个问题。有些同志所以不敢开展这个讨论，怕这怕那，据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怕讨论以后，人们思想一解放，就会把工作搞乱。这是一个绝大的误解。其实，解放思想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就是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问题。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提倡解放思想？就是因为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和各种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框框，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障碍人们不能从实际出发，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解放思想的目的是，就是为了能够打破这种种的精神枷锁和思想束缚，澄清林彪、“四人帮”对客观真理的种种歪曲，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同时只有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端正了，思想才算真正得到解放。恩格斯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人们认识了必然，认识了客观规律，人们才会有自由，思想才算真正获得解放。因此，看一个人的思想是不是解放了，不是看他主观夸张的程度，而是看他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的程度，看他对于客观规律认识的程度。越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越端正，对于客观必然的认识越多，思想就会越解放。从这个意义来说，解放思想不存在什么过头不过头的问题。过犹不及，从一种形而上学转到另

一种形而上学，正是说明思想还没有真正解放。因此，解放思想，归根到底就是要从形形色色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路线中解放出来，站到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上来。如果大家都这样正确理解解放思想的问题，就不但不会害怕它，而且会由衷地欢迎它。它不仅不会搞乱我们的工作，而只会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自然，人们思想比较解放了，比较讲求实事求是了，对于上级机关某些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指导，就可能提出批评意见，甚至加以抵制。这在有些领导同志看来，可能就认为是什么思想解放“过了头”，搞得工作“乱了套”。但是，对于我们的事业来说，这样一种“乱套”有什么不好呢？

结合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文件的学习，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端正思想路线，一定要坚持正面教育。在学习讨论中，要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主义”。有些同志对三中全会的精神很不理解，讲了一些错话。不要随便给他们上纲上线，给人家扣什么反对和攻击三中全会的帽子。思想问题来不得半点粗糙，切忌操之过急。要通过学习和讨论，摆事实，讲道理，和风细雨，心情舒畅地解决问题。同时，要真正做到思想路线正确，也不是通过一两次学习讨论就

能实现的，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努力。至于有些同志对三中全会的决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文件提出一些疑问或者不同意见，这是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所允许的，不要加以指责。要越讨论越舒畅，越讨论越团结，越讨论越有劲。真正弄通思想，团结同志，齐心协力搞四化。有些地方在学习讨论中结合社会调查，这个做法很好，值得提倡。在报刊宣传上，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版面不宜过分集中，以免引起国内外不必要的误解。当然，主要还在于内容。只要注意引导大家把这场学习讨论和四化、和实际工作紧密结合，就不会冲击或冲淡了中心任务。要注意文风。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的讨论，要心平气和，要说理，要留有余地，避免使用一些尖刻的、谩骂式的语言。不然，既不利于团结，也不利于“双百”方针的贯彻。所有文章都应该实在，切戒浮夸。事实要严格核实，不要道听途说，要经得起客观的、历史的检验。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继往开来的新时期，拨乱反正的任务很重，牵涉的面很广，触动很深。随着改革工作的不断展开，我们面临的问题和矛盾还很多。我们思想战线的同志，在进行这个巨大工作的时候，既要积极坚决，又要稳妥可靠。既要立志改革，坚持思想的先进性，又要从多数人的思想实际出发，逐步地做工

作，不要图一时痛快。要柔中有刚，刚柔并济。总之，要多思。要多一点辩证法，少一点形而上学。讲究领导艺术，讲究工作方法，讲究实际效果。把我们思想战线的工作越做越好，在实现四化的伟大事业中，更好地发挥我们意识形态部门的积极作用。

(第30期，8月29日)

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 提高贯彻党的政治路线的自觉性

——上海机电一局党校轮训干部的情况

上海机电一局党委为了使企业主要领导干部适应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今年三月，抽调所属工厂一、二把手一百四十一人到局党校轮训，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企业管理三门课。这期开学时，正是党内和社会上出现“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不少干部对三中全会的决策存在着某些错误思想和模糊认识的时候，局党校针对干部的思想情况，着重抓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学习，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解决了许多重大思想问题，提高了

干部对三中全会精神的认识以及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了解干部思想情况，做到有的放矢

学习开始时，一些学员思想比较乱，校部为了做到有的放矢地搞好学习，要大家首先摆问题。学员一下提出了三十九个问题，概括起来有五个想不通，即：对三中全会高度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搞不通，认为“这场讨论是造成乱的总根子”；对说革命领袖有缺点错误想不通，认为“这是砍旗”；对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生产为中心想不通，认为“这是丢纲丢线”；对强调要解放思想、发扬民主想不通，认为“现在民主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再发扬下去基层没法工作了”；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想不通，认为“这是否定以往历次政治运动”，“是向右转”，“是投降”。想不通就埋怨。

校部反复分析了这些情况，认为解决这些思想问题不能就事论事，一定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来武装干部，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分清路线是非界限，才能把干部的思想真正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学习方法要坚持毛主席

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学风，贯彻“三不主义”，不回避实际问题，但强调正面引导，由浅入深，力求做到道理讲得透一点，事实摆得足一点，思想搞得活跃一点，让学员充分展开讨论，做到心情舒畅地解决思想问题。

把学理论、肃流毒 和解决思想问题结合起来

怎样解决学员的模糊认识，使学习既有理论上的系统性又有思想上的针对性？校部决定把基本理论的学习和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解决学员思想问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针对五个“想不通”，着重抓了以下三个基本问题的学习讨论：

一、从学习哲学的基本问题，存在与思维、物质与精神、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关系入手，弄清三中全会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分清真高举与假高举，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与“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的界限。

针对学员中的模糊思想，校部出了三个专题引导学员讨论：第一、物质与精神、实践与理论，那个是第一性？二、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一个，还是两个？三、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绕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行不行？

关于物质与精神、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以及真理标准的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但多年来林彪、“四人帮”颠倒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片面强调精神、理论、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决定一切，对干部影响很深。学员们学习了《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二章和《实践论》，看到恩格斯把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提到哲学上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最基本问题的高度；毛主席也明确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对大家教育很大。有些学员说，我们原以为修正主义就是强调物的作用，强调生产力，搞物质刺激，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强调精神作用，强调意志，强调理论高于一切。现在才晓得这是中了林彪、“四人帮”的毒，革命导师讲得明明白白，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理论来自实践，受实践检验，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不能把两者的关系颠倒过来。有些同志原来把理论的指导作用和检验真理的标准混为一谈，把理论的指导作用理解为“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认为既然“句句是真理”，当然可以检验一切了。通过学习，认识到人类对客观世界的

认识是没有止境的，一个人不可能穷尽真理，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理论的指导作用只能按照毛主席多次指出的，用革命导师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句句照办”。至于理论本身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规律，理论本身是无法检验的，只能通过实践来检验。把指导作用和检验真理的标准等同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还联系讨论了真高举和假高举的问题。不少同志对林彪、“四人帮”搞的那套宗教迷信活动有反感，但对它在思想理论上造成的严重危害性却认识不足，加上对毛主席有朴素的阶级感情，总认为对领袖的宣传越完美越好，就是有些过分也是斗争的需要，因此现在听到说个别论断有缺点，不完全符合实际，在感情上就接受不了，认为是“砍旗”，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有些同志说，真理标准讨论以前，大家头脑中有权威，“本本”就是权威，思想很统一。真理标准讨论以后，权威没有了，思想象洪水冲破了闸门，收不住，一下子“乱”了，因此认为毛病都出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上。学习了革命导师关于实践和理论关系的论述，弄懂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他们说，对权威要有分析，正

确的权威，应该建筑在科学的基础上。过去根据片言只语照搬照抄，其实是盲目的迷信，是思想的僵化。现在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思想很活跃，懂得理论要与实践结合，对的坚持，错的改正；即使过去是对的，现在条件变了，就要按新的情况办。这就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核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权威，这不叫思想乱，而叫思想活，这不是“砍旗”，恰恰是举旗。象列宁说的，头脑真的长在自己的肩膀上。这样，我们的党才有希望。如果认为按照“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那样去做才算高举的话，那林彪、“四人帮”的调子最高，好话讲得最响，岂不是他们变成最高举了吗？

关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不能绕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有些同志原来认为，实现四化和真理标准讨论没有什么关系，用不着讨论也能搞四化，说这场讨论是理论界吃饱饭没事干搞出来的。经过学习，许多同志回顾了这场讨论的前前后后，对拨乱反正，向四化进军中遇到的大量事实进行分析后，深有体会地说，我们在基层工作了多年，要搞好生产，不认真抓生产，不一心一意扑到生产上，不建立规章制度，不实行按劳分配，不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是根本不行的。可是林彪、“四人帮”把这些都当作修正主

义的一套批判过。要把这种颠倒了的是非拨正过来，一度阻力很大。因为“四人帮”的所谓批判往往正是从“本本”上摘取片言只语作依据。不确立实践的标准，这些颠倒了的是非就很难颠倒过来，我们的思想、工作还要乱下去。所以，三中全会充分肯定实践标准的讨论，正是拨乱反正的有力措施，具有深远意义。有些同志还提出，在实现四化中还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在“本本”上都很难找到具体答案，有了实践标准以后，工作起来就有了依据，再也不会束手束脚了。通过学习讨论，有些原来对真理标准讨论有反感，认为是“乱的总根子”的同志，也开始看到这场讨论的重大意义。有的小组还把这场讨论的意义归结为六个有利：有利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端正思想路线；有利于统一全党认识，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有利于坚持实事求是，总结经验教训；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有利于维护毛主席的形象，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有利于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加快四化步伐。

二、从学习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入手，掌握正确分析形势的方法，弄清三中全会强调解放思想，发扬民主，不但不会大乱，而且有利于大治的道理，分清主流与支流、现象与本质、特殊

与一般的界限。

学习开始时，社会上确有些乱，有人闹事，有人煽动右的思潮，一些企业也为落实政策等工作，忙得团团转。有些同志说，这些事过去都没有，现在有了，是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引出来的。后来，中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些同志又说，这是纠偏，是收。

学习中，大家对这种思想进行了讨论，讨论前先花几天时间，反复学习了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毛主席《矛盾论》以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些重要讲话。从思想上明确三个问题：（一）分析某一社会现象，首先要分析它在整个社会变化中，处于主要地位还是次要的地位，也就是要分清主流和支流；

（二）分析产生某一社会现象的原因时，要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的内在联系来看，不能把它割裂开来，而要把握实质，也就是要区分现象与本质；（三）在分析工作中的问题时，要划清是执行政策中的问题还是政策本身的问题，区分特殊与一般。

这几个问题弄清以后，思想上有了辩证法，分析具体的社会现象就比较清楚了。机床公司有个厂长原来认为形势不好是因为上面路线偏了，学习后认识到不是上面偏了，而是自己把问题看偏了。偏在那里呢？他说：偏就偏在把支流当作主流，只看到少数乱的现象。

象，看不到大量治的成果；偏就偏在把现象当作本质，只看到社会上的乱和右的思潮出现在三中全会之后，就认为是三中全会造成的。其实，乱的因素和错误思潮早就存在了，只不过这段时间表面化罢了。正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多年破坏，使问题堆积成山，四项基本原则的威信受到损害，这才是闹事和错误思潮出现的根本原因；偏还偏在把特殊当作一般，把执行地富摘帽等政策中存在的具体缺点（主要是没有先在党内打招呼，步子急了一点），归罪于政策本身。

思想上有了辩证法，也就容易和林彪、“四人帮”搞的那套形而上学、一点论、绝对化划清界限。有个厂的厂长说，我原来总把加强党的领导与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对立起来，以为我们国家没有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的条件。五七年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出了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发扬民主，出了林彪、“四人帮”；这次发扬民主，又有人闹事。现在认识到，加强党的领导和发扬民主是辩证的统一。社会主义民主，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充分发扬，党的正确领导也只有通过发扬民主，才能得到保证。历史经验证明，在党的领导比较正确的时候，党内外民主生活就比较正常，人们心情舒畅，敢于讲话，即使暴露一些错误思想，也比较容易识别和纠正。只要党的民主生活受到

破坏，党的正确领导就会削弱或受到损害。林彪、“四人帮”所以能篡夺党和国家的一部分权力，正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特别是党内民主遭到破坏的结果。至于现在有个别人煽动闹事，这是林彪、“四人帮”的那套“踢开党委闹革命”，无政府主义流毒在起作用，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根本是两回事。经过这样的学习讨论，不少同志改变了原来对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的错误看法。有的同志说：解放思想振人心，落实政策得人心，发扬民主齐人心，只要我们切实按照三中全会的方针，把思想工作做到群众心里去，安定团结的局面一定能进一步发展。

三、从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入手，弄清三中全会确定的工作重点转移这一战略决策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分清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林彪、“四人帮”那套阶级斗争就是一切、阶级斗争永远是纲的界限。

有些学员所以认为“重点转移是丢纲丢线”，主要有三个接受不了：（一）在感情上接受不了。这些干部大部分是解放战争时期或解放初民主改革中参加革命的。有的同志说，我们是在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中入党的，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逐步担任领导工作。现在工作重点要转移，历史遗留问题要处理，政治运动

不搞了，是不是过去都搞错了？（二）在理论上接受不了。林彪、“四人帮”多年来宣扬阶级斗争永远是纲、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唯一动力、阶级斗争就是一切等等，现在工作重点转移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生产为中心，还不是搞修正主义吗？（三）社会现象解释不了。有的同志把社会上少数人闹事、青少年犯罪等问题，看作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并把这些现象的出现归咎于工作重点转移，说是不抓阶级斗争的结果。这三个接受不了，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怀疑三中全会以来落实政策，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是否“偏了”、“右了”。这个问题比较好解决，通过组织大家联系实际，摆出一件件具体事例，具体分析改正错划右派等政策，在政治方向上是对的还是错的，应该不应该落实，事实一摆，认识就容易统一了。二是由于林彪、“四人帮”阶级斗争理论的流毒影响，使一些同志对阶级斗争存在着片面的错误的理解，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历史必然性，缺乏认识，这是学习中要着重从理论上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一状况，校部组织学员学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四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第一节。从学习基本原理入手，围绕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前进的最终动因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引导学员讨论三个问题：（一）阶级斗争是目的的还是手段？（二）阶级斗争为纲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怎样正确开展阶级斗争？（三）社会主要矛盾能不能转化？通过讨论，大家明确了四个问题：1、阶级斗争是手段，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服务的。2、阶级斗争既可能促进也可能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这就要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要对目前我国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作恰如其分的分析，既不能缩小，也不能扩大。3、社会主要矛盾是可以转化的。今天，“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目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党的工作重点必须相应地进行转移，把发展生产力、实现四化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4、现在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生产为中心，不等于没有阶级斗争了，而是要实事求是地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

弄懂了这些基本道理，原来的疑问就迎刃而解。许多同志说，长期来“四人帮”鼓吹阶级斗争永远是纲，阶级斗争就是一切的谬论毒害了我们，明明是党中央根据新的条件作出新的政策，我们反而认为是“丢纲丢线”；明明是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不等于不抓阶

级斗争，我们却把两者等同起来，面对社会上个别坏人煽动闹事的现象，束手束脚，不敢大胆去抓，造成工作上的被动。原来担心上面面向右转，现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上懂得了工作重点转移的必然性，从担心变为放心，回去以后更要鼓劲。

端正思想路线， 从根本上提高干部觉悟

通过对以上三个基本问题的学习讨论，使许多学员的模糊认识得到了澄清。以上这三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个基本观点。这几个基本观点的学习，贯穿了一条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因此这个党校的同志把它称为“几点带一线”。实践证明，抓住这几个基本观点，加强基本理论的学习，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就可以有效地澄清一些错误思想，提高干部对三中全会精神的认识。机电一局党校的同志，在这期学员入学时，曾担心这些同志都有二、三十年的工作经历，平均年龄将近五十岁，都有一定的分析能力，一旦形成一种观点，要改变很难。但结果证明，原来有不少存在着各种模糊认识的学员，经过三个月的学习，

大部分同志的思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和转变。许多学员在结业时深有体会地说：“不懂得什么是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就批不了林彪、‘四人帮’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两条思想路线的界限划不清，要想正确认清形势，深刻理解和自觉贯彻党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就是一句空话。”一位党委书记在结业座谈会上说：“过去林彪、‘四人帮’以假乱真，我们受其毒害，以假当真；现在党中央拨乱反正，我们反而以假怨真，怨这个偏，怨那个乱，归根结底是自己的思想给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搞乱了，要拨乱反正，搞好工作，首先要在我们思想上拨乱反正，让马列主义在我们头脑里扎下根来。”还有些学员谈体会时说：“过去片面理解三中全会文件精神，看问题越看越偏，现在全面理解文件精神，问题越看越清。”“来时思想乱，回去思想通了，做下边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有本钱了。”当然，端正思想路线是个长期的事情，还需要在今后实践中不断努力。

（第30期，8月29日）

黑龙江省委决定 对全省党员、干部进行轮训

编者按：黑龙江省委下决心用一年左右的时间，从上到下，从党校、干校到工厂、机关，采取办短训班的办法，把全体党员、干部轮训一遍。这个做法很好，值得各地参考。

重新教育干部是关系到四化建设成败的战略性问题。进行现代化建设，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我们过去熟悉的东西，有些已经不能用了，有些也快要闲起来了，不熟悉的东西在逼着我们去做。每个干部都有个重新学习、从头学起的问题。黑龙江省委决定，在当前的轮训中，主要抓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优良传统作风方面的教育，这是完全必要的。一定要使我们的思想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影响下和习惯势力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发扬优良传统作风。今后还要加强业务教育，学习有关四化的专业理论和实践知识，以期在几年之内造就一支思想路线端正，政治方向坚定，熟悉和精通本职业务，能够

带领群众实干的干部队伍和一大批专业人才，适应我国现代化的急需。

八月二十七日，黑龙江省委正式作出决定，从现在起，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对全省党员、干部普遍地进行一次轮训，用党的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便同心同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黑龙江省委在决定中规定，这次轮训要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进行当前形势的教育。在轮训党员、干部时，要着重引导大家回顾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由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使我国在政治、经济、思想各个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充分认识我国的大好形势，使他们对党中央更加高度信赖，对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坚信不疑，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十分珍惜，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充满信心，从而进一步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搞好四化建设而斗争。

二、进行思想路线的教育。去年在全国展开、现在仍在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驳倒以“高举”的名义出现的两个“凡是”的思潮，打开思想解放的大

门，促进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为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但是我省对这个讨论开展的还不够普遍、深入，在各个工作领域中，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一些同志思想僵化、半僵化问题还没有解决，两个“凡是”的思潮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还有市场。在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以后，对如何更好地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改变那些阻碍生产发展的管理体制、管理方式以及政策规定等，不敢迈步，前怕狼后怕虎，消极等待上边拿出说法，等着别人创出经验。对理论上和方针政策上的这样那样的不理解，都出于没有掌握检验真理的标准，出于思想路线不端正。因此，轮训党员干部一定要把端正思想路线作为一个根本性的课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认真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要联系在贯彻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过程中出现的思想问题、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学习、讨论；要把讨论同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通过讨论，澄清各种模糊认识，进一步明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勇于实践，勇于探索，独立思考，创造性地工作，不断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我国和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做出新

结论，不断推动四化建设的发展。

三、进行我国现阶段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的教育。通过轮训，使广大干部和党员明确认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我国现阶段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目前很低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到现代化水平，为此而改革我国目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妨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部分，扫除一切不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旧习惯势力。全省人民都要努力工作，不断为全党这个中心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要使广大干部和党员认清，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已经消灭和不存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目前的主要矛盾，今后再不需要也再不应该进行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也要明确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我们要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继续正确地进行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和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都不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客观实际，因此也违背全国人民的心愿。

四、进行党的中心任务的教育。教育党员、干部明确认识，安定团结地发展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国各

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全国的大局，是新时期最大的政治。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服从于这个中心，服务于这个中心。要通过对我国国民经济面临问题的分析，认清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必要性，教育干部和群众树立识大体、顾大局、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坚决按照中央的部署，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要教育干部和群众聚精会神地抓经济工作，力争我省今年农业“稳得住，上得去”，保证今年工业生产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

五、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教育。要组织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七个法律，特别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要逐条逐款地学，掌握它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要明白加强法制的重要性，明白什么是守法，什么是违法，什么是犯罪。教育干部和党员克服那种习惯于人治，不习惯于法治，习惯于按个人指示办事，不习惯于按民主程序和法律程序办事的习惯势力和陈旧观念，增强民主观念和法制观念。要教育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克服和反对特权思想，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觉地遵纪守法，作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的模范。要注意引导干部和群众正确行使自

己的民主权利，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专政、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关系，维护人民政府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同违法乱纪行为和种种无政府主义的现象作斗争。

六、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健全党的生活的教育。要组织党员重新学习党的章程，真正懂得党的性质、纲领、组织原则和纪律，懂得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自觉地遵守党规党法，在群众中起先锋作用、带头作用、模范作用。要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进行自我教育，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带头纠正不正之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并且坚决同败坏党风的倾向进行斗争。要通过这次党的基本知识和传统作风的教育，把党内生活的各项制度建立和健全起来，使党内生活进一步走上正轨，使党内教育经常化、制度化。要进一步严密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党内外群众的监督作用；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做到赏罚严明，好的典型要大力表扬，违法乱纪的要严肃处理；要健全党的各项制度，特别是纪律检查制度，堵塞滋生各种歪风邪气的漏洞。

决定强调指出：这次轮训党员、干部，是关于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传统作风的教育，是紧密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主要方法是大办各种类型的读书班、学习班和训练班。这次思想教育，要同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并把重点放在提高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加强党性锻炼，增强民主和法制观念，端正党风上面。各级党校、各类干部学校，都要按照各级党委分管干部的范围作出规划，开办学习班，把分期分批轮训党员、干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完成。各大工厂和大的机关单位，也要作出规划，采取脱产、离职办学习班的办法，对本部门不能进党校、干校学习的党员、干部进行分期分批的集中轮训。农村公社书记、委员，由县委负责训练。支部书记、委员和党员，由公社党委按照农业季节的忙闲，分别举办学习班进行轮训。学习班可根据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和实际可能，每期学习十天半个月，多者一个月。各级党委、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定要把这项工作抓紧，争取在今冬明春，把全省党员、干部大多数轮训一遍。至迟在明年内，把全省党员、干部轮训完。

轮训党员、干部，要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的方针。办训练班主要是学习文件。通过学习讨论，统一思

想，提高认识。在方法上采取自学、辅导、讨论相结合。在学习讨论中，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要联系思想、工作和作风实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找出克服缺点，继续前进的方向。不搞人人检讨，人人过关，也不写思想检查材料。提倡解放思想，畅所欲言，认真讨论问题，争辩问题。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决贯彻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主义”原则。

轮训党员干部，要充分运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要注意树立和表扬那些大公无私、遵纪守法、朴素廉洁、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党员、好干部，通过他们去带动全体党员、干部，把党的传统思想作风树立起来。对于那些营私舞弊，贪赃枉法，大搞不正之风的坏典型，也要选择有教育意义的，作公开处理，使全体党员、干部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黑龙江省委要求各级党委把这次轮训工作真正重视起来，加强领导。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要带头参加学习，领导学习。党委的宣传、组织、纪律检查部门和政法部门要负责作好日常的具体工作。要针对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作出切实可行的轮训党员、轮训干部的具体规划。要经常掌握情况，研究问题，

总结经验，不断把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引向深入，保证把这项工作有始有终地进行到底，并收到预期的效果。

（第 32 期，9 月 10 日）

高中级干部要亲自处理 群众来访问题

八月三十日，胡耀邦同志在中央国家机关讨论上访问题会议上提出，高中级干部要亲自处理群众上访问题。他说：我们中央机关部长、副部长以上的干部有一、二百人，司局长级干部有几千，处长级干部有上万人。来京上访的人员在接济站住宿的是二千八百人，露宿街头的约二千五百人，总共有五千三百人到六千人。我们中央机关一万多名高级、中级干部，那么多同志，有哪些同志亲自找过上访人员谈过话，亲自听取过上访人员的申诉，认真处理解决过上访人员的问题？不接近群众，不亲自解决问题，甚至当官作老爷，那就要将他们的军！我们的高级和中级干部，如果每人每月接谈一个上访人员，就是一万多人，超

过现在来京上访人员一倍。每人每年找十个群众谈话，摸摸群众的脉搏，解决一下群众的思想问题，那就是十几万人！我们的处长、局长、部长不亲自抓，中央领导同志还亲自处理、解决上访群众的问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这么干？中央要求党政军领导同志都亲自抓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做点工作，不接触群众，不了解情况怎么得了！这种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要推广文化部过去实行过的每周一天或半天接待群众的制度。当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处科长，不能只划圈圈，加上发牢骚，而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群众，不以平等态度待人。

（第33期，9月20日）

为什么一些农村青年轻生厌世？

编者按：这是湖北农村一个共产党员写给中国青年报的一封信，读了使人感到心情十分沉重。据反映，湖南耒阳今年五至七月就连续发生十二起集体自杀事件，死亡三十二人。别的地区也有类似情况。一些本来大有可为的青年轻生自杀，在我们社会方面，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来信分析了一些原因，

值得深思。三中全会作了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以来，党的政策逐步落实，全国农村形势一天天好起来。但是，党风不正、社会风气不好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这给一些青年的思想上带来了很多的消极影响。加之，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在某些社队，除了劳动、吃饭、睡觉，青年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和学习活动。有的青少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或者在生活、学习中遇到困难，得不到组织上的关心和支持，自己又没有斗争的勇气，因而走上了自绝之路。对这种严重的现象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各级宣传部门，特别是地、县委宣传部，要在党委的领导下，运用正反两面的典型，大力宣传整顿党风，克服官僚主义，关心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振起包括青年在内的广大群众的革命精神。发生青少年自杀的地区，要解剖一两起事例，对症下药，使干部和群众普遍受到教育。因严重官僚主义酿成人命者，应该严肃处理。更根本的是，我们要在农村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男女老少的思想、精力都引导到继续贯彻落实党的政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尽快地把农林牧副渔整个农业生产搞上去。希望象当年大张旗鼓地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那样，在今天的农村出现一个发动千军万马，宣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高潮，使农村广大青少年的思想水平和精神境界大大提高一步，信心百倍地面对未来。

我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汉川县，和青年接触的机会较多，经常同他们谈论理想、生活和情操等问题。我发现这里有相当一部分青年意志消沉、厌恶尘世，失去了青年人的朝气，堕落、绝望，犯罪、自杀事件不断发生。

在我回乡的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耳闻目睹附近几个公社自杀惨案达四十多起，死者达三百人。他们常以集体投河、服毒或上吊自杀，多者一次十多人，少者一次三、五人。七月十八日，二河公社一个生产队有四个女青年集体自杀；七月二十二日，在汉江流经我县分水公社处，一次打捞起了用绳子连在一起的八具女尸。这里的男青年有相当一部分感到前途渺茫，他们游手好闲，漂浮于世，三五成群，聚众闹事。这里盗窃成风，毆斗随时可见，连县委的办公大楼也被砸了，在大街上还出现了“我们要饭吃”的标语。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自杀和犯罪。然而，这里的组织和领导却无动于衷，不采取一点相应的措施，反而随着这类事件的与日俱增而司空见惯，甚至连惊讶和同情之感也消失了。

我们的报刊经常报道资本主义国家青年犯罪和自杀情况，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地方竟出现如此雷同的问

题呢？我们这儿位于江汉平原，紧连着武汉市，土地肥沃，地势平坦，素有“鱼米之乡”之称。地理上给我们提供了优越的生活条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们开辟了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然而，我们的青年为什么要自绝于社会，自绝于现实？为什么在粉碎“四人帮”已近三年了还发生这些骇人听闻的惨案？这些疑团，在我脑海久久回旋，百思不解。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一个好生生的青年要去自杀，是由各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但我觉得林彪、“四人帮”留给一些青年心中的阴影是深沉的。十几年的社会动乱是一股祸水，是造成很多青年一生中不幸和痛苦的种子。而当前领导不正之风，是这儿青年犯罪和自杀的催化剂，它是这儿青年人犯罪和自杀的原因之一。

据我所知，在那些死亡的姐妹中和犯罪的青年中，绝大部分是没有“官亲”的农村青年，其中相当一部分有一定才能。他们有的把唯一希望寄托在升大学上，因为不能被录取就认为自己的理想被湮灭，前途渺茫；有的青年对社会中某些不平等现象愤愤不平，他们希望改变现状。在我们这儿，干部子女不种地，有点权力的人，都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把自己的子女安置在城镇。绝大多数大队一级以上干部的

子女都不做农活。目前，有些领导干部以整顿改革为名，拼命排挤没有“靠山”的青年，来安排自己的子女。社办企业单位成了干部子女的寄生地。有不少干部子女吃的是生产队给的粮食，而对生产队无分文贡献，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没有“官亲”的青年不管你多有才干，不管你是高中生、复员军人，一律种田，每天虔诚地十几个小时劳动，还要受干部及其子女的气。所以，一些青年的死，是对现实的一种消极反抗，是对“权势者”的控诉！

婚姻恋爱上的不正之风，使青年在爱情上受挫折，也是一个原因。前几年，我们这里的女青年找男朋友，集中在国家职工上。有些国家职工找农村青年谈恋爱，只是为了取乐、开心，最后还是农村青年被抛弃。那种进了大学门，抛弃爱人一类事情也逐渐增多。社会风气不良，被侮辱的女青年也多起来，她们感到羞愧，感到失去了人的尊严，感到活着没有意思。

我认为，改变这儿不正常的社会现象，首先必须向官僚主义作风开刀，刹住走后门等一类不正之风，不断地对青年进行革命理想、前途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要使青年感到有出路，使一些青年变绝望为有望，化不利为有利因素，让青年为实现四化发挥

更大的作用。

目前，我们这儿自杀和犯罪仍在增加，就象瘟疫一样吞噬着一些青年的生命，闹得人心浮动，希望能引起重视。

（第 33 期，9 月 20 日）

继续解放思想 开动机器 使文学艺术更加活跃和繁荣起来

——中宣部召开关于《歌德与“缺德”》
一文的座谈会

《河北文艺》六月号发表《歌德与“缺德”》一文，引起文艺界的注意和批评。为了更好地开展文艺批评，促进文艺创作，中央宣传部在九月四日至七日邀集河北和北京一些文艺界同志进行了座谈。参加会议的有河北的齐斌、田间、梁斌、李盘文、李剑同志等十一人，还有全国文联等有关方面负责同志林默涵、陈荒煤、冯牧、李季。座谈会由廖井丹同志主持。与会同志本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解决问题，团结同志，繁荣文艺创作的精神，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胡耀邦同志于九月六日上午参加了会议，并作了讲话。大意如下：

《歌德与“缺德”》一文的出现和围绕这篇文章引起的争论，是粉碎“四人帮”将近三年来文坛上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我们召开这个会，目的是用同志式的、平心静气的方法来交谈、讨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这种方法，根本区别于林彪、“四人帮”那套打棍子的方法，也区别于“文化大革命”前有时曾经采取过的某些简单、粗暴的方法。这样做，是总结了一、二十年的历史经验的。如果再发生类似的问题（当然希望不再发生），我们就推广这种方法，使文艺上的争论纳入到一种非常健康的轨道上面来。这是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思想问题的唯一正确的办法。人民内部矛盾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几十年、几百年，到了共产主义也会有。人民内部在思想理论上的争论，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争论总是有的。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躲开这种争论，绕开矛盾走是不对的。我们必须采取平等的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

李剑同志的《歌德与“缺德”》一文是确有缺点、毛病的，是不恰当的。它在全国文艺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是有原因的。文艺界的同志们对这篇文章有意见、不满意，是有道理的。这件事也引起了我们中宣

部同志的注意。这篇文章的毛病、错误在哪里呢？就是同毛主席讲的文艺路线，同毛主席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违背。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反复声明要在一切战线包括文艺战线上拨乱反正，把林彪、“四人帮”歪曲了的东西端正过来，把搞乱了的加以澄清，要保护、爱护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文章的毛病、错误就是同中央当前这个方针不合拍、不协调。李剑同志的调子不合时宜。

李剑同志是个青年，写这篇东西，我们不过多地追究。青年人犯点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允许犯错误，你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们采取教育的方法，诱导的方法，帮助的方法。只要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这样的敌人是极少数），对一切犯错误的人都应该采取这种方法，对青年人尤其要采取这种帮助的方法，诚诚恳恳地帮助他。这是我党历来的传统。这个好传统多年来被破坏了，有些老同志记得不那么牢靠了，有点淡漠了，而许多中年人、特别是青年人还不大熟悉或者还不大懂得这个传统。对李剑同志的文章进行反批评，是对的，好的。但是有些话火气大了一些，比如上海王若望同志是文坛上比较老一点的同志，他出来批评是对的，但是他的文章也有些缺点。

两相比较，不能各打五十大板。如果说要打板子，首先要打李剑同志的板子。王若望同志作为文坛上的老同志，循循善诱不够，有这么个缺点。这样提出问题是应该的。总之，是非应该分得比较清楚一点，不能各打五十大板，不是“棋逢对手一般平”。在循循善诱方面，在充分说理方面，我们对老同志要提出这个要求。

李剑同志这篇有错误有缺点的文章，为什么在今年春天出现？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今年春天，恰恰是三中全会开过不久，我们的拨乱反正，三中全会跨的步子比较大，跨了一大步，澄清了历史上的许多重大的是非问题。正如斯大林说过的，在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一些人容易转向，容易从车上摔下来。我们三中全会步子跨得比较大，拨乱反正那个拨的幅度、转的弯子比较大，有的同志思想跟不上。有的同志思想还停留在三中全会以前，甚至停留在三年以前，这样就发生了问题。为什么三中全会敲警钟，要我们解放思想，思想不要僵化？思想僵化了，对新东西就接受不了。凭老经验办事，新东西就装不进去。现在新东西层出不穷，许多老框框、旧东西要我们不断地去破。列宁说，气候变化了，衣服也要跟着换一换。毛主席也常讲这个道理。有些

地方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气候不适应。这个问题，必须从思想上、理论上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

全国有那么一些战线，一些地区，一些方面的思想工作抓得不够紧，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抓得不够紧。我看河北的工作总的做得不错，省委领导是执行中央路线的，这是要肯定的。但是有几件事情出在河北。正定曾经作为河北农业生产的好典型，可是前不久那里出现了挖西瓜的事情。对正定的工作也要一分为二，它的农业生产可以说是搞得比较好的。它可能曾经搞过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调子比较高。这次挖西瓜事件，看来还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继续，思想上是从这里来的。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决定中讲了这个问题，提出不要把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了。正定有的同志就是不注意这个问题，风向变了，形势变了，思想还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停留在原来的时间、地点。保定有个厂，十几个人重新起来斗工作组，搞得全厂几个月不能正常生产，很严重。这类事情，全国各地或多或少都有。河北可能发生得多一些？河北的工作总的是做得好的，省委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工作还是有成绩的。但拨乱反正有些问题抓得可能不紧，端正思想路线，批判极左的东西，调整领导班子，这些抓得不够紧。这值得同志们注意。

李剑同志的文章不是偶然的，是一定环境、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个人的责任不要过多追究，要分析犯错误的环境。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讲到一个郑重的党对自己的错误应取的态度，讲了四句话，其中一句就是讲要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在一定环境下产生的错误，有当时当地的种种条件和原因，光追究个人责任也不公平嘛！当然，不是一点也不追究个人责任，而是不要过多追究个人责任。十年来犯错误的老干部、中年干部、青年干部有多少呀！几十年的老干部犯错误、给“四人帮”抬轿子的也不少。在党内斗争上、干部政策上、文艺战线上，犯错误的面都不小。有些东西是过去没有听到过的，打人，搞逼供信。这些东西追究起来没有完。所以中央反复讲，“文化大革命”以来有些历史问题，一定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具体分析。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离开了历史条件、历史环境去解决历史问题，要犯错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过多追究个人责任，包括不过多追究李剑同志、河北省文联有关同志的责任。但是你们自己要注意这个问题。

接受了教训以后就不要过多纠缠，要团结起来向前看，搞好河北省的文艺工作，打开河北文艺工作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中心点，是要把河北的文学艺术活跃起来，繁荣起来。三年来我们的文艺开始活跃，有的地方相当活跃，但有的地方还不活跃或很不活跃，还不繁荣或很不繁荣。总的来说，已经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但还不够活跃、不够繁荣。我们现在文学艺术工作的中心，是要使繁荣的景象不只是“在望”，而是“在手”、“在握”。这是文艺的奋斗目标。要大力促进文艺繁荣，满足人民的需要，满足四化的需要。你们回去不要再去争论，算这个帐。这个帐已经算清了。李剑同志回去以后，如果你检讨几句，我们欢迎。但是主要不是这个，你们河北的同志主要应该把中心任务放在今后工作上，千方百计地使河北的文艺活跃起来，繁荣起来。对已经出现的事情可以谈一谈，但是不要过多谈，甚至可以基本上不谈了。中心问题是考虑促进文艺繁荣，要拿出切实的办法来，不能停留在一般号召上。要商量几条具体措施，研究繁荣、活跃文艺要抓住哪几个要害。首要的一条是一定要鼓励和组织大家创作，要调兵遣将，调动千军万马。我们文化战线有的同志往往缺乏组织能力，习惯于手工业的方法，这不行。要搞现代化的方法，要组织和鼓励大家放开手脚搞创作，不要老是在那里定调子，划框子，更不要打棍子。

我们党五十八年的历史，有许多重要事情出在河北。李大钊出在你们河北，不可以写李大钊的电影、戏剧吗？二七大罢工，长辛店斗争激烈。梁斌同志写过保定二师的学潮，还有高蠡暴动、冀中暴动等等。旧民主主义革命和封建时代，这里都出过许多英雄豪杰。七世纪，有个窦建德，他是农民领袖，几百年后，直到明朝还有人写文章纪念他，毛主席曾经表扬过他，曲阳县还保留下纪念他的窦王庙。你们河北有造赵州桥的李春，有科学家祖冲之，有高阳名医扁鹊，比华佗还早。刘六、刘七两位农民暴动领袖，率领队伍一直打到江苏。最早你们这里还出过赵武灵王、荆轲这样著名的历史人物。几千年的文化，七十九年旧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多少文艺题材有待我们发掘。河北文学艺术的形式也是丰富多彩的，河北梆子、皮影、丝弦、北昆等等，都要求我们去整理、提高。我们创作的路子宽广得很，要把精力放在这上面。要大力组织创作，鼓励创作，创作富有河北地方特点的文学艺术作品。一句话，要万紫千红，美不胜收。除抓创作外，还有什么措施，电影怎么搞，农村文化工作怎么搞，请你们再具体化一下。

我们打倒“四人帮”三年了，有些干部，还是那么

畏畏缩缩，气不壮。借用骆宾王一句诗来说：“昔时人已歿，今日水犹寒。”当然他的原意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把这种精神状态改变过来。

胡耀邦同志的谈话引起了与会同志们的强烈共鸣。同志们认为，这样解决思想方面的问题，是开了一个好头。这和“四人帮”时期根本不一样，和十七年中有时的一些简单的做法也不一样。李剑等同志在发言中，表示要抓紧学习三中全会文件，解决思想问题，从这次错误中深刻接受教训。河北省的其他同志也表示，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准备用《河北文艺》的名义，就《歌德与“缺德”》一文引起的争论，写一篇经验教训的文章。河北文联的领导，还准备在较短的时间内发扬民主，组织河北文艺界搞出一个文艺创作的全面规划或设想来，解放思想，鼓足干劲，把河北的文艺搞上去。河北省委宣传部和省文联的同志表示要采取措施，改进领导方法、领导作风，把河北文艺界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第34期，9月21日）

加强思想工作 使干部争着上党校

编者按：一些党员干部不愿意进党校学习，可能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我们应该注意解决这个问题。各级党校是我们党培养提高干部的重要阵地。特别是今天我们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所有同志都无一例外地需要重新学习。有计划地轮训干部，已成为党的一项突出的迫切的任务，党校的作用日益重要。各级宣传部门要帮助干部端正对党校的看法，在党内外形成一种进党校学习光荣的强大舆论，使大家争着上党校，进了党校一定发愤学出成绩。当然，党校也要从中得到教训，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

河北邯郸地委宣传部全新法、党校刘金柱两同志来信，反映一些党员干部不愿意到党校学习，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各级党组织重视。

来信说，邯郸地委党校每期读书班、培训班，实到人数一般仅占应到人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且有一半左右不符合条件。通知要求公社书记或县直属局

长参加，来的是委员或一般干部。各县委党校情况就更严重。大部分县委党校每期实到人数仅有百分之六十左右，更不能按要求的条件和时间报到。如魏县县委党校今年举办一期培训班，通知人数二百八十人，学习时间十五天。按要求时间报到了四十名，县委让宣传部催，又到了四十名，开学十天后共到了一百人，还差一百八十名未到。今年春天我们到省委党校学习，同省委党校和其他地区的同志说起这个问题，省委党校和其他地、市委党校也是这种情况。

来信指出：让干部专门集中一段时间，集中精力读点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或者阅读党的一些重要文件，有利于解放思想，提高理论水平。我们这次在省委党校学习，虽然时间仅仅两个月，但大家普遍感觉收获很大。一些长期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理论，初步澄清了；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理解得更深了；原来思想僵化的同志解放了；新老干部一块学习、讨论、生活，作风大转变，精神状态好了；搞四化的决心和信心更大了。同志们说，在机关工作忙，学习理论的机会少，理论水平低，心胸狭窄，眼光短浅，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来党校学习一段时间眼界打开了，思想解放了，确实很有好处，很有必要。

来信分析了有些同志不愿意到党校学习的原因。

一、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党校的声誉低。“文化大革命”前，一个同志能到党校学习，感到很光荣，很愿意去。各级党委都把选送党员到党校学习，当成培养和考察干部的好方法。林彪、“四人帮”一方面砍党校，另一方面又把党校作为“劳改场所”，改造“犯错误”干部，因而降低了党校的声誉。二、一些同志对理论学习信心不足。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乱了理论，颠倒了是非。当时流行这样一种说法：不学不上当，学了就上当，不学不糊涂，越学越糊涂，学了以后还得肃流毒。这种影响至今尚存。三、有些党委领导同志，特别是一些主要领导同志，强调工作忙，不重视理论学习，自己不带头，也不愿意把有能力的干部送党校学习。每年到党校学习的总是那么几个人。四、有些同志精神不振，作风不正，在机关当官做老爷惯了，舒服惯了，到党校学习感觉条件差，不自在，不习惯。甚至有个别同志由于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缺点和错误，在位时压群众、捂盖子，怕离职学习后让人家捅了老窝。五、还有些同志家里有些具体问题，到党校学习后，造成家庭生活上一一些困难。

来信强调说：只要各级党委重视起来，抓住原

因，对症下药，采取措施，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第34期，9月21日）

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带头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河南省委九月一日发出通知，指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全省的发展还很不平衡，很不广泛，很不深入。不少地区和单位，包括一些领导机关，由于没有认识这一讨论的重大意义，或者怕这怕那，顾虑重重，没有认真讨论，甚至根本没有讨论。这一状况，同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的要求，很不适应。为了在全省范围内继续深入开展这一讨论，省委要求：

一、要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高到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来认识。三中全会指出，这场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思想路线是制定和执行政治路线的基础，决定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思想路线不端正，就不能

自觉地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我们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要进一步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解决真假高举的问题，改变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 and 行动真正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上来，聚精会神搞四化，团结一致奔四化，夺取全党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后实现四化的第一个战役的伟大胜利。

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应当首先在省、地、县三级领导机关开展起来。这是因为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思想路线不端正，就要影响一大片，就会妨碍甚至压制下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不可能正确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因此，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党委的第一把手，都必须带头积极参加并亲自领导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带头解放思想，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有的干部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毒害较深，中毒不知毒，对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有的干部心有余悸，错误地总结经验教训，对执行党的三中全会的精神左顾右盼，摇摇摆摆；有的干部不学习，不动脑筋，习惯于按老框框办事，思想落后于形势，不能够很好地研究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后的新情况新问题。

凡此种种，都要通过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认真加以解决。只有领导机关先讨论起来并取得经验，才能更好地指导基层和广大群众的讨论，收到预期效果。

三、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要密切联系工作实际，联系干部思想。各个地区、各条战线和各个单位，联系什么实际，解决什么问题，要通过调查研究拟定，既要注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又要注意解决现实问题；既要注意解决普遍性的重大问题，又要注意解决本地区、本战线、本单位急需解决的特殊性的问题；既要注意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又要注意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比如：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对党的现行政策的看法，对我国现阶段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看法，对民主和法制的看法，对国民经济调整的看法，对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看法，对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看法，等等。要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把各项工作不断推向前进。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确实感到这个讨论和自己息息相关，同本单位的工作和生产实际血肉相联。一定要反对那种说一通空话，走一走过场就了事而不解决实际问题的做法。

四、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下决心读一点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著作。为什么有的同志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不理

解，忧心忡忡，甚至有抵触，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知道的太少。所以，要通过这个讨论，搞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形而上学，搞清革命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搞清为什么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能用只言片语搞实用主义。要把这个讨论当作一次普遍的生动的实际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教育。

五、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端正思想路线，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是全党的重要任务。各级党委必须把这一讨论列入议程，进行部署，加强领导。在讨论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坚决实行“三不主义”，提倡敞开思想，敢于提出问题和探讨问题。要允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对于一时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不忙于作结论，可以继续讨论研究，在实践中逐步统一认识。在报刊宣传上，要注意理论探讨和理论宣传的区别，还要注意内外有别。各级党委都要注意抓好重点，及时总结交流经验，要实行分类指导，使这一讨论健康地、卓有成效地、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

最近，在内部刊物上以及公开报刊上，把某些领导同志的意见称作“指示”的现象又逐渐多了起来。至于在口头上就讲得更多了。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党的宣传工作者要带头执行这些规定，并带动党内外群众都这样做。不要分什么等级，似乎省以上的领导同志讲的就可称“指示”。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在内，个人的讲话就称是“讲话”；个人的意见就称是“意见”，一概不要称作“指示”。

（第35期，9月25日）

张香山同志谈关于做好 接待、旅游工作中的宣传问题

九月十日，张香山同志在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讲话，就做好接待旅游中的宣传工作，谈了几点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关于旅游方面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性问题。我们的对外宣传有不少部门，有不同的渠道，有不同的途径。旅游的对外宣传的特点，就是宣传对象是送上门来让你宣传的。来的人越来越多，十万，十几万，将来是几十万，争取一九八五年接待五百万。这是相当大的数量。这么多数量的外国人到中国来，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他们是为了游览，是看看中国的名胜古迹，特别是那些老太太、老头儿们。外国有些老年人，一辈子辛辛苦苦，赚了一笔钱，要在临死之前到国外跑一跑、看一看。他们要游览中国的万里长城、名胜古迹。对这一点，我们不能忽视。除

了这一点，他们到中国来是不是还有其它目的呢？旅游局美大处作了个统计：从美国来的，有百分之二十的旅游团，是学习团，其中青年比较多；还有百分之二十五，是属于专业考察性质，来考察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等等。两者加起来，就在百分之四十五以上。他们除了游览参观以外，要求了解新中国的形势、政策，或者要了解某一项专业的情况。旅游局接待的日本外宾，从前几年看，有很多是因为从其它途径安排不了的，而安排到旅游来了。日本的外宾，不少是友协安排来的，有工会方面安排的，还有些政治家，是由各党派安排的。他们通过旅游的途径，到中国参观访问。有的年轻时在我国东北呆过，三十多年了，想到年轻时或者是儿童时代住过的地方看看。他们不仅仅是要求一般性的参观游览，还要求了解一些政治情况，进一步了解中国。比如日中友协，它为了什么目的组织这么些人呢？是想来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进一步发展会员，发展中日友好。除了要取得佣金以外，主要为了发展会员。工会派来的，名义上是来旅游，其实主要来看看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怎么样的，因为工会天天宣传搞社会主义，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他要来中国看一看。有一些工会曾经派了一些团去苏联，然后来到中国消消毒，看看中国的社会主

义什么样子，和苏联有什么区别，什么是真社会主义，什么是假社会主义、修正主义。还有些政党人士或者某个知县，他也组织大批人到中国来，他除了搞友好之外，也有政治目的，就是为了争取选票，为了表示自己是同中国友好的。像这样一些团，到中国来有政治目的。此外，有一些资本家隐名埋姓到中国来考察，或者了解某一项专业的情况，或者看看中国安定不安定，形势如何，投资以后是否有保障，将来会不会取缔。还有些华侨，年纪大了，几十年没回过故乡来看一看，把他生在国内的孩子带回来看看，他也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所有这些旅游的外宾、华侨，除了要观光，看风景，看名胜以外，的确还有各自不同的目的，有不同的要求。这都是我们最好的宣传对象。我们的旅游工作，既有经济任务，也有政治任务。所以，先念同志说过，旅游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是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是争取外汇的途径；是政治任务，也是经济任务，所以很重要。耿飊同志管外事，他在一次会上讲，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我们应当做好接待工作，包括政治上的宣传工作和生活上的服务接待工作，也就是说，我们要把经济的和政治的这两项任务，很好地结合起来。要重视经济利益，不能象过去那样，不重视这个方面，甚至把

为国家挣外汇看成是资本主义，那是完全错误的。同时，也要重视做好宣传工作，如果我们这方面工作搞得不好，能够促进有更多的人到中国来。比如有一些作家、记者，他们到中国来是为了写报导、写书，我们宣传得好，他回国以后写书、写文章在国外发表，影响是很大的。我认识一个台湾同胞，长期在日本，是个有名作家，他几乎每年来一次中国，一年到敦煌，一年去新疆，沿着丝绸之路去南疆，有一年去江西景德镇，最近又要来。他访问回去就写书，销路很好。他写了几本书，有的还得了日本一种文学奖。可见，我们接待得好，宣传得好，他回去会替我们宣传，这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到中国来参观。我们应该更好地把政治上的接待、宣传同经济方面的任务结合起来。

旅游方面的对外宣传，过去多数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门没有抓。耀邦同志在一个批语中指出，这样的现象应该改变。今后，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宣传部门，要把旅游方面的对外宣传工作，列入重要的议程之内，应该同当地外办、旅游局，一同搞好旅游方面的对外宣传。特别要搞好对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教育群众应当对外宾有礼貌不要索要东西等等。各地的宣传部门，应当关心、检

1979年12月

1

1

查对外宣传品。有些不适宜的口号，也应当去掉。今年一月一日，我们同美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之后，关于台湾问题，我们已经不再叫解放台湾了，而是讲台湾回归祖国，但有的地方还张贴有解放台湾的口号。对这样一些与当前政策不符的东西，各地的宣传部门都要及时检查，予以改正。要同外办的同志一起注意这些问题。

第二，关于旅游方面的对外宣传任务。过去，有一种提法，说对外宣传的总的任务，是要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促进世界革命运动。这样的提法太高了，不切实际。这只能是对外国革命者的宣传任务。怎样提更合适一些呢？扼要地说，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要使来中国的外国人（包括左、中、右），通过旅游和参观，了解中国，了解我们国家有悠久的灿烂的文化，了解我国人民正在为建设一个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反对霸权主义，争取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斗争。通过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加强和增进同我们的友好合作关系。因为来的外宾，有左，有中，有右。过去有过争论，我们的宣传是以中间人士为主呢，还是以左派为主呢？也有变化。“文化大革命”以前，有时讲要以中间对象为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则是以左派为主。到底怎么个提法更

好？中宣部在讨论对外宣传的时候，认为是不是还是一般地提“外国人”为宜，不要再去具体地分左、中、右了。因为这样一分，容易有框框。其实，在旅游接待中，分起来也困难。一下子来了很多人，很难一时区别开来。当前，主要是宣传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宣传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宣传国内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这是世界比较关心的问题，他们都很想了解我们的内部是不是团结，政府体制是不是很稳定。这既是政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因为他要投资，经济上准备合作，所以很关心。要宣传关于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重大的方针、政策，包括八字方针。要宣传干部和群众同心同德搞四化的精神面貌和我们的社会风气。宣传我们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问题。宣传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敢讲保卫和平。讲反对霸权主义，讲反对帝国主义发动战争，但不敢讲保卫和平。苏联利用这个问题挑拨离间，说我们好战，是好战分子。引起了一些外国人对我们的误解，好像中国人就是讲战争，就是好战。我们应该讲我们是保卫和平的。反对霸权主义，就是为了保卫和平，是为了争取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对于我们的建设是必要的嘛！通过旅游，还要宣传我国的风光名胜、传统文化，以及我国保护文物

的政策。

第三，关于在宣传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问题。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宣传。表现在我们讲成绩的时候，要注意分寸，不要夸大，更不要做假。对于事物，应该一分为二，既讲好的，也要适当地（不是大量地）讲一讲我们的困难和尚待解决的问题，以及存在着的缺点。在讲成绩和缺点的分量时，应当以讲成绩为主，不能反过来主要讲缺点。讲缺点时，也不要象过去那样，非常笼统。前边讲了很多成绩，都非常具体，有数目字，而后面说一句“我们还存在困难和缺点”，好像是客套话，人家听起来觉得不诚恳，容易引起反感。所以讲缺点，也要具体一点，说明我们实际存在的困难和缺点是什么，使人家听起来不是客气话，而是认真的介绍。我们可以结合旅游客人参观访问的工厂、公社、学校等各单位的具体情况，进行讲解。过去，毛主席经常讲，要给客人参观好的、中等的、差的三种类型，不要光让人家看好的，要看一点中等的和差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鼓动来访的墨西哥总统不要只看好的，要看一点坏的。后来墨西哥总统到上海以后，在马路上临时要下汽车，要求在街上去参观某个地方，弄得我们陪同的人相当紧张。毛主席一贯主张，要让客人看好

的，看中等的，也看差的，这样，才能实事求是地反映我们的情况。有好、有坏、有差，才能有所比较；有了比较，认识一个问题才有可能更全面一些、更完整一些，也才能更深刻一些。在实践中，我们没有坚持这样做，总是想让客人多看些好的，少看或者是不看比较差的。

过去说苏联是“铁幕”国家，说我们是“竹幕”国家，现在外国报刊杂志说我们已经成为开放性的国家了。过去，我们只给人家看好的，坏的不让人家看。过去，一年充其量来一、二万人，现在，一年就来十几万外国人，将来要到几百万人，这就是很大的开放嘛。那么多外国人来了，你想隐瞒你的缺点和落后的地方，那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回国探亲的华侨或华裔，他们和亲戚朋友一聊，什么都知道，还不如让他们看些好的，也看些差的。周总理生前经常强调，对外宣传工作要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一九七〇年，总理就讲过，各单位向外宾宣传，不要总谈成绩，不讲缺点，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反对自吹。一九七一年五月，总理在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又说，我们的对外宣传不要浮夸，不要把我们的什么东西都说成是世界先进水平的，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世界先进水平。总理举了个例子，有一次外宾参观新安江水电站，

讲解员就说，我们这个水库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总理就讲，当讲解员这样讲时，陪同人员应该马上加以纠正，要当着客人的面承认我们讲错了，这不会降低我们的威信。这是对外宣传贯彻实事求是的问题。最近格林先生又来中国拍电视片，他对中国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对我们的对外宣传工作讲过一些话，邓小平同志看了他的讲话记录后，就批发给所有的对外宣传单位，要大家好好看一下，加以研究。格林先生说，他自己写宣传中国的文章，有时也要写中国存在的问题，而不是讲中国百分之百的好，这样就会使西方读者认为他写的东西是客观的。这是他多年来总结出来的一点经验。我们认为，他的看法是对的，我们也要注意这个问题。附带再讲一个问题，我们向国外介绍我国的旅游事业，招揽外国游客来中国参观，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带有广告性质的。这种宣传也要注意实事求是，没有准备好的地方，暂时先不要宣传，特别是防止宣传过了头。不要宣传时讲得如何好，旅游者来了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引起他们的不满。

第四，宣传艺术上要做到寓政治于导游。旅游宣传要结合旅游的特点，不能搞政治灌输，要让外国旅游者看到我们国家的大好河山和名胜古迹，了解我们的悠久文化。过去讲我们有四千多年的历史，郭老到

西安考查后说有六千多年。要通过参观一些工厂、公社和学校，让外国人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兴旺景象。要通过参观革命博物馆和革命纪念地，让外国人了解我们的革命历史。过去讲革命圣地，这个“圣”字是宗教上的词，就是朝圣的意思，叫革命纪念地就更恰当。总之，我们的介绍，要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对象，要虚实结合，注意用事实讲话，不要上政治课，作大报告。参观点要有所选择，让人家看好的、中等的，也要看点差的。宣传方式上要生动活泼、丰富多彩，不要陈词滥调，用抽象空洞的话。旅游外宾除在北京参观外，还要到地方去参观。地方的宣传要立足于地方内容，要与地方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晚上要安排些地方文艺节目，让外国人了解我们的文艺是怎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与林彪、“四人帮”在时大不一样。听说现在一般都不给安排文艺节目，可能是节目少或票价高等问题。外国人在晚上除了去酒吧间聊天、喝酒外，还可以让他们看看文艺节目。如果外宾要求专业对口座谈，也应适当予以满足。

第五，与外宾直接接触的陪同、翻译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好对外宾的宣传。外国人来中国，首先认识的就是我们的陪同和翻译。我们的陪同、翻译工作做得好，给他们的印象是最深刻的，这是最能取得

效果的宣传。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不卑不亢、热情、有礼貌，表现出有高尚的道德。这十几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社会秩序和风气搞坏了，我们要想办法纠正过来。现在，有许多陪同和翻译同志工作很认真负责，为外宾解决不少困难，外宾很受感动。有的人回国后发表文章，对我们的陪同、翻译说了很多赞扬的话。当然也有对个别人或服务人员提出批评的。这次会议提出要培训旅游干部和翻译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各省、市、自治区的宣传部门要协助做好这项工作。

(第37期, 10月19日)

不要用“凡是派”的提法

最近，有些单位在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时，有的同志说这个那个是“凡是派”。这种提法不好，不要再用了。

原来赞成两个“凡是”提法的同志，绝大多数是认识问题。不少人是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朴素的阶级感情”。他们在一个短时期内

对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理解。有些人是不同程度地受到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影响，分不清真假“高举”的界限，分不清马克思主义科学与迷信的界限，不懂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极少数人则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跟着犯过错误，至今划不清界线，立场没有转变过来。

对于绝大多数有两个“凡是”思想的同志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习，通过实践的教育，很多人思想认识已经提高。即使有些人一时还想不通，只要我们坚持热情帮助，耐心等待，他们终究是会觉悟过来的。不要把这些同志称作是“凡是派”。“凡是派”的提法，会使人产生误解，似乎我们党内现在又产生什么派别和派别斗争了。这样，只会在国内外造成不利于我国安定团结搞四化的影响。

（第37期，10月19日）

关于“知识青年”的说法

河北束鹿县王振升写信给《红旗》杂志，提出“知

识青年”的叫法不妥，宜改为“城市上山下乡学生”。

他说：“知识青年”这个概念不明确。它实际上指的是城市里吃商品粮的毕业生中那一部分需要上山下乡的人。他们的身份是“学生”。如果称“知识青年”，那么各行各业这类人很多。而同一届毕业的学生又有当兵、招工、升学几种去向，只有上山下乡的称“知识青年”也不恰当。刚出校门的学生，不但没有实践知识，而且书本知识也很有限，称为“知识”青年，也不太符合实际。建议改称“城市上山下乡学生”。

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考虑一时完全改变不容易，目前可以两种称呼都用，将来逐步改变过来。

（第38期，10月24日）

把青少年的道德风尚教育 持久深入地开展下去

编者按：今年上半年提出加强青少年教育，整顿社会秩序以来，各地做了不少的工作，情况有明显的好转。但是，目前有的城市青少年犯罪率又有回升，影响社会秩序，群众深以为忧。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成果还不巩固，必须把青少年道德教育工作

持久深入地开展下去。希望各省、市、自治区特别是大中城市的党委宣传部，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以一抓到底的精神，下大决心，做扎扎实实的工作，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积极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务使大中城市青少年的风气在三年内有个大好转，不断发展安定团结搞四化的局面。

据团中央宣传部汇报：今年五月，团中央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曾召开常委会讨论确定，加强对青少年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和有关部门合作，在转变社会风气上打一个硬仗，一定要在二、三年内抓出一个成果来。九月中旬，又和公安部、教育部组成青少年教育“联合办公小组”，负责掌握情况，交流经验。

在这几个月中，重点抓了十二城市道德风尚教育活动。十二城市人口近三千万人（不包括郊区农业人口），青少年有一千二百万。抓好十二城市对全国影响很大。我们和公安部、教育部于六月召开了十二城市道德教育座谈会，要求把道德教育和维护社会秩序、提倡社会公德、改善服务态度、安排待业青年就业、教育挽救违法犯罪青少年及解决青少年的活动场所等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八月下旬，又和教育部门召开了第二次十二城市道德教育座谈会，专门研究了少年儿童道德教育问题，对如何贯彻中、小学生守则作了部

署。十二城市采用了各种形式，广泛开展了道德教育活动，搞得好的武汉、重庆、南京、哈尔滨、太原等城市，社会风气开始好转，青少年犯罪数量有下降的趋势。

武汉市委从今春以来，就动员和组织各方面力量，加强青少年教育工作。他们对青少年中的问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行之以导，持之以恒”。在半年时间内，为青少年道德风尚教育办了十件好事。全市组织了四千二百个“帮教小组”，动员了一万六千多名街道干部、民警、教师、青少年家长，对一万零二百名有违法行为的青少年进行了帮教。经过教育，其中百分之七十五点二的人，已经有了转变，停止了违法行为，有一批人还进入先进青年的行列。他们还恢复和建立青少年活动场所三百二十四处，与文化室合办青少年活动室五百二十四处，总面积比“文化大革命”前扩大一倍多。他们在短短几个月内，安排了百分之七十七点四的待业青年就业。由于武汉市对青少年教育抓得好，今年六至八月青少年犯罪率比三至五月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二；五到八月间，全市青年超工时、超定额，利用业余时间搞突击，为国家多创造财富价值达二千一百四十三万余元，增加利润三百四十九万元，节约利废五百万元。武汉市的经验证明，抓

和不抓大不一样。湖北省委于九月底，在武汉市召开全省青少年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现场会，各地、市的宣传、教育、公安、工会、团委和妇联的负责人，以及南方十二省和二十五个大中城市的团委负责人参加会议，学习、推广武汉市的经验。

今年暑假期间，为了在青少年中大兴勤奋学习之风，我们向全国青少年推荐了八十本政治理论、科学技术、革命领袖和名人传记、文艺小说等方面的书籍，不少城市组织青少年开展读书活动，并对学习成绩优异的青少年给予奖励。团中央和大部分省、市团委，都和有关部门合作，举办了青少年航空、航海、地质、生物、体育和少先队辅导员等夏令营。还举办了唱歌比赛、“恋爱与婚姻”、“道德风尚”等相声、曲艺晚会，并通过电视、广播向全国播出。为配合第四届全运会举行，还和有关部门搞了“新长征火炬接力赛”活动，全国有二千五百万名青少年和群众参加了这一活动。

十二城市的道德教育活动虽然还处在开始阶段，但三个月来，大多数城市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一些成果。

第一，向广大青少年进行了遵守社会公德的教育，部分城市社会秩序比以前有了好转。在道德教育

活动中，部分城市采取上下结合的方法，发动青少年订立了维护社会公德和道德行为准则的公约，如搞“十提倡十反对”、“八做到八不准”、“六要六不要”等。通过集中的“道德教育活动月、周”的教育活动，使青少年在道德风尚方面，知道要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思想上提高认识，行动上有所遵循。重庆市青少年八个月做好事一万四千多件。

第二，注意抓了违法犯罪青少年的转化工作，各地都有一批“浪子回头”。据部分城市调查，犯罪青少年只占青少年总数的千分之二、三，有劣迹行为的青少年，占青年总数的百分之三、四。这些青少年数量虽然很少，但扰乱社会秩序，危害社会治安，败坏社会风气的能量很大。所以很多城市把做好这部分青少年的教育、挽救工作，当作道德教育的“重点”和“突破口”。据了解，十二城市七月份青少年犯罪率普遍下降，八月份部分城市略有上升，九月份上升较多。但总的来看，十二城市青少年犯罪率，第三季度比第二季度有所下降。十二城市第三季度发案率比第二季度下降百分之九点一；第三季度青少年犯罪人数比第二季度下降百分之十点二。天津第二钢丝绳厂团委副书记边锋刚，面对刮刀火枪，耐心做一个打架斗殴二百余次、抢军帽一百七十多顶、持刀抢劫十几次的违

法犯罪青年方文星的工作，使他转变过来，成为增产节约的积极分子，仅收旧利废，他一人就为国家创造财富一万多元。现在他提出申请，要求入团。起到了“转变一个，挽救一伙，教育一片”的作用。目前，各地都出现了一些“从前爱打架，现在干四化”，“从前是扒手，现在是突击手”，“从前是捣乱分子，现在是治安积极分子”，“从前是双差生，现在是三好学生”的典型。

第三，加强了街道青年工作，协助党安排待业青年学习、就业。重庆市的每个街道都由团干部、民警、教师和退休老干部、老工人组成青少年教育小组，使一些在社会上游荡、沾染恶习的青少年有人管教。在待业青年安置工作中，团组织积极开办各种类型的文化补习班、技术学习班和职业学校，为他们升学、就业创造条件。还想方设法广开门路，发展集体事业，尽可能安排更多的待业青年就业。福建、浙江、江西、辽宁、黑龙江等省一些城市街道团委，在党委支持下，还直接参与办了一些工厂、服务点、活动阵地（如青少年之家）。他们这样做了以后，感到团组织“讲话有了号召力，活动有了吸引力，要求有了约束力”。到九月底止，全国待业青年已安排约四百多万人，占待业青年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多。据武汉市江岸

区在已安排的一万二千多名待业青年中调查，未安排前有二百一十五人有违法犯罪行为，安排后，只有十七人。

第四，积极恢复青少年活动阵地，活跃青少年业余文化生活。“文化大革命”前，全国县以上青年宫、青年俱乐部、青年之家有一百九十六所，少年宫、少年之家和少年活动室六千八百五十所。今年五月份了解，大部分被占，仅有青年宫、青年俱乐部、青年之家十三所，只占原有的百分之六点六；少年宫、少年之家和少年活动室有一千五百多所，仅占原有的百分之二十二。青少年“学习没有地方，活动没有场所，生活没有乐趣”，少数人就“无事生非”，走上邪路。有鉴如此，武汉、重庆、沈阳、哈尔滨等市大抓恢复青少年活动阵地。重庆市组织各方面力量，采取退、挤、改、挖潜等办法，因陋就简办青少年活动阵地。团组织发动青年搞义务劳动，积累资金，自己动手修建活动场所；许多单位党委还把领导干部腾出的某些大院，改为青少年活动室，仅三个月的时间，就恢复和建立了青少年之家四千六百二十七所，文化室七百二十七所，图书室一千零四十九个。

第五，部分城市组织了道德风尚竞赛活动，对发扬道德新风有促进作用。如上海团市委和市教育局，

组织全市中学生开展了“守纪律、有礼貌、讲卫生”的“六无六好”竞赛，组织小学生开展了十条模范卫生街竞赛。杭州、青岛等市，开展财贸一条街竞赛。北京市财贸单位青年，开展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竞赛。武汉市组织汽车运输等行业的青年，开展发扬道德风尚的竞赛。

很多城市党委重视抓青少年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工作，把它列入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并召集市、区、县、局和工厂企业、学校、机关等直属单位负责干部会议，进行动员、部署；还成立了由市委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挂帅的，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青少年教育领导小组，建立了市、区、街道三级青少年教育办公室，做具体工作。重庆市委书记亲自带领参加领导小组的十二个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深入市内七个区，逐个检查青少年教育工作情况，就地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沈阳市委拨出七十九万元，作为搞校外教育活动的经费，配备了一千二百九十名专业青少年教育辅导员，并在九十八条街道恢复和建立了青少年活动场所。

特别是八月中旬，党中央转发中宣部等八个单位《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的五十八号文件下达以后，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

党委和有关部门，加强了对青少年的教育工作。他们纷纷召开有关八家（有的省增加了知青、卫生、财政、法院等部门）开会，研究贯彻落实中央五十八号文件精神的措施。江苏、湖北省委专门召开了青少年教育工作会议，北京、上海、四川、广东、广西、江西、河北、山东、陕西、黑龙江、吉林、内蒙等省、市、自治区党委，也打算在今冬明春召开会议，研究加强青少年教育工作问题。

目前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就是**道德教育朝着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各方通力合作，打总体战的方向发展**；由过去断断续续、抓抓停停搞道德教育，朝着一浪接一浪，不停顿地开展道德风尚教育的方向发展；由重点在十二城市开展道德风尚教育，朝着全国城镇普遍开展的方向发展。据九月底统计，除十二城市外，全国已有一百七十三座中小城市开展了道德教育活动。预计通过中央五十八号文件精神的传达贯彻，道德风尚教育无论在广度或深度方面，都会有新的发展。

当前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从十二城市情况来看，工作发展不平衡。**有的大城市动得不够，党委抓得还不够紧**。团中央也抓得不够扎实，指导不够得力。有些团干部认为：“党风不正，青少年的问题不好办”；

“青少年升学、就业、生活等问题不解决，抓道德教育是空谈”；“团的工作问题多，基层组织松散，道德教育搞不起来”。**存在消极畏难情绪**。其次是，有些地方对抓道德风尚教育这项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够，有的口号提得过高，内容要求过宽，时间要求过急，企图在短时间内解决青少年中所有问题，一遇到困难或实际问题解决不了，不是撒手不管，就是简单粗暴，影响这一工作广泛深入开展。也有些地方道德教育工作只是一般地布置和号召一下，实际工作尚未很好开展。第三，**宣传舆论工作还不够有力**。还没有造成大家都来关心和搞好社会风气，热情培养教育青少年成长的局面。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真正把中央五十八号文件全面贯彻落实。

（第39期，10月31日）

全党都来维护安定团结

当前，坚决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一个值得关心和警惕的问题，全党都要引起高度的重视，都要抓这个大事。

我们要实现四化，这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不这样，我们这个国家就不能富强，九亿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就不能根本改善，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共产主义的理想就不能实现。搞四化必须有一个最起码的、最根本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这便是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粉碎“四人帮”以前，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批“走资派”，抓“投降派”，“夺权”，一天到晚闹哄哄的，没有一块安静的地方，人们心乱如麻，谁能集中心思搞生产抓工作呢？这种痛苦的经历，我们是记忆犹新的。三年来，党中央做了许多好事，从根本上扭转了局面，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把全党和全国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落实了各项政策，努力改善人民生活，消除了大量的不安定团结的因素。现在，全国的政治形势是很好的。但是，不安定团结的因素还是相当多，起起伏伏，总有那么一股暗流干扰我们。这个问题必须认真解决。

为什么还有不安定团结的因素呢？为什么还有闹事的现象呢？

第一，主要的大量的原因是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是他们那条极左路线直接间接造成的恶果。

第二，我们工作上也有些缺点。应该承认，今年

以来，我们在宣传工作上确有一些考虑不周和片面性的地方。宣传发扬民主是必要的，但同时要讲集中，讲法制。我们不能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混同起来。我们提倡的是人民的民主，绝大多数人的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利益的民主，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更不能妨碍和危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有的人有糊涂思想，以为西方民主好得很。哪有那一回事？一些外国驻华记者在这方面作文章，那是一种进攻，只能欺骗某些头脑简单的年轻人。还有对特殊化的议论不少。干部特殊化是错误的，一定要纠正。中央正在采取措施。但是如果把特殊化和老干部等同起来，那就陷入了形而上学。确实有些老干部不争气，有特殊化，应该批评。也确实有很多老干部保持优良的革命传统，一心一意搞四化。我们在实际工作上也有些问题。例如一些商业部门随便调高物价，引起街谈巷议。有的地方和部门不认真落实政策，甚至硬顶着不去平反真正的冤假错案。总之，我们工作上的某些缺点甚至可以说是错误，也是影响安定团结的重要原因。

第三个原因，社会上确有一些不好的人。他们只顾个人，不顾国家，不顾整体。有的人是想出风头，在政治上捞一把。目前有少数青年人没有找到为人民

服务的正当途径，想靠在政治上吵吵嚷嚷找条出路。这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刻苦用功，掌握一点真才实学，才能成为有利于人民的人，并使自己也得到发展。有的人搞的那种政治只会浪费青春，说不定还有可能走入歧途。周恩来同志从前说过，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无理取闹不对，有理取闹也不对。这是有道理的。共产党员不能同情、支持这种事情。还要看到，在我国，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没有了，阶级斗争还是有。有一小撮唯恐天下不乱的坏人经常捣乱和破坏。最近更是相当猖獗。北京今年九月份刑事犯罪率比去年同期增加一倍半。上海九月份的发案率是历来各月份最高的。这难道还不应该引起人们警惕吗？

各单位党组织要召开党员大会、团员大会、群众大会，理直气壮地讲清这些问题，首先要求我们的党团员、干部和全体职工用模范行动维护安定团结，不要给某些人造成闹事的机会。

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对待和努力消除不安定团结的因素。凡是人民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而且在目前条件下能够解决的，一定要主动地、积极地、全力以赴地去办好。绝不允许采取敷衍搪塞、推托应付的官僚主义态度。不为群众办事，算什么共产党的干部？不为人民谋利益，一心图谋私利的人，是旧社会的官老

爷，不配当群众的领导者。这是根本原则的问题，丝毫也不能含糊。

人民群众中有些合理要求，限于客观实际困难一时办不到，怎么办？不能打官腔，画圈圈。要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到群众中去，同他们面对面地谈心，摆情况，说原因。我们的人民历来是识大局、顾大体、能吃苦、讲纪律的。只要我们的干部自己不特殊化，以平等态度待人，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群众中的意见是容易说得通的。做群众工作，是我党的优良传统。现在，有些同志却忘了这个法宝，把自己关在狭小的办公室里，习惯于画圈圈，批条子，以为这就是全部工作。他们不同群众接触，见了群众也不宣传、解释，结果造成了很多不应有的隔阂。这种状态应该彻底改变。

这里还有一个如何正确反映群众意见的问题。有些同志同群众有联系，了解他们的愿望、意见和要求。这是很好的。他们及时地把自己掌握的情况反映给党组织，或者径直报告中央，对我们党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情绪，起了重要作用。今后要继续提倡和发扬这种作法。然而，也有个别的共产党员，不是按照这样的正当途径去表达群众的意见，而是直接诉之于所谓的“民主墙”，写大字报。长期的经验证明，大字报这

种形式，尤其是街头的大字报形式，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有害安定团结，并且容易为别有用心的人（包括外国人）所利用。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以及一切有觉悟的工人、农民、学生，如果不按照民主集中制的正常渠道，去表达自己和群众的看法和要求，而上街贴大字报，是不好的。至于用大字报散布错误的、荒谬的乃至反动的意见，就更是不能容许的了。一个时期以来，在我们的队伍中间，流言、谣言不断。我们有些同志不但不抵制，也糊里糊涂跟着去传播。那些挑拨的、反动的、造谣的东西，是非很明白，不难分辨清楚。我们应该用脑子想一想，问一个“为什么”，坚决予以抵制。即使是自己闹不清楚的，也只能报告党组织，不要道听途说，信以为真，去当义务宣传员。我们的同志要时刻掌握分析的武器，无论什么事、什么话，都要用马克思主义去进行分析，否则就会上当，犯错误。

现在，有的单位一开党员会议，一些同志议论起来就发牢骚、讲怪话，或者说一些丧气的话，这种风气很不好。中国的事要靠全中国人民来办。中国共产党的事要靠全体中国共产党员来办。把自己放在旁观的地位，说三道四，对事情有什么帮助呢？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干部都有责任为党和国家分忧，积极

地想办法，提建议，帮助党和人民解决那些能够解决的问题。至于个人的问题，要多从大局着眼。一个人如果忘记了党帮我办了什么好事，只记住党还没有为我办什么事，那是不公道的。我们对党，对人民，对别人，都要讲公道话，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只要全党一条心，一股劲，都来维护安定团结，都主动地挑担子，做工作，再大的困难也一定能够克服，四化的宏伟蓝图必然会变成辉煌的现实。

（第40期，11月2日）

教育党员、群众不信谣，不传谣

编者按：近来一些地方流传某些针对中央领导同志的谣言，其中有一些是明显的恶意中伤。我们有的同志不但不抵制，反而信以为真或者半信半疑，加以传播；有的同志则听之任之，漠不关心。这种状况应该改变。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要教育党员干部带好头，恢复被林彪、“四人帮”破坏的好传统，反对自由主义，提倡听正道消息，不要信谣传谣；警惕别有用心的人蓄意造谣、挑拨、煽动；有情况和意见，按照正常渠道向组织反映，不搞小广播；主动向群众做思想工作，宣传解释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措施。只要千百万党员干部认真这样做，谣言是会不攻自破的。

设在陕西咸阳的化工部第六设计院的共产党员郑若璞同志，不久前给中央办公厅、中央宣传部写信，反映社会上流传一些针对中央领导人的谣言，要求采取措施制止。原信摘登如下：

今年以来，从社会上不断流传到我院一些有关中央领导人的“问题”。最近，我院从北京等地出差回来的人，又带回了一些“传说”。有些同志竟然相信，或说：“可能有出入，但总有这么回事。”有人继续当“新闻”传播。我们认为，这很明显对我国安定团结的局面，对使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对坚决贯彻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很不利的。我们指出：“这肯定是谣言，是蓄意中伤、破坏。”但也有人反驳说：“你调查了？如果根本没有这事，社会上这么流传，中央为什么不出来辟谣？”我们说：“这不用调查就可以判定是恶意中伤。不用中央讲，我们就有责任辟谣。”但仍有人认为这样讲不能令人信服。还有人认为我们思想上还是“框得太死”。

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其原因，一是有阶级敌人、“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在搞破坏；二是有些人可能因什么事没有得到满足有些不满，就借题发挥；三是“四

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怀疑一切”、讲话不负责任、无政府主义等流毒影响还很深。建议对这种情况加以研究，并采取一定的措施，对蓄意造谣、破坏的坏人要严加处理，对随意传播这类谣言的人要进行批评，并就此对党员和广大群众进行教育。

（第41期，11月12日）

石家庄地区 大力培训报告员、宣传员

石家庄地区初步恢复和建立起一支以报告员、宣传员为主的基层宣传队伍。全区十七个县、四百二十四个公社配备党的报告员二千九百七十九名；四千三百五十五个生产大队有宣传员五万二千零八十八名，平均每个生产队二至三名。

地委宣传部重视培训和提高报告员、宣传员。采取的措施有：一、有计划地选送他们进地、县委党校和学习班学习。去年和今年，地委先后两次培训全区公社党委宣传委员。今年以来，各县县委党校举办基层宣传骨干训练班九十三期，共培训宣传骨干一万七

千余人。二、办好县、社、队三级辅导网(站)。辅导内容主要是，当前学习宣传的重点，帮助解答学习中提出的问题，交流开展基层宣传工作的经验，布置当前宣传内容。三、公社举办轮训班，普遍轮训宣传员。例如，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为内容，全区各公社举办了八百八十多期轮训班，参加的有三万八千三百多人次。四、各县广播站举办专题广播讲座，组织报告员、宣传员收听学习。今年以来，多数县举办四至五期。井陘县广播站先后举办了《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学习科学技术》、《学习宣传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刑法讲座》、《计划生育》等专题广播讲座，播出稿件八百多篇。五、及时编印下发辅导材料。地委宣传部今年先后编印宣传提纲二十三期，下发基层，供报告员、宣传员学习、宣讲参考。

(第41期，11月12日)

对外介绍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有些同志提出：现在我国某些地方的内部高级招

待所已经对外国旅游者开放，收取较高的房租。有的接待同志为了使外宾感到值得，在介绍时说这个房子是为毛主席修建的，有历史意义。这种说法容易引起不良影响。以事实而论，说这些招待所是为毛主席修建的，并不确切。有的可能毛主席曾经住过。在介绍时，没有必要把毛主席扯进去。这个意见很好，希望有关地区党的宣传部门注意。

（第41期，11月12日）

自觉地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已经发到县以上领导机关，正式付诸实行。这个规定从我国现有经济情况和人民生活水平出发，既保证了高级干部工作需要，又有利于防止和克服生活特殊化，对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促进干部和群众同心同德搞四化，具有重要意义。它反映了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意愿，必将受到广泛的热烈的拥护。全体高级干部，都应该切实遵守，认真执行。

我们的大多数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经受过长期艰苦环境的锻炼，历来具有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鱼水相依，血肉相联。直到今天，我们许多同志仍然保持着这个好传统。他们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一心奔四化。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封建特权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特别是林彪、“四人帮”败坏党的优良传统的恶劣影响，加上我们在干部生活待遇方面制度不健全，一部分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特权思想有所滋长，群众观念淡薄，想自己多了，关心人民少了。少数同志不顾全大局，不了解民心，不听从党的劝告，一味讲排场，摆阔气，利用职权搞特殊，追求安乐享受，为个人和子女亲属谋取私利。结果，使我们一些同志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损害了党群关系，影响了党的威信，引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不满。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应当看到，领导干部在生活上搞特殊化，是背离党的宗旨和群众意愿的，是妨害四化建设的。我们的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我们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只有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

运，造福于人民，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国家、民族的命运所系。在今天，我们讲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就是要和群众一起同心同德搞四化。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一心追求小家庭的“现代化”，怎么可能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专心致志搞四化呢？又怎么可能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奔四化呢？特别是目前国家的困难还很多，人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群众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许多问题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干部更应该发扬和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现在，一部分群众和干部所以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忧虑，信心不足，原因之一，就是一些领导干部丢掉了同人民同甘共苦的好传统，使得人们气不顺，心不齐。这个解决了，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够充分发挥出来。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极少数用心不良的闹事分子，利用我们某些领导干部的特殊化问题大作文章，制造混乱。我们下决心克服了这方面的缺点，就可以剥夺他们借以挑拨党群关系的一个口实，就有利于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中央决定从实行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规定开始，逐步解决各级领导干部中存在的特殊化问题，是完全正确的。高级干部是党和国家的领导骨干，应当成为

干部和群众的表率。高级干部能不能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对整个干部队伍的风气影响很大。如果高级干部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认真执行《规定》，中下级干部就会跟着学，对下面存在的不正之风，才有发言权，才能够理直气壮地进行纠正。这样，搞好整个干部队伍的作风就有了保证，党风和整个社会风气就会大大改变。

认真贯彻执行《规定》，关键在于干部要有自觉性。这种自觉性，应当表现在既赞成中央的《规定》，又在实践上坚决按照《规定》办事。凡是超过《规定》的，都主动纠正过来，不该占用的，自觉退出来，应该交费的，主动付款。违背《规定》送上门来的，坚决制止。过去，由于制度不健全，各地各部门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参差不齐，这是难免的。现在，有了统一规定，自觉地照章去做就好了。我们的高级干部，绝大多数是有这种自觉性的。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在讨论《规定》（送审稿）的时候，纷纷表示拥护，许多同志还建议规定得更严格一些。那末，会不会有人感到不大方便，或者不大高兴呢？是会有有的。我们相信，这些同志只要经常想一想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比一比自己现在和一般干部、普通群众的生活水平，特别是想想自己的责任，想想自己的革命信

仰，是会想得通的。

中央的《规定》，是本着既防止领导干部生活特殊，又反对平均主义的原则，根据国家经济情况并保证工作需要制定的，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高级干部的关怀和爱护。高级干部担负着繁重的领导责任，许多同志年老体弱，为了便于他们的工作，在生活待遇方面给予适当照顾，是适宜的，合理的，人民是赞成的。不能用平均主义观点来看待这个《规定》，把对高级干部的合理照顾视为特殊化。平均主义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同社会主义原则不相容的，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当然，也不允许任何人借口反对平均主义搞特殊化，追求不合理的待遇。

要提高自觉性，对某些同志来说，还有一个正确看待自己的地位、权力和功劳的问题。在我们的国家，人民群众是主人，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这个根本关系，任何时候都不能颠倒。干部的地位和权利是人民授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决不能用来搞特权、谋私利。高级干部革命工作几十年，为党为人民做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这一点，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但是，这只是一个共产党人为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了革命事业应做的份内之事。决不能居功自傲，停止不前，更不可把过去的贡献当作向党

向人民伸手的资本，当作搞特殊化的理由。我们应当珍惜自己的光荣历史，在新长征中，用艰苦奋斗的实践，谱写出新的篇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以得到人民的衷心爱戴，去世的至今得到人民的深切怀念，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能够鞠躬尽瘁为人民，艰苦奋斗一辈子。我们的高级干部，应当以他们为榜样，权力越大越要廉洁奉公，职位越高越要想着人民，资格越老越要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

高级干部不仅要严格要求自己，还要教育好子女和亲属。在这方面，大多数高级干部是做得比较好的，大多数高干子女也是努力继承老一辈的光荣传统的。做得不好的虽然是少数，但是很值得注意。党和政府给领导干部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为了保证领导干部本人的工作需要，绝不能把它看作是全家应得的享受。我们决不要放纵子女搞特殊，追求舒适，享受不应得的待遇，干那些贻害子女，败坏社会风气的蠢事。不是说不要爱护子女，问题在于怎样才是真正的爱护。是千方百计为他们准备优厚的生活享受，使他们养成好逸恶劳、不求上进的坏习气呢，还是从各方面严格要求他们，使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培养成为可靠的接班人？正确的选择只能是后者，这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关系到造就一代新人的大事，一定要严

肃对待，切不可疏忽大意。

保证《规定》的贯彻执行，行政管理部門负有重要責任。按照《规定》关怀和照顾好高级干部的生活，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集中精力去工作，是党交给行政管理部門的一项光荣任务和应尽之責。领导干部要尊重他們的职权，服从他們的安排，支持他們的工作，体谅他們的困难，为他們执行制度创造方便条件。做行政管理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满腔热情、尽职尽责地做好工作。关心爱护领导，不在于給他們提供額外的方便，而在于按照《规定》保障他們合理的待遇。任何情况下，都要秉公办事，如果不讲原则，领导想要什么就給什么，即使出自好心，也是帮倒忙，使领导脱离群众。谁当官就給谁特殊照顾，明知不符合规定也要顺着办，奉承讨好，逢迎取宠，这是旧社会的恶习，是国民党的副官作风，我們的同志切切不可沾染这种坏习气。至于以照顾领导为名，破坏规章制度，谋取私利，那更是法纪所不允许的。如果说，过去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制度不健全，遇事无章可循，行政管理工作有一定的难处，应当予以体谅，那么，现在已经作了明确规定，就应当严格按照制度办事。今后，领导干部违章，领导干部负责；行政管理部門违章，行政管理部門负责。

要贯彻执行《规定》，还必须实行严格的监督。这个《规定》，是高级干部生活待遇方面的法规，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必须严肃对待，不能马马虎虎。经验证明，任何好的法规，要得到彻底的实施，没有组织和群众的监督是不行的。实行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规定也会是这样。因此，除了加强思想教育以外，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要在党委领导下，把经常检查《规定》执行情况，作为维护好党风党纪的一项重要工作。对那些严格要求自己，模范遵守《规定》的干部，要予以表扬；对那些违反《规定》的干部，要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严肃处理；对于拒绝监督、搞打击报复的干部，要依据党纪国法予以追究。

（第42期，11月16日）

银川市市委认真采取措施 制止封建迷信活动

编者按：今年一些地区不时发生封建迷信活动，象银川地区那样一度迅速蔓延的情况，还是相当突

出的。银川市委在区党委领导下，冷静分析事情的前因后果，组织干部深入现场，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同时努力解决缺医少药的问题，很快就把那股浪潮平息下去了。这再一次证明，只要认真做工作，许多问题都不难解决。

据新华社反映，银川市委坚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有效地制止了封建迷信活动的蔓延。

十月下旬，从银南地区传来的群众性的以求神讨药为主的封建迷信活动，很快在银川市辖的永宁、贺兰两县和老城、新城、市郊等处蔓延。永宁县短期间就出现二十九个活动点，遍布全县八个公社。每次参加迷信活动的群众，少则几十人，多者上千人。十月十七日晚十时许，从银川、贺兰还开了二十八辆汽车，运送职工、居民到永宁烧香求药。前些日子，这些活动几乎成了街谈巷议的中心，严重扰乱了群众思想和社会治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一、农村城镇思想政治工作放松了，文化生活也贫乏。二、看病难。农村中的合作医疗大部分名存实亡，赤脚医生水平低。三、在落实宗教政策中，不少群众（包括有些基层干部）划不清宗教和迷信的界限。四、今年受灾减产，部分社员生活困难。宁夏自治区党委对此十分重视，专门发了文件，要求“各级党组织引起足够

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

银川市委遵照自治区党委的指示精神，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在认真做好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广泛进行唯物主义的宣传，大造革命舆论，打破求神能治病等封建迷信的谣传。各机关、公社和企业事业单位都普遍召开会议，动员党员、团员和干部职工不信谣，不传谣，不参加迷信活动。文化部门在城乡巡回放映《一贯害人道》等电影，宣传部门运用真人真事揭露封建迷信的欺骗性，教育群众相信科学，相信社会主义。

二、广泛组织各级宣传、统战和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干部，深入迷信活动的现场，对群众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对参加迷信活动的群众，不歧视冷淡，不讽刺挖苦，满腔热情地说服劝阻。

三、关心群众疾苦，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贺兰县委最近派出医务人员下乡巡回医疗，为群众防病治病。银川市委准备立即着手培训宣传员，恢复农村夜校，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占领社会主义宣传阵地。

四、对煽动群众搞迷信活动的巫婆神汉加强管理教育。

目前，永宁县、银川市封建迷信活动已经基本

上被制止。贺兰县虽然还有几个活动点，但参加的人数不多。

（第44期，12月3日）

甘肃开展关于真理标准 问题讨论的补课

据甘肃省委宣传部反映：甘肃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已在全省范围内展开。

补课的做法——由一般号召 变成切实的行动

全国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以来，省委一再通知，督促各地学习。但是，地、县各级组织多数重视不够，没有认真讨论。有的认为这是理论问题，我们做实际工作的没必要讨论；有的听信小道消息，错误地认为讨论就是“砍旗”。三中全会明确肯定了真理标准的讨论的重大意义之后，有的仍然担心上面的看法可能不一致，要“等一等看”；有的自己不学习，不领导讨

论，也不传达省委负责同志的讲话。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后，有的认为这是“纠偏”，幸喜自己没有讨论，不然又犯了“错误”。

省委认为，不端正干部的思想路线，就不能坚决有力地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为此，在传达贯彻四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决定全省进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补课。省委宣传部、组织部根据省委决定，先后举办了地、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报道组长学习班。结果证明多数人的认识问题通过学习能较快地解决，使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尽管如此，省、地、县补课的局面仍然打不开。于是省委下决心举办省、地、县三级党委书记（一把手）学习班。七月二十六日开始，为期一个月，由省委第一书记和主管宣传工作的书记主持并参加学习，集中精力，着重解决好思想路线和落实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结束时，一致反映办这样的学习班，三级党委书记坐在一起，学理论，听辅导，敞开思想讨论，共同总结历史经验，研究当前工作，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弄通党的方针政策，大家都提高了认识，增强了信心。认为在历史转折关头，办这样的学习班是完全必要的。省委抓住这一环，就象打开闸门，顺流而下，迅速推动了全省的补课。有的县委不等一把手回去，就自动进行补课，

“自己解放思想”，“丢掉裹脚布，迈开大步走”，积极落实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九月中旬以后，各地委、县委纷纷举办学习班，吸收地、县机关领导干部和公社书记参加。大约三分之一的县办了县级机关和大队干部的学习班。将近半数中级干部和初级干部参加了学习，现正在向一般干部发展。

九月，省委又举办了省级机关主要负责干部（一、二把手）的学习班，由省委两位书记主持并参加学习，用两周时间，着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也收到良好效果。国庆节后，省级机关普遍举办干部学习班，首先端正思想路线，还总结本行业的历史经验，讨论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的八字方针。现在大部分已经结束，正组织下属单位补课。

收获——在端正思想路线 基础上，解决实际问题

各个学习班讨论的重点，都是端正思想路线，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摸索甘肃的自然规律，研究怎样把甘肃的经济，首先是农业搞上去。

一、明确讨论真理标准的重要性。学习班引导大家回顾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经历，说明这一讨论是从

根本上拨乱反正，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大家认识到：这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的需要，也是四化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哪几个人的意志决定的。这是坚持毛主席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思想路线不端正，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和坚决贯彻三中全会方针、政策。

二、明确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是真高举。大家回顾了三十年来全国和我省国民经济几起几落的教训，和历次政治运动的结果，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教训等等。分析哪些理论、方针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哪些指导思想违背了客观规律，受到了严重的惩罚。这样总结，使大家认识到“凡是”的观点是禁锢思想的观点，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被证明是真理，就是因为它经过了实践的长期检验。我们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才是真“高举”。

三、进一步认清了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和应当怎样正确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参加学习班以前，有的同志对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总有些半信

半疑。他们说，这些方针、政策，有的毛主席没说过，有的在“四人帮”横行时被批判过，今天办了，明天会不会又挨批？经过讨论认识到，三中全会的方针和一系列政策，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总结三十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当前中国的新情况制定的。三十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受挫折的教训，把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坚持下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加以发展；把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改正过来，不再重犯。三中全会制定的农村政策，一经贯彻，就大大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实践有力地证明了它的正确性。省委领导同志在发言中提出，要正确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就要克服“收发室”作风。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必须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把中央的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相结合，不能照抄照搬。不问实际情况如何，一切都照抄照搬，实际上是消极怠工的最妙方法。我们要下决心摘掉“收发室”的牌子，提倡创造性的工作。各地都打算从本地特点出发，制定和修改发展经济的规划。

四、共产党员要为真理而斗争。在省、地、县委书记学习班上，有的同志指出，现在干部中存在一种明哲保身，不敢坚持真理的现象。对于损害党的利益和革命事业的现象也不斗争，怕得罪人。甚至认为

张志新同志精神可贵，但是不懂“策略”。针对这种思想，学习班引导大家分清马列主义所讲的实践，与实用主义所讲的实践含义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后者指人们自身的“体验”。前者认为认识符合客观的是真理，后者则认为于“我”有利的便是真理。我们要用马列主义的真理观作指导，总结群众斗争经验，努力推动社会前进，防止历史教训的重演。不能象实用主义者那样，只研究个人如何应付环境，牟取私利。省委领导同志鲜明地指出：共产党员应该象张志新同志那样，做一个为真理而斗争的战士，不要做实用主义的市侩。

为了把补课落到实处，学习班联系实际，学习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诸规律，以此为指导，总结甘肃农业几上几下的经验教训，痛切地认识到制定政策必须符合客观规律。大家从实际出发，提出发展甘肃农业的一些设想。

一、明确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性质。不能脱离实际，不顾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一味在变革生产关系上做文章，搞什么“穷过渡”。通过批判“四人帮”破坏生产建设的种种反动谬论，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央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认识。

二、重点讨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甘肃商品经济不发达，加上“四人帮”流毒没肃清，一些干部不敢放手发展家庭副业，唯恐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两极分化，会瓦解集体经济；害怕开放集市贸易会产生资本主义；不是广开生产门路，而是多方限制商品生产。学习班就这些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划清了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必要补充的家庭副业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大家纷纷提出，要取消不利于发展生产的一些限制，发展多种经营，壮大集体经济，适当放宽小自由，扶植家庭副业等等许多建议。这些建议已陆续实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三、明确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学习班以大量事实批判了平均主义错误，大家认识到平均主义只能鼓励懒汉，造成普遍贫困。按劳分配才能调动群众积极性，搞好生产，共同富裕。各地大量事实说明，生产队实行联系产量包工或包产到组，比“吃大锅饭”的办法，生产搞得更好得多。有的县、社今年观望犹疑，没认真搞的，现在后悔了。大家都表示，一定要作好准备，明年放手大干。

四、明确了搞生产要因地制宜，符合自然规律，切忌“一刀切”、瞎指挥。许多地、县都提出了本地区的规划设想。着重总结了毁林毁草开荒，破坏生态平

衡，造成农业灾害的深刻教训，总结了中部干旱地区华家岭等处营造林带七、八年，对改变小气候已初见成效的好经验，认识到要下极大决心，集体、群众一起上，坚持长期植树种草，从根本上改变甘肃干旱多灾的状况。大家深感到要向大自然索取，必须掌握科学技术，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和及早注意培养人材。

总结经验，继续深入在全省范围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

从这段实践看，要推动全省补课，须要：一、全党动手，书记带头。各条战线都要由负责同志主持办好学习班，而且要有一批骨干和辅导力量，宣传部门应做好具体工作。学习班规模不宜太大，否则不便具体指导。二、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要通过实践检验，总结历史经验，正确理解和执行三中全会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解决实际问题，研究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三、要坚持“三不主义”。领导要带头联系实际，敞开思想。讨论问题要摆事实，讲道理，开展不同观点的辩论，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要允许保留不同看法，不能采取简单化的办法。四、要联系整顿党风。共产党员要发扬勇于坚

持真理的革命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思想，不受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的侵蚀。

现在全省范围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仅仅是初步展开，必须继续深入。叶剑英同志国庆讲话的发表，对补课是极大推动，是补课的指针和教材。我们准备以这篇讲话为主，辅以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决定等文件，在今冬明春，把补课普及到广大干部、群众中去，促进思想解放，把各项工作促上去。

（第45期，12月7日）

法制宣传教育要深入下去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一批重要法律之后，各地陆续开展了一次比较集中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由于党委重视，干部先行一步，调动起各方面的宣传力量，这次活动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特别是有的地区和单位，就象本刊这一期发表的浙江、无锡电缆厂两件材料反映的那样，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抓住一些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解剖，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同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结合起来，使法制教育工作深入到人们

心里，遵纪守法的空气开始浓厚起来，并且使得一些长期纠缠不休的矛盾得到解决，效果显著。当然，法制宣传教育，绝不是搞一次突击性的活动就能够完成的。我们要把这项工作深入下去。

从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起，《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就要付诸实施。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自然要从过去主要是学法、知法转到强调守法、执法上来，在行动中加深对法律的认识，维护法律的尊严。我们曾经着重强调各级干部要依法办事，认真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这是完全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这样做。同时，我们也应该要求各级干部代表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敢于同破坏法律的坏人坏事作斗争。

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大中城市的社会秩序不好，流氓犯罪活动相当猖獗，有的甚至公开向政法机关挑战。这是不能容忍的。社会主义法律是掌握在人民手里的，是保护自己、打击敌人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的有力武器。严格的法律程序只会促使我们加强调查研究，完全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不发生差错，或者一有差错，能够及时发现加以纠正。当前，我们要结合打击流氓犯罪活动，显示社会主义法律的威力，发挥其应有的对犯罪分子的镇慑作用；使我们的同志更加熟练地运用法律的武器，同危害国家集体利益和人

民生命财产的犯罪分子斗争到底。

近几个月来，从中央到地方，很多报纸、广播、电视，进行了大量的法制宣传工作，特别是对某些典型事例（包括遵纪守法的好人好事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两方面）的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后，我们要更多地利用这些阵地，抓住有普遍教育意义的案例，结合有关的法律条文，向广大干部和群众不断进行生动具体的法制宣传教育，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搞四化的政治局面。

（第46期，12月12日）

浙江开展法制宣传月 活动效果显著

据浙江省委宣传部反映：从十月中、下旬开始，浙江全省普遍开展了法制宣传月活动。

干部先行一步。省、地、县党校和其他干校，都把法制教育列为重要内容。杭州市组织各县、区、局及宣传、政法等部门的负责人二百三十人，举办了为期半月的法制学习班。不少地、县也都相继举办了机

关于干部的法制“学习周”。逐级培训宣讲骨干。一般都以县为单位，用一周左右时间培训了区、社、镇的法制宣传报告员，然后再由他们培训大队、生产队和所属工厂、车间的法制宣讲员。绍兴地区五个县培训了四万多名基层的宣讲骨干，形成了一支群众性的法制宣讲队伍。同时动员、组织各种宣传力量，运用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法制宣传。

经过这段的宣传教育，主要有以下几点收获：

一、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认识，增强了实施法律的信心。在开展宣传教育之前，不少人认为“学法、执法，这是政府的事情，我们做工、种田，只要安安稳稳过日子，学不学法律，关系不大”。通过宣传教育，大家认识到依靠人民群众来贯彻实施法律，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本保证。许多人说：过去法制不健全，被林彪、“四人帮”一伙坏蛋钻了空子。现在中央把法律交给了我们，不认真学好它，怎么能自觉守法，又怎能协助和监督政府执法呢？有些人原来总认为“法网、法网，好比是蜘蛛网，管小不管大”。通过宣传活动，人们看到：粉碎“四人帮”以来，党和政府在整顿党风、社会风气和加强法制等方面确实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并已取得初步成效，从而逐步消除疑虑，增强了信心。最近，杭州市政法机关公开宣判了

“两熊”流氓犯罪集团案件，大大加深了广大群众对“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的认识，提高了实施法律的信心。

二、增强了法制观念，初步树立起自觉遵纪守法的良好风气。象山县高塘公社的社员说：“现在中央公布了新的法律，好比包公手中有了金鞭，给我们老百姓吃了‘定心丸’。”这个公社通过法制宣传，出现了五多五少：遵纪守法的多了，赌博盗窃的少了；尊老抚幼的多了，家庭纠纷少了；团结互助、积极生产的多了，吵架、闹事的少了；参加会议、关心学习的多了，嬉嬉荡荡的少了；干部出以公心、依法办事的多了，遇到问题、矛盾上交的少了。在温州港务局装卸一区，过去有少数职工装运食品，特别是水果时，“顺手牵羊”、“运啥吃啥”，已成积习。通过这次法制教育，风气大变。有的卸完水果打扫仓库时，发现角落里剩下两只苹果，也立即送还给托运单位。地处山区的丽水县丽云区，在这次法制宣传中，同贯彻《森林法》结合起来，修订了护林公约，成立了护林组，确定了护林员，并且依法处理了少数乱砍滥伐树木的人，刹住了破坏山林的歪风。在群众性的法制宣传活动中，各地一些“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人，也主动检查错误，纷纷表示要改正错误。一些邻里纠纷、家庭不和等民

事案件，也得到妥善解决。特别是赡养父母的风气，得到很好的发扬。

各地在法制宣传中，还特别注意了加强对青少年的道德风尚教育。杭州市小营巷居民区，有七八届以前毕业的待业青年二十人。街道党委在这次宣讲中，把他们单独编成一组，除与其他居民一起听辅导课外，还专门组织他们座谈，收到较好效果。有一位青年过去偷东西，打群架，通过法制教育，有了转变。一天，有人唆使他去打群架，他不但不去，而且还报告了派出所。象山县液压元件厂有一部分青年职工，过去经常聚赌，并且公开宣扬什么：“三级工、四级工，不如赌场上几分钟。”“一等奖、二等奖，不如老K牌翻一张！”通过法制教育，这些青年有了转变，赌风刹住了。

三、解决了一批民事纠纷和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干扰和破坏，各地都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在这次法制宣传中，群众迫切要求解决。各地在法制宣传的后期，发动群众讨论，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本着向前看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妥善处理。一时无法解决的，也向群众解释清楚，取得大家的谅解。如江山县风林公社，有两个毗邻大队，过去为了鸡鸭糟塌

庄稼的问题，经常发生争吵，不是你毒死我的鸡，就是我毒死你的鸭，影响生产，妨害团结。这次在法制教育中，群众强烈要求解决这一问题。于是在公社党委的帮助下，双方派代表进行协商，依照法律的精神，从保护集体财产出发，一方面对社员进行爱护集体的教育，一方面双方都在村旁路口筑起篱笆。这样，鸡鸭糟塌庄稼的纠纷解决，两个大队社员的团结加强了，保护了社员养鸡鸭的积极性，生产更起劲了。此外，不少地方都在学习法律的基础上，讨论、修订了一些“民约”（如护林公约等），作为执行法律的具体补充，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四、改进了干部工作作风，提高了严格执行政策法规的自觉性。有的干部原来认为，“七法八法，束手束脚。”通过宣传学习，使这些同志提高了认识。诸暨县安华公社邵佳泉大队的干部，学习法律，联系实际，回顾总结几年来的工作，认识到由于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淡薄和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毒害和影响，分不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分不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因此，在工作中曾把“收（自留地）、割（“资本主义尾巴”）、罚（工分、钞票）”当作“万灵药”，把“批、斗、关”当作“好办法”，侵犯了群众的权利和利益。他们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九七五年，第二生

产队的稻谷被人偷窃，当时怀疑是队长作的案，就搞逼、供、信，结果造成了错案。大队党支部书记深有体会地说：“叫我们学习法律，是党对干部的关怀，也是给我们敲警钟。如果说依法办事是‘束手束脚’的话，那么这种不按法律办事的手脚是非束缚不可的！”有些地区的基层干部还认真检查了过去“出口成法”的粗暴作风，主动制定守法公约。有的在群众大会上当众宣布：今后要做到“请客不到，送礼不要，奉承话不听，特殊化不搞”，欢迎大家监督。

现在，各地正在进行法制宣传月活动情况的检查和总结。要求凡是搞得不深不透的地区和单位，都必须认真抓好补课，使几个主要法律的精神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当前，要运用正反面典型和案例，继续加强对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法纪教育和遵守社会公德的教育，加强对各级干部带头遵纪守法的教育，使干部群众自觉遵守社会主义法制，坚决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障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46期，12月12日）

无锡电缆厂密切联系实际 进行法制教育

据江苏省委宣传部反映：从九月中旬开始，无锡电缆厂集中一段时间，开展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宣传教育活动，组织全厂职工认真学习《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通过读条文、听辅导和联系典型案例进行讨论，职工的遵纪守法观念普遍有所增强，偷窃等犯罪情况有所下降，促进了安全生产和“质量月”活动的开展，及各项制度的贯彻落实。

无锡电缆厂从实际出发，针对不同类型的情况提出不同的重点进行教育，效果很好。

一、从青年工人中所发生的案例来看，大量的情况是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之害，主要应当加强教育，解决不懂法的问题。这个厂刑事案件的作案人员中，青年职工占百分之六十，从小偷小摸、打架斗殴发展到拦路抢劫、毁人容貌、强奸妇女，直至偷越国境都有。这些犯罪的青年职工是在“四害”横行岁月中长大的，刚踏上社会，看到的是长矛大刀，听到的

是“造反有理”，向往的是“白卷英雄”，头脑里根本没有党纪国法的观念。因此，在宣传教育中主要解决青年工人不懂法的问题。厂里把青年职工列为教育的重点，单独为他们进行两次法制教育活动，大力表彰遵纪守法的好人好事。各个团支部还组成“关心”小组，把帮助后进青年的工作落实到团小组。还组织犯过错误而又有改正表现的青年现身说法。青年工人蔡某某进厂后工作表现一直比较好，曾担任团支委、团小组长。后来为了恋爱问题，串通别人把一种有毒溶液射到一个女青工身上，致使胸部溃烂，分别受到公安机关处理。厂里让他讲自己犯法的教训，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

二、回顾历史上干部中所发生的案件，大量的是利用职权违法犯罪，因此在宣传教育中，**强调干部要破除特权观念，带头严守党纪国法。**工厂党委领导人员结合正在进行的党委改选，对照《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及法律条文精神，认真发扬民主，听取群众意见，联系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党风，造成少数领导干部严重脱离群众，违法乱纪（有的领导干部以言代法，甚至认为法律只是管老百姓的，自己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有的擅自调拨厂内物资，供亲友作交情用等）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委还向党员

代表作了“整改”报告。同时围绕历史上干部中发生的重大典型案例,对照《刑法》、《刑事诉讼法》进行学习。认真总结建厂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干部利用职权犯罪的经验教训,加深理解法律条文精神,提高严守党纪国法的自觉性。

三、分析本厂发生的大量偷盗案例,一个重要原因是管理混乱,制度不严,在法制教育中认真堵塞这方面的漏洞。这个厂素有“金山、银山、花果山”之称,企业整顿前,废铜丝、废铝丝、废塑料到处乱丢,各项规章制度名存实亡,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为了堵塞这个漏洞,主要抓了三项工作:(一)抓好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过去,原材料被盗,往往不知道,原因是家底不清,管理混乱。通过企业整顿,这方面情况开始好转,帐物一致,心里就有底了,比较有效地堵塞了犯罪漏洞。(二)把思想工作和经济制裁结合起来。大力表彰并奖励同盗窃犯罪作斗争的好人好事,同时对那些一贯小偷小摸的人再次作案时按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经济制裁,收到较好的效果。(三)加强巡逻值班,保护国家财产。根据本厂地处远郊,地方偏僻,犯罪分子容易作案的特点,厂人武部组织民兵夜间巡逻值班,厂保卫科也有专人负责值班,处理夜间发生的情况。

四、联系生产上所发生的许多安全、设备、质量事故，向工人讲清危害，常敲警钟，使之懂得责任事故与过失犯罪之间的辩证关系，严格责任制度。对全厂来说，刑事犯罪毕竟只占很小的比例，而大量的则是经常发生的安全、设备、质量等方面的责任事故，或者是事故苗子。根据这个特点，他们在进行法制教育中突出强调了一般责任事故与过失犯罪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运用本厂发生的事例来加以说明。去年十月二十八日夜里，发生了一起锅炉“炉膛放炮”事故，当班操作者朱达士等三人违反操作规程，凭老经验办事，开炉点火不慎引起内燃爆炸，幸亏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否则要作过失犯罪处理。各个车间、部门联系类似例子，对职工进行遵守岗位责任制教育，效果较好。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分别对各项制度重新进行了一次大检查，对有关事故分别进行了通报和处理，采取许多防范措施，健全各类制度。开展法制教育以来，事故明显下降，“质量月”活动也取得较好成绩。

（第46期，12月12日）

外经部教育党团员带头维护 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编者按：进一步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需要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本刊第四十期发表的《全党都来维护安定团结》一文，对此曾有所论述。其中特别提出希望各级党组织教育党团员，在这方面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下面刊载的外经部的材料，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外经部党组直接抓这件大事，先后在党员干部和全体党团员中进行教育，围绕目前我国存在的一些困难和麻烦是过去遗留下来的，还是现在新产生的；打倒“四人帮”以后，国内形势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什么是解决当前各种矛盾和困难的根本办法三个问题，展开热烈讨论。结果统一了思想，消除了怨气，去掉了疑虑，最后归结到决心做维护安定团结的模范。党团员站在前头，广大群众就会跟上来，都来讲安定团结的话，做安定团结的事，同破坏安定团结的言论和行动作斗争。我们建议县委以上的机关、学校、企业和团体，参考外经部的经验，引导党团员就他们存在的问题开展讨论，统一思想，在这个基础上，认真研究一下基层党组织和

全体党团员如何在维护安定团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心同德搞四化。

最近，外经部在学习叶剑英同志讲话的同时，在党团员中进行了一次关于维护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教育。先是组织处长和支部委员以上的党员干部学习有关讲话，首先在这一部分党员骨干中统一思想，然后组织全体党团员学习。通过这次学习，大家端正了对当前国内形势的看法，加深了对维护安定团结重要性的认识。同志们都觉得，这次学习收获较大，为进一步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作了准备。

前一个时期，在一部分同志中，对当前国内形势存在着比较片面的认识，看表面现象多，看消极因素多，开起会来怪上怨下，牢骚满腹。有的党团员也是认识模糊，人云亦云，对国内形势缺乏具体分析。针对着这一情况，外经部在这次学习中着重讨论了对国内形势的看法，主要明确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当前我们国家存在的一些困难和麻烦，是过去遗留下来的，还是现在新产生的？经过大家摆事实、找原因，一致认为：当前社会上出现的许多问题，如大量的冤、假、错案问题，青年就业问题，劳动工资问题，住房交通问题以及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问题等，大量都是过去积累和遗留下来的，特别是由

于林彪、“四人帮”蓄意制造和推行的那条极左路线所造成的，而绝不是我党现行的方针、政策造成的。相反，正是现在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在千方百计、全力以赴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我们全体党团员和干部群众，应该把千仇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帮”身上，应该全心全意拥护和支持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尽快克服和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这才是我们对待当前困难的正确态度。

第二，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们国内的形势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通过讨论，大家回顾了这三年多来的变化，一致认为：尽管我们当前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但是，不论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或是科技文教方面，成绩都是巨大的，总的发展趋势都是越来越好的。这在农业方面表现得最明显。中央的政策一下去，农村的形势为之一变。大家说，农村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就等于全国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民的生活改善了，就等于全国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改善了。而且，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好转，一定会为各条战线更进一步好转准备必要的条件。有的同志讲，就拿我们机关职工来说，打倒“四人帮”以后，生活也是有所改善的。除七七年、七八年有部分

职工增加了工资以外，一些普遍性的福利也有所增加，如冬季的暖气费不收了，自行车牌照税取消了，房租降低了，还增加了每月的交通补助费和洗理费。大家认为，在国家财政经济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能做到这一些是非常不容易的。在谈到政治形势时，同志们说，现在我们心情舒畅，心里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开会发言，再也不用抄书抄报，不用担心戴帽子、抓辫子、打棍子，这和林彪、“四人帮”横行时言不由衷和“鸦雀无声”的情况有了根本不同。大家说，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粉碎“四人帮”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得人心的。国内形势的发展确实是越来越好，只要我们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形势一定会更加好转。

第三，什么是解决当前各种矛盾和困难的根本办法？大家一致认为，要彻底改变我国目前“问题成山”、“困难成山”、“麻烦成山”的状况，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要把生产搞上去，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面貌，才能使这些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所以实现四化是我国当前最大的政治，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同时，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又充分说明了，要使生产上去，要使经济建设持续地、高速度地发展，就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因此，破

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是破坏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就是断送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希望。通过讨论，大家更提高了维护安定团结的自觉性。有的同志说，这些年来，大家吃够了不安定的苦头，今后，我们党员再不要带头去乱冲乱闹了。许多同志表示，我们党员一定做维护安定团结的模范，一切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话绝不讲，一切不利于安定团结的事绝不作。

通过这次学习讨论，同志们认识到，经过林彪、“四人帮”十多年的破坏以后，我们的党已经正确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拨乱反正，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现在我们已经制订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上来，开始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们一定要十分爱护这个来之不易的政治局面。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各方面的矛盾还很多，百业待兴，百废待举，要求我们全党全国上下一致，同甘共苦克服困难。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每个党员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思潮，要作冷静的分析。现在广大群众对少数领导干部的特殊化作风表示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但是，因此而把全体老干部和特殊化划等号，是完全错误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同

时，我们更应该看到，社会上确有极少数的人唯恐天下不乱，打着什么“争民主，要人权”的口号，企图混水摸鱼，把矛头对准我们党的领导，对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我们必须有高度的警惕。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对于那些兴风作浪，破坏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定的坏分子，必须依照法律采取坚决的措施，予以打击。

在这次学习讨论中，同志们对改进各方面的工作，改进领导作风，也提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大家认为，今后在思想教育和宣传工作方面，应该做到更加全面，更加准确。例如应该更全面地宣传解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思想教育和物质鼓励、艰苦奋斗和改善生活、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等方面的关系。大家还希望各级领导干部更自觉地改进领导作风，主动地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实际情况，及时解决问题，不要等到矛盾激化的时候再处理。有的同志说，全国一万多高级干部，如果每人每年能认真为下面解决一个问题，那么一年就解决一万个问题，就能大大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

（第47期，12月13日）

